

格致方法 · 定量研究系列　吴晓刚　主编

档案数据处理：生活经历研究

格伦 · H.埃尔德（Glen H. Elder, Jr.）
[美] 伊莉莎 · K.帕瓦尔科（Eliza K. Pavalko）著
伊丽莎白 · C.柯里普（Elizabeth C. Clipp）
洪岩璧 曾迪洋 译　武玲蔚 校


革新研究理念


丰富研究工具


最权威、最前沿的定量研究方法指南

47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旨在为定量和定性研究者提供如何使用二手的档案数据来进行生命历程研究的指南。

书中，作者首先探讨了如何在档案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建立合适的契合关系。其次，细致地讲解了如何利用二手档案数据进行再次研究的步骤，尤其是重编码。第三，作者从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以特曼数据为例，通过对三个具体生活经历问题的分析，详述了在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与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主要特点

- 本书第一作者是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的大家，曾利用档案数据写就《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
- 本书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如何将研究问题和档案数据相契合，生动地再现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对类似研究具有启发性
- 大量篇幅介绍具体实例，极具操作性和实践性

上架建议：社会研究方法

ISBN 978-7-5432-2724-8



定价：32.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格致网：www.hibooks.cn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联系到我们：
邮箱：hibooks@hibooks.cn


微信


天猫

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 吴晓刚 主编

档案数据处理：生活经历研究

格伦·H.埃尔德(Glen H.Elder, Jr.)
[美] 伊莉莎·K.帕瓦尔科(Eliza K.Pavalko) 著
伊丽莎白·C.柯里普(Elizabeth C.Clipp)
洪岩璧 曾迪洋 译 武玲蔚 校

SAGE Publications, Inc.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数据处理:生活经历研究/(美)格伦·H.埃尔德(Glen H. Elder, Jr.),(美)伊莉莎·K.帕瓦尔科(Eliza K. Pavalko),(美)伊丽莎白·C.柯里普(Elizabeth C. Clipp)著;洪岩璧,曾迪洋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

(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

ISBN 978-7-5432-2724-8

Ⅰ.①档… Ⅱ.①格… ②伊… ③伊… ④洪… ⑤曾… Ⅲ.①档案资料-数据处理 Ⅳ.①G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976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

档案数据处理:生活经历研究

格伦·H.埃尔德
[美]伊莉莎·K.帕瓦尔科 著
伊丽莎白·C.柯里普
洪岩璧 曾迪洋 译 武玲蔚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20×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91,000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724-8/C·170 定价:32.00元

出版说明

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主编的"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丛书，精选了世界著名的 SAGE 出版社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翻译成中文，起初集结成八册，于 2011 年出版。这套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和选择，该丛书经过修订和校正，于 2012 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再次出版发行，共 37 本。我们衷心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建议。

随着与 SAGE 出版社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又从丛书中精选了三十多个品种，译成中文，以飨读者。丛书新增品种涵盖了更多的定量研究方法。我们希望本丛书单行本的继续出版能为推动国内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总序

2003年，我赴港工作，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研究生的两门核心定量方法课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自创建以来，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训练。我开设的第一门课"社会科学里的统计学"(Statistics for Social Science)为所有研究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课，而第二门课"社会科学中的定量分析"为博士生的必修课(事实上，大部分硕士生在修完第一门课后都会继续选修第二门课)。我在讲授这两门课的时候，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生的数理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尽量避免复杂的数学公式推导，而用具体的例子，结合语言和图形，帮助学生理解统计的基本概念和模型。课程的重点放在如何应用定量分析模型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上，即社会研究者主要为定量统计方法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作为"消费者"，学完这些课程后，我们一方面能够读懂、欣赏和评价别人在同行评议的刊物上发表的定量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也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这些成熟的方法论技术。

上述两门课的内容，尽管在线性回归模型的内容上有少

量重复,但各有侧重。“社会科学里的统计学”从介绍最基本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统计学原理开始,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束,内容涵盖了描述性统计的基本方法、统计推论的原理、假设检验、列联表分析、方差和协方差分析、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和模型诊断。“社会科学中的定量分析”则介绍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的一些模型和方法,将重点放在因变量为定类数据的分析模型上,包括两分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多维列联表的对数线性和对数乘积模型、有关删节数据的模型、纵贯数据的分析模型,包括追踪研究和事件史的分析方法。这些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

修读过这些课程的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将两门课的讲稿结集出版,并帮助我将原来的英文课程讲稿译成了中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本书拖了多年还没有完成。世界著名的出版社 SAGE 的“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丛书闻名遐迩,每本书都写得通俗易懂,与我的教学理念是相通的。当格致出版社向我提出从这套丛书中精选一批翻译,以飨中文读者时,我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这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的教科书未能出版的遗憾。

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但要有对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准把握能力,还要有对实质内容有较深的理解能力,而这套丛书涵盖的又恰恰是社会科学中技术性非常强的内容,只有语言能力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组织了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二十几位

研究生参与了这项工程，他们当时大部分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统计方法的训练，也有来自美国等地对定量研究感兴趣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蒋勤、李骏、盛智明、叶华、张卓妮、郑冰岛，硕士研究生贺光烨、李兰、林毓玲、肖东亮、辛济云、於嘉、余珊珊，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秀；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洪岩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丁、赵亮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讲师巫锡炜；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林宗弘；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姜念涛；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宋曦；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郭茂灿和周韵。

参与这项工作的许多译者目前都已经毕业，大多成为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定量社会科学方法教学和研究的骨干。不少译者反映，翻译工作本身也是他们学习相关定量方法的有效途径。鉴于此，当格致出版社和 SAGE 出版社决定在"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丛书中推出另外一批新品种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生仍然是主要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自 2012 年夏季开始，在上海(夏季)和广州南沙(冬季)联合举办《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修班》，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研修课程设计体现"化整为零、循序渐进、中文教学、学以致用"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参与了翻译和校对的工作。他们在

繁忙的学习和研究之余，历经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十多本新书的翻译任务，使得"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丛书更加丰富和完善。他们是：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洪岩璧，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贺光烨、李忠路、王佳、王彦蓉、许多多，硕士研究生范新光、缪佳、武玲蔚、臧晓露、曾东林，原硕士研究生李兰，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王骁，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温芳琪，牛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周穆之，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伟等。

陈伟、范新光、贺光烨、洪岩璧、李忠路、缪佳、王佳、武玲蔚、许多多、曾东林、周穆之，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陈佳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梁海祥还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审校工作。格致出版社编辑高璇不遗余力地推动本丛书的继续出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专业精神。对他们付出的劳动，我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每本书因本身内容和译者的行文风格有所差异，校对未免挂一漏万，术语的标准译法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

我们希望本丛书的持续出版，能为进一步提升国内社会科学定量教学和研究水平作出一点贡献。

吴晓刚

于香港九龙清水湾

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主要的纵贯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开始开展调查，例如密歇根收入动态追踪调查(Michigan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天才工程(Project Talent)和全国纵贯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以第一项调查为例，密歇根追踪调查包括了6 000多户家庭。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仅对极少数人来说，贫困才是一种持续状况(即持续一年以上)。这一发现打破了流行的说法，而只有纵贯研究才可能有这样的发现。自1968年开始，该研究致力于对同样的家庭进行回访。但是，即使像密歇根追踪调查这样弥足珍贵的调查，它也不是为研究生命历程(life course)或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而设计的。因此，如果研究者想要用这些数据来进行生活经历研究，那么就不得不对这些数据进行重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去找其他档案数

据了。

这就是埃尔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在“对旧数据提出新问题”时所做的事情。他们对在其他纵贯研究中为别的目的而搜集的原始资料进行考察,把这些资料进行重构,产生适合于分析个人生活的观测数据。在阐述这一方法时,他们借用了知名的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研究。该调查自 1921 年开始,对一个由天才青少年所构成的样本(857 名男孩和 671 名女孩)进行了 10 年的追踪调查。从那时开始,后来又搜集了 12 轮访谈数据,最近一次是在 1991 年。除访谈之外,特曼研究中的档案数据还提供了大量的补充信息,包括新闻故事、配偶和父母的访谈以及信件。本书作者描述了他们为重构这些档案所做的每一步:评估现存的资料、决定如何编码、修改研究问题、评估编码主题、编写编码本、对个案进行编码、评价信度和效度、进行数据分析。在建构新的健康编码(第 3 章)、职业模式(第 4 章)和测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 5 章)中,他们对上述过程进行具体说明。

集中关注特曼研究很有用,因为它能显示本方法的长处。当然,这一方法也能同样适用于其他纵贯数据。如果读者脑海中想不起来这样的数据,他/她或许可以从作者所提及的几个档案数据来源中获得一些帮助。而且,正如作者在附录中所提到的,现在大约有 200 个纵贯数据集可

以被使用，它们被存放在亨利·A.莫瑞（Henry A.Murray）研究中心的国家资料库里。因此本书所展现的丰富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诸多其他研究主题。

迈克尔·S.刘易斯-贝克

致　谢

一些著作把它们的出版归因于其作者一生中与他人的交往和专业经历。本书就是这样一本著作。它展现了我们如何使用档案数据来调查变迁社会中关于生命历程的问题。从非正式的理解到本书所描述的逐步递进方法(stepwise method),这一研究路径已经发展了30多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慷慨解囊资助这一类的研究。

最初的研究步骤是由第一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uman Development)工作期间,进行一个关于纵贯数据档案项目的过程发展而来的。我们要感激支持这些研究的历任所长,也要感激进行"奥克兰成长研究"(Oakland Growth Study)的哈罗德·E.琼斯(Harold E. Jones)和赫伯特·斯托尔兹(Herbert

Stolz),以及玛丽・琼斯(Mary Jones)和约翰・A.克劳森(John A.Clausen)的英明领导;还有进行伯克利辅导研究(Berkeley Guidance Study)中的琼・麦克法兰(Jean MacFarlane)和玛乔丽・杭齐克(Marjorie Honzik)。这些研究所搜集的丰富数据为后来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旧数据提出新问题。人类发展研究所为这些努力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年来一贯支持这类研究的所长,他们是约翰・克劳森,保罗・马森(Paul Mussen),M.布鲁斯特・史密斯(M. Brewster Smith),盖伊・斯旺森(Guy Swanson)和乔・坎波斯(Joe Campos)。

1983 年的寒冬,第一作者在康奈尔大学发现路易斯・特曼纵贯调查可用于研究战争给男性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对这一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挖掘,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启了一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经历对成人发展及老龄化影响的研究。罗伯特・希尔斯(Robert Sears)是当时特曼研究的主任,他投入了很多资源用于数据编码,并对我们所提出的研究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和支持。但他(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以后我们会有多少次要回去利用数据档案进行工作。如果没有希尔斯、档案学家埃莉诺・沃克(Eleanor Walker)和现在的主任阿尔・哈斯托夫(Al Hastorf)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为了新的研究目的而重构数据这一艰难的任务。美国国立精神

卫生研究院的一项基金和老兵管理部的一项能力回顾基金(Merit Review Grant)使我们能够开展这一冒险性的研究。对于所有这些支持,我们都深怀感激。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对特曼调查中关于男性的数据进行重构,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应该归功于程序员和项目经理凯瑟琳·科若斯(Catherine Cross)卓越的领导,她为我们带来了高水平的专业编码技术。一起工作时,在辛苦地准备编码本和培训编码员的工作中,她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对战时后方动员进行编码过程中,安德鲁·沃克曼(Andrew Walkman)对凯瑟琳进行了协助,安德鲁是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的一名高年级研究生。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富有思想的、工作精确的编码员,他们是Karen Catoe, Marty Williams Deane, Laura Kline 和 Michael Riddle。乔伊斯·泰伯(Joyce Tabor)技术娴熟地负责对位于卡莱罗那人口中心的编码组进行指导。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以及林恩·艾戈(Lynn Igoe)的编辑工作。他们一起使这项研究进行得井井有条,并且非常成功,比我们所希望的做得好多了。作为感谢的一部分,我们把本书献给在本研究的所有重要的编码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的每一个人。

莫瑞研究中心的主任安妮·科尔比(Anne Colby)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在两个工作坊上报告了我们的方法。我们感谢科尔比博士和她出色的团队所提供的这些教学机会。

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加强莫瑞研究中心推动在个人生活研究中更有效的使用纵贯数据的努力。很多同事通过他们仔细的阅读和反馈，帮助我们不断完善本书，他们是科尔比博士、汤姆·库克（Tom Cook）和珍妮·布鲁克斯-冈恩(Jeanne Brooks-Gunn)。我们再次感谢所有人，尤其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无与伦比的编辑建议。当老师、使用者和学生运用这些方法来回答他们的研究问题时，对本书的最终检验就将到来。我们希望收到您的意见和建议。

格伦·H.埃尔德
伊莉莎·K.帕瓦尔科
伊丽莎白·C.柯里普

目 录

第1章

导 论

> 必须对最初的问题进行重构,以表明这些观测数据能够提供一个临时的答案。只有这样,真正的难题才算被明确地提出来了。[1](Merton, 1959:xxvi)

纵贯数据档案的增长是行为科学领域近些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之一。过去20年的研究见证了追踪研究的急剧增长,这些研究对人们进行跨时段的追踪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研究的诞生甚是艰难和缓慢。但到60年代末,研究经费的增长使进行全国性的样本调查成为可能。其中最知名的是全国纵贯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差不多同时启动的还有密歇根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大量的其他纵贯研究也开放了第一手的开放式访谈和观测资料,以及丰富的个人文件资料(Allport,

[1] 本书中多次出现question和problem两个词,中文一般都可译为"问题",但在文中其含义又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我们把question译为"问题",把problem译为"难题"或"疑问"。——译者注

1942)，包括信件、日记和家族记录等。

我们使用数据档案(data archives)一词来特指这一类研究，杨、萨韦拉和菲尔普斯(Young，Savela & Phelps，1991)对此曾做过简要罗列，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发展研究所开展的颇负盛名的一系列纵贯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所搜集的数据包括对多个研究对象的观察、访谈和问卷信息。当数据仅仅来自固定对象的抽样调查(fix-respond survey，比如全国纵贯调查)时，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编码并对数据集进行重构以回答新问题的可能性就很有限，而这正是本书的关注点。关于雷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的亨利·A.莫瑞(Henry A. Murray)研究中心的数据资源的相关描述，请参阅附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都在呼吁要加大对纵贯研究的投入，我们则关注20世纪90年代所要面临的挑战，即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这些数据。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来研究变迁社会中的人类生活和生命历程?[1]这一问题引领着我们在本书中的思考。研究者处理档案数据的计划无疑取决于研究疑问是什么。开始的时候，研究疑问可能只是一种预感或者模糊的想法，原初问题可能仅仅

[1] 本书中的"life course" "life-data"中的life，我们一律译为"生命"，以保持与前人译法的一致。由于中文中的"生命"更多的具有生物学上的含义，因此译者在此强调，本书中所说的"生命"一词是指人生或一段长时间的生活。——译者注

是“疑问形成的一个引子”（Merton，1959：xix）。在一些情况下，提出原初问题的同时也要提出其背后的理由何在，即为什么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值得我们去问、去追寻答案。数据资料馆和基金委托人通常想知道这背后的理由，据此来选择最值得资助的申请。但无论问题的形式如何，它都提供了寻找相关数据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一个研究问题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 乍看起来，要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看到然后提出疑问相当容易。确实，提问总是非常容易，小孩子总是在提问题。但是科学家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格言告诉我们，发现并提出疑问通常要比解决这个疑问更困难。（Merton，1959：ix）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是特指某一类问题，它们称得上是科学难题，能够产生经验型的答案，从而改进、修正或者肯定该领域内的知识（包括原初问题本身）。这类问题在研究者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也会得到修正和改进。当研究者对包含生命史信息的档案了解得越多，他就能提出更为清晰的研究问题。研究者也可以对手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使其更适用于回答最初的疑问。这种精致化的修正是在编码和再编码（recoding）的过程中得到的。这里，我们把研究问题和档案数据之间互

动的动态过程称为重构(recasting)过程。在项目研究期间,最初的问题会被重新表述以配合数据,数据也可以通过编码和再编码被重新处理来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

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问题和档案或文件中生命记录数据(life-record data)的可获得性之间的相对契合程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目前的典型情况是包含生命记录数据的档案在等待生命历程研究问题的提出,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类问题远远超前于可供研究的纵贯档案(多数是回顾性的或基于文件的数据)。但是,受到托马斯(Thomas)和兹纳尼茨基(Znaniecki)的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18—1920》(*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18—1920)的启发,那时候的研究者开始利用生命数据来分析个人生活和人类发展。那时候开展的研究包括知名的研究高智商的加州人的路易斯·特曼研究,这是一项斯坦福大学于1922年开始的纵贯研究,并且一直持续了下来,最近刚搜集完第12轮数据(Minton, 1988a, 1988b);还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发展研究所进行的诸多研究(Eichorn, Clausen, Haan, Honzik & Mussen, 1981)。

托马斯(W.I.Thomas)是一名知名社会学家,他明确表明我们需要对人们进行跨时段跟踪调查的优秀研究。他对进行跨时段跟踪调查的定性个案研究和研究生命的定量研究都做过评价,他也熟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所进行的开拓性的纵贯研究项目。更重要的是，托马斯令人信服地提出要建立数据档案用于研究当时所提出的有关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问题。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托马斯力主优先发展“研究生命史的纵贯路径”（Volkart，1951：593）。经过观察，他认为研究应该调查“不同类型的个人，他们拥有不同的经历，在不同的情境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并追踪调查“这些个人群体直到将来，从而得到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经历的一段连续的记录”。这一提议，在诸多方面都是如此地符合当前的理念，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基本被冷落了。那一时期，现代抽样调查作为一种数据搜集方案占据了绝对优势。所有这一切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有所改观，那时对生命和老龄化的研究成了最重要的事业。

为了使读者领会研究问题和生命档案数据如何相互契合，我们以 20 世纪 60 年代生命历程革命所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作为开端，从理论到统计技术、数据和问题。研究问题和数据之间的匹配只是这一宏大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或许又是最不受到重视的部分。书柜里几乎找不到关于发现难题和表述难题的文献，直到最近，文献或者培训都不讨论如何从档案中使用生命史数据。档案数据提供给潜在使用者的机会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所有经常性的研究甚至短期的探索都还没有开花结果。很少有潜在的使用者能设法从中获取对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使用档案数据进行许多年的生命历程研究之后，我们相信有效使用数据资料馆中纵贯资料的主要障碍在于没有一个成熟的概念来形容研究问题和档案数据之间的关系。首先，档案调查者不是根据特定问题来搜集数据，而是搜寻适用于某个研究难题的数据。在这一搜寻过程中，对潜在档案的了解极其重要。为了强调有效使用数据过程中的一些要点和需要考虑之处，我们简要说一下几个重要的档案。其二，对一个档案的详细清点能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以使数据能更好地回答研究疑问。其三，审阅数据也能为修改研究疑问的表述提供一些想法。改变数据以契合问题和改变问题以契合数据这两种调整一般都发生在把模型或问题与数据相联系的过程之中。

接下来的章节都会应用同一个例子来说明研究中模型和纵贯数据契合的过程，这个例子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路易斯·特曼研究。最初的项目主要关注大萧条[1]对男性和女性生活的影响(Elder, 1974)，后来才发展出这一研究视角和相关的程序。在直到现在的纵贯研究中，我们仍不断地在改善这一研究路径。目前使用的数据是特曼档案中关于20世纪前十年早期和1920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

[1] 指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译者注

的生命记录数据。最初我们使用特曼数据是为了研究服兵役对男性生活的影响,这也是基于我们在伯克利的人类发展研究所进行了 20 多年的类似的纵贯研究工作。

本书的组织架构沿用我们与雷德克里夫学院亨利·莫瑞研究中心的乔治·威兰特(George Vaillant)和卡罗琳·威兰特(Caroline Vaillant)于 1989 和 1991 年共同主持的工作坊上所使用的大纲。第 2 章对档案数据处理中的要点和视角进行概述。第 3 章给出了一个如何一步一步地对数据进行重构以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关于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的。第 4 章关注工作生涯,尤其强调工作年限的晚期,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如何调整现存的、为横截面数据设计的编码,使其适用于当前生命数据的模式特征。任何完整的生命历程研究都试图把个人生活和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因此在第 5 章中,我们简述了如何利用特曼数据来获取男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关于应用的这三章都是基于特曼男性数据,因为我们所报告的档案处理工作是对男性生活中服兵役经历的纵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用于研究特曼女性和她们的生命历程的数据准备工作也是按照与男性相同的程序进行的。

在下面章节所概述的每个数据重构工作中,就我们的研究问题而言,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些重要的数据限制。这一类限制是使用档案数据时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如何用档案数据来回答当前的问题,但这些档案数据并不是为

了回答这些问题而搜集的？虽然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下面章节中的例子应该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重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做的决定。接下来，我们就转入数据档案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范式，这一关系是生命历程革命的关键要素。

第2章

处理档案数据

在档案数据处理中，研究者努力使研究问题和数据之间的契合程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寻找相关的生命记录数据来契合特定的问题，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或重构（recast）来提高契合度。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研究问题及其分析模型来提高契合度。在其他情况中，我们无须对研究问题进行改动，因为手头已经有相关数据可用于对某个难题的研究。多数对档案数据的使用都会在一个连续过程中混合使用这些不同类型的修改，从而最终产生一个可接受的契合度。

使用档案数据来处理研究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运用该方法的各种变式几十年了。但这些研究者并没有把他们的分析步骤作为一种研究逻辑或方法论写下来。研究压力使得研究者没什么时间去有意识地思考这些步骤。研究助理们也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正式指导，仅仅在项目实习过程中学到这些研究路径。因此，这些步骤最终变成了某个项目或某个大学研究所里的口头

研究传统，通过一代代的学生往下传递。

针对研究中的这个关键操作环节，这一非正式的个体化的研究路径已经不足以解决我们手头的任务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生命历程研究及其研究工具中都产生了一场革命，此后迅猛的发展使得在档案数据处理中对系统化步骤的需求愈加迫切，尤其强调问题和数据之间的契合。

本章中，我们首先讨论数据、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些发展，然后讨论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和特定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领域的发展，譬如纵贯数据的急速增长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会产生影响。关于生活事件序列(sequences of life events)的数据要求我们以概念化的术语对其进行思考，然后进行合适的统计分析。这种相互交织发展的最明晰的例子就是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有关生活转变(life transitions)和老龄化的新问题应当激发人们对数据需求新的思考，并引领我们进行合适的纵贯研究。能够获得新的纵贯数据集或许会鼓励研究者形成一些能够很好地利用此类数据的研究问题。仅仅了解这些跨越几十年的生命记录，我们就能得到老龄化研究的洞见，从而有助于研究问题的形成。通过描述一些更老的纵贯数据档案，我们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讨论档案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的互动。

生命历程研究革命和纵贯档案数据与研究问题之间

的互动促使我们对旧数据提出新的问题。纵贯数据档案无疑是一个旧数据的宝库，这些数据是为了回答其他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而在另一个时空所搜集的（Hyman，1972）。而新研究者对这些数据集提出新的问题，试图使之更好地拟合模型。我们能否对手头已有的数据提出某个问题？如果不能，能否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提高契合度？这一重构工作是否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该工作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我们假定这些被选择的档案数据能够很好地契合可能的研究问题。

第 1 节 | 生命历程革命

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诸多发展改变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对生活研究的形态。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增长以及快速变迁的社会所带来的学术挑战，新理论层出不穷。更长的生命跨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成功老龄化后的生活质量以及早期经历对此的影响。当时的社会中断(social discontinuities)也提出了有关生活、代际和历史之间的联结问题。从这一关于年龄的社会和学术情境中，便产生了一种认为生命历程嵌入于社会体制中、并受到历史力量和同期群(cohort)影响的观点。

作为概念，*生命历程*(life course)指社会中以年龄划分的生活模式(Elder，1985，1992)。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差异表现为不同的期望和选择权，它们影响人们的计划、选择和行动，从而形塑生活阶段、转变和转折点。生命历程既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内逐步形成的，比如工作、收入和婚姻轨迹，也会在短期内受社会转变影响，包括离开家庭、进入大学、找到及辞掉一份工作。

转变往往镶嵌于轨迹之中，后者给予前者与众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因此，通过把连续多年的状态以及婚姻或工作和收入状态结合起来就能刻画某个特定的生活轨迹。但是转变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生命历程中的发生时间。当失业发生在家庭形成过程中，其意义和影响与等到家中孩子离开家庭之后失业的意义是极其不同的。类似地，65或70岁之后丧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壮年早期则不同，此时丧偶会对另一方的精神状态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McLanahan & Sorensen，1985）。

大量的概念把当前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和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区别开来。首先最重要的是，如今生活和社会被认为是互相交织的进程。生命模式（life patterns）被社会中发生的制度、文化和物质变化所形塑；这些变化部分是通过人的变化发生的。不同的出生同期群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老化（Riley，Johnson & Foner，1972；Ryder，1965）。其次，在关注历史变化的同时，当前人们也关注生命历程过程中不同的老化模式。文化中对于老化和生命事件（life events）的流行看法认为，同一年龄段的人们在主要的生命事件上的经历大致相同。与此相反，当前的看法是认为生命事件在时间安排（timing）和序列（sequencing）上都存在差异，并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后果（Hogan，1981）。当前生命历程理论的第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强调生命转变和生命时段中的经历之间

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结婚、生子及变换居住地在社会时间上的差异都会对后来生活中的抉择产生影响。

20世纪60年代至今,发展中的生命历程理论已经为经验研究设定了情境,包括相关的问题和变量,并对证据和假设的产生进行了结构化。作为一个理论导向,生命历程框架在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和实际的分析路线上都给出了建议。这一过程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开始,从新的研究需求和问题到更多人感兴趣的生命历程框架。

20世纪60年代的其他两项发展也对生命历程研究框架的出现和生命历程范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贯数据的增长和档案材料的发现,以及新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搜集技术的发展(Bollen, 1989; Mayer & Tuma, 1990; Tuma & Hannan, 1984)。它们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描述,三个点分别代表数据、方法和理论。该三角系统中任一点上的发展都会对其他点产生作用。事件史统计模型的传播形塑了有关老龄化的理论(Featherman & Lerner, 1985)以及对数据的要求。

由于一些我们尚未了解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的纵贯研究迅猛发展,从庞大的天才项目(Project Talent)样本,到密歇根大学的全国性的收入动态追踪研究和全国纵贯调查,以及其他大量的小项目(Brooks-Gunn, Phelps &

Elder, 1991)。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激发了适用于动态模型中的事件序列分析、历史分析和评估跨越生命时段的因果路径的统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Campbell & O'Rand, 1988)。而特定技术对数据的要求又为搜集生命记录数据设定了标准,譬如事件史分析要求数据具有连续性的记录信息。

密歇根大学的收入动态追踪研究(Duncan & Morgan, 1985)表明了一些此类相互联系。这个数据档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雄心的追踪研究之一的产物。为了解决福利依赖和持续贫困问题,这一关于贫困的密歇根追踪调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国范围内对 6 000 多个家庭进行追踪,从 1968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约有 2 万人被纳入了这一调查中。该研究最初并不是为了生命历程研究设计的,但生命历程观点至少在三个方面对这一数据产生了影响。首先,更多的数据使用者正在开展纵贯分析,而在过去,横截面数据的使用是占主导的。其次,一些问题被逐年地添加到调查中以完善事件史和增加关于人们和家庭生命记录的信息。其三,研究家庭成员个体成为研究家庭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个人不同的时间段中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家庭情况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研究密歇根追踪调查中的职业和个人关系清楚地表明,有必要提出家庭模式(family patterns)这一概念,来描述不断演化的家庭生命历程。

20世纪60年代肇始的纵贯研究提供了很多生命历程经验事实和问题，从而在发展这一领域的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来自密歇根追踪研究，它聚焦于当时关于贫困的流行看法，比如认为贫困是自我持续的：人们因为不幸或继承而来的价值观而踏入贫困，并很少能够改变这一境况以再次自食其力。与这些看法相反，密歇根追踪研究发现只有很小一部分样本成员实际上经历了一年以上的贫困(Duncan，1984)。短期堕入贫困的人和一般样本成员并无显著区别，而长期陷于贫困的人都属于下列三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多个：黑人、老年人或女性。诸如此类的经验研究关注弱势群体是否以及如何摆脱弱势。他们在成年期间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生命历程革命对我们如何思考和研究人们的生命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也是更一般的范式转变的一部分。在该范式中，时间、情境(context)和过程(process)在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中成为日益凸显的维度。有关生命历程的理论想法同时也伴随着适用于老龄化和社会变迁结果调查的数据资源和方法的出现。从那时开始，定期举行的工作坊、出版的参考手册和书籍已经涵盖了生命历程理论、纵贯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发展。

但在这些发展中，纵贯数据和研究问题及理论的契合过程被忽视了。这一过程可用于当前的纵贯数据档案，也可用于更旧的数据档案。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数据搜集

的技术、理论和方法已经有很多改变，所以在处理更旧的档案时面临的挑战要更大。现在我们开始转向这些更旧的数据档案，并探讨有特定研究问题的使用者如何处理它们的这一任务。

第 2 节 | 向旧数据提出新问题

在美国的生命史研究早期,涌现了大量有关生活史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当时纵贯数据的回答能力。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生命史研究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那时开始对个人进行追踪调查,此后定期搜集这些个人的数据。这些工作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路易斯·特曼研究(被调查者出生于 1904—1920 年间;参见 Minton, 1988a, 1988b),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福利研究所(后改名为人类发展研究所)在旧金山湾开始的三个纵贯项目:伯克利成长研究(Berkeley Growth Study)、伯克利指导研究(Berkeley Guidance Study)和奥克兰成长研究(Oakland Growth Study),前两个研究的被调查者都出生于 1928—1929 年,第三个研究的被调查者出生于 1920—1921 年(Eichorn et al., 1981)。

所有这些加州的研究一开始都没有想要对儿童进行追踪调查,并一直追踪到他们的晚年。虽然各自的环境都有所不同,但每一个研究都进行了追踪调查,一直持续到

20世纪80年代,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南希·贝利(Nancy Bayley)主持了伯克利成长研究很多年,一直到她退休为止;琼·麦克法兰(Jean MacFarlane)创建并主持伯克利指导研究,并以此度过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哈罗德·琼斯(Harold Jones)和玛丽·琼斯(Mary Jones)夫妇是主持奥克兰成长研究的主要人物(Jones, Bayley, MacFarlane & Honzik, 1971)。路易斯·特曼在1925年开始主持对加州天才儿童的研究,直到他于1956年去世。

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兴趣围绕着如下主题:历史变迁对不同出生同期群的男男女女们的影响。奥克兰和伯克利同期群的孩子们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民动员,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历史变迁对这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影响。当时拥有更宏大历史观的调查者和学者都没有看清这些研究项目的概念模型是什么。

但当时的调查者所搜集的有关宏观环境的一些信息为此后就大萧条的困苦和战争经历如何影响生命史这一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提供了基础(Elder, 1974, 1979, 1986, 1987)。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影响的经验发现提出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对另一个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男性样本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特曼样本,因为其中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丰富数据。

因数据搜集的重点不同，特曼研究中也存在忽略历史事实的情况。大萧条期间，大量男性在结束学习之后就开始了职业生涯，其中将近一半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了兵役。可以说大萧条和战争定义了他们连续12年的集体生活，但特曼研究却没有搜集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活经历信息。于1950年进行的跟踪调查也没有搜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息，好像在怀疑其中某些人是否服役过一样(45%的男性参加过兵役)。虽然该研究没有记录一些历史，但是利用信件和笔记档案我们依然能对这一非常出众的研究样本中的男男女女生活所经历的一些历史时期进行考察。

在我们处理这些档案数据的过程中，得到了下述教训和主题：

1. 档案数据从不可能完全符合研究者的期望。因此，在既定的时间和资源限制下，在根据需要来构建数据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要弄清楚什么是能够做到的。在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 1972)给二手数据分析者的名言“最有效地利用已有的东西”指引下，下面我们将讨论相关的操作。

2. 手头的数据反映的是原初进行数据收集的研究者的想法，研究问题、数据收集程序和分析技术都表达了这些原初想法。这些想法同时也反映了那个

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文化主题(参见 Minton, 1988a, 1988b)。

3. 纵贯数据档案并不能保证可以进行生命记录或纵贯数据分析。以横截面数据形式输入和存储的数据往往比根据人们的生命信息记录的形式更为常见。因此,这些横截面数据经常需要被转化成生命记录的形式。

4. 生命历程研究可以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数据和分析方法。有效利用这两种数据需要进行细致的计划,使它们能运用到相同的主题或难题上。

5. 档案数据使用的基本原理是根据数据的长处来进行使用,而非通过缓和或忽略数据缺陷来进行辩护。

第四点教训的实例来自约翰·劳布(John Laub)和罗伯特·辛普森(Robert Sampson)。他们找到了一个有关男性少年犯的旧档案数据,该数据是 Eleanor Glueck 和 Sheldon Glueck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的。因为他们总是被问到这些“旧数据”和现在的相关性,劳布决定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数据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因为这些数据很“旧”,所以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来评估青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的共同原因在

某个历史时期是否是特定的。这些数据还能用于评估对犯罪的系统反应的变迁。(Laub, 1991:7)

上述五点在特曼和伯克利的研究中都能得到说明。作为最为古老的仍在持续的纵贯研究,特曼研究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 3 节 | 特曼研究

随着优生运动及其遗传决定论的衰微，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在 1921—1922 年间开启了一项持续 10 年的研究，以调查天才儿童早期的智力优势的后续维持情况。为了确定这些天才加州人的生活路径，这一研究随后又扩展至成年阶段。特曼相信通过在儿童早期发现最具禀赋者，社会能保证让这些禀赋最好的人走上领导岗位。

在助手的帮助下，特曼从加州的大中城市选择了 857 名男孩和 671 名女孩，他们的年龄处于 3—19 岁之间，智商都超过 135(Minton，1988a，1988b；Terman & Oden，1959)。从 1921—1922 年开始至今，已经对这些人进行了 13 轮数据搜集工作，包括与他们本人和父母进行的访谈、大量的测验和相关的目录(参见表 2.1)。

1922 年和 1928 年进行了最早的两次数据搜集，主要集中在与家庭生活、学校经验相关数据，包括对被调查孩子的母亲进行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与母亲相比，父亲在孩子养育过程中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因此，与父亲相关的数

表 2.1　特曼纵贯样本和数据

调查期数	被调查者数量	主　题
1922	共 1 528，其中男性 857，女性 671	家庭和学校
1928		
1936	共 1 256，其中男性 699，女性 557	教育、工作和婚姻
1940		
1945	共 1 334，其中男性 749，女性 585	参军经历
1950	共 1 271，其中男性 716，女性 555	
1955	共 1 286，其中男性 716，女性 570	工作、婚姻、成就
1960	共 1 127，其中男性 616，女性 511	
1972	共 927，其中男性 497，女性 430	
1977	共 812，其中男性 426，女性 386	老龄化、工作和退休、生活回顾
1982	共 813，其中男性 415，女性 398	
1986	共 805，其中男性 404，女性 401	
1991—1992	正在进行中	

据没有被搜集。在随后的 1936 年和 1940 年调查期间，很多人完成了教育并开始成人生活，无论是结婚、组建家庭还是工作。在接下来的一轮调查中，调查者问了有关结婚、家庭和工作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战争和各种服务角色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是婚姻、家庭发展、事业启程和收获成就的时期。每一个主题都通过邮件进行了调查(1950，1955，1960)。特曼样本中多样化的生活变迁和新的项目领导者(包括 Robert Sears，Lee Cronbach，Pauline Sears 和 Albert Hastorf)都为随后 1972 年、1977 年、1982 年、1986 年和 1991—1992 年的历次调查注入了新的关注点，包括老龄化、职业生涯和退休、家庭和对生活的评价。

历次调查主要通过给受访者邮寄问卷表格来完成。由于这项研究所依靠的资金支持非常微薄，再加上样本量较大，因此邮寄问卷这一成本最低的方法受到了青睐。但是文件中也包含了大量其他数据，如新闻剪报、对父母的访谈、对配偶的问卷调查、来自被调查者的信件、其他的记录数据，以及出生和死亡证明。尤其是信件带来的信息极其丰富，远远超越了结构通常较为狭窄的问卷调查。

与特曼分享自己的工作和参军经历的男性常常会请求特曼向雇主写推荐信，或是向特曼咨询一些个人事宜。在写给特曼研究办公室的信件中，女性更为关注她们孩子的生活。这些丰富的资料给那些对数据不太满意的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选择。研究者总是可以发展新的编码，然后运用到这些定性资料上。

任何纵贯数据的完全价值来自利用所有调查期数的生命记录，比如特曼样本中的13期数据搜集。生命数据使研究者可以追踪人们所经历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变迁。但是，机读（machine-readable）的特曼数据是按照调查期数被分别存放在政治社会研究校际联合会（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中的，每期数据都是以横截面数据的形式存放，而非以生命历史或记录的形式。这种横截面数据形式有利于仅仅对生命不同时期的相关状态或进程进行分析的研究，完全不同于旨在刻画生命轨迹的研究。由于我们的

目的是进行生命历程分析，因此首要任务之一是把数据从机读形式整理成关于工作、收入、婚姻、父母及健康的生命记录形式。作为补充，我们还发展了一系列新的关于生命历程和历史经历的编码。为了完成这一编码，我们在斯坦福研究中心对档案进行了好几周的分析。

由于特曼样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中上层，因此其中的男女一般都被支持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资金支持。大多数人完成了四年本科，很多人又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并获得了更高的学位。超过 90%的人最终结婚了，大约 85%的婚姻持续到了老年。4/5 的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处于中上层次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偏向和所测的智商上的偏向决定了这一样本无法推广到一般情况，但这两个偏向都有利于研究社会变迁的生命历程效应。来自这一阶层的男女会对他们生活中历史变迁的影响更为敏感。

在处理特曼数据的最初阶段，我们以为可以依靠已有的编码信息。经过大量探索，如第 3、4、5 章所描述，我们发现机读数据的现有形式无法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这些数据不是我们想要的数据，因此我们开始尝试利用新编码对数据进行重构。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决定，但如果参考我们之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发展研究所处理纵贯数据的经验，这一决定的理由就很容易被理解了。

第 4 节 | 从旧数据到新问题:大萧条时期的孩子

对来自奥克兰成长研究、伯克利成长研究和伯克利指南研究档案的纵贯数据进行多年研究之后,我们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接触特曼研究。如预料的那样,以前的数据和特曼数据很不一样,尤其是在其最初阶段。

这些资料有助于形成一种关于生活中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并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合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一类问题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如今,这一视角通常被称作生命历程视角(life-course perspective)。就如在特曼研究中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问题和生命历程视角都有助于形成对数据设置的要求和对新编码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接触特曼数据时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发展好的研究计划。

本书第一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从 1962 年开始处理奥克兰成长研究中的纵贯数据。奥克兰成长研究开始于 1931 年,最初由哈罗德・琼

斯和赫伯特·R.斯托尔兹(Herbert R.Stolz)领导，他们分别是儿童福利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Welfare)的研究主任和主任。该研究选取了加州奥克兰北部小学中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Eichorn et al.，1981)。该研究最初的目的是要调查学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正常发展状况。每年都从教师、调查对象、其同伴和观察人员那里搜集数据。项目于1932年、1934年和1936年对母亲进行了访谈。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每年都进行一轮数据搜集工作。在调查对象成年之后，又进行了五轮数据搜集，分别是在1953年、1958—1960年、1964年、1970—1972年和1981—1982年。这五轮后续数据搜集一般都包括访谈、健康评估、人格量表和情况说明问卷。

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奥克兰研究刚刚进入第三个十年，其研究对象已进入中年。超过200个数据集可用于电脑分析，但这些数据不能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生活的事件史。譬如，我们无法确定有多少男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也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大的比例在朝鲜战争中又重回军队。对于妇女的工作史和她们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我们也一无所知。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没有被勾画出来。这种缺陷的一个原因来自这些档案数据的存储形式。

所有机读数据都是按照年龄和/或年级、以特定目录形式组织起来的。而针对到某个时点为止的大多数分析很少能在目录中找到其他时点的相关条目。因为对生命

史没有进行编码，所以联系这些条目的年份依然是一团迷雾。数据集中没有研究对象社会经济历史信息，也没有他们成年后有关各种事件发生的一个时间表。婚姻史和抚育孩子的历史也零散不全。基于这种情况，建构生命史成为本项目的首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对于进程、时间和情境要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不同于认为社会阶层和家庭生活是静止的观点，奥克兰成长研究档案勾勒的家庭几乎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家庭的经济条件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家庭成员加入和退出劳动大军，家庭支出因为生孩子和来访者而增加，家庭消费在平衡收入和成员需求之间不断变化。这一变动不居的家庭图景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下问题：家庭对收入减少的应对措施如何建构个体生命历程（Elder，1974）。例如，一种适应方式是家庭经济从资本密集转向劳动力密集活动。物品和服务通过家庭成员的劳动来生产。在条件艰苦家庭的生产活动中，孩子和母亲被认为扮演了更为核心的角色。

家庭变化提供了一个渠道，从而把奥克兰儿童和 20 世纪 30 年代更为普遍的经济衰退和震荡联系起来。一些奥克兰家庭在这一期间损失惨重，而另一些家庭的遭遇则还好。确实有一些家庭变得更富了，因为他们所损失比例要比当时生活成本下降得少（到 1933 年下降了大约 25%）。利用 1929 年和 1933 年的家庭收入数据，我们决定把损失

超过34%的家庭归为存在经济损失。由于数据不足，我们不能对家庭经济的损失比例或变化进行连续性测量（本研究还包括了困苦程度的主观测量），因此，我们把所有其他家庭归为经济未损失的一类。基本的研究设计是分别在1929年属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内部比较经济损失和未损失这两类家庭。因此，1929年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家庭制定应对损失策略的文化和经济情境，这包括家庭经济的变化、家庭关系的改变，以及对家庭内部社会紧张关系的管理。

第二个任务集中于对个人生活的分析方式上。生活是如何被社会性地模式化的（socially patterned），以及这一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职业生涯（career）这一概念提供了工作领域中一些想法，但这仅仅是单个路径的，而生活综合了多重路径，并且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这时更有用的是年龄在不同期望中、不同阶段和类别中、不同制裁中的社会意义。总体而言，年龄和亲属地位的社会意义提供了关于生命事件和活动的社会模式化的一个视角。具体而言，这里我们指的是事件发生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ing），譬如结婚和工作，以及生命轨迹中以年龄来分级的结构。使用奥克兰档案数据来研究生活的努力促进了生命历程思维的发展。这一新的知识很快就会展现在编码形式中，在对一个变动不居世界中的奥克兰生命历程的经验性的呈现中，这一编码形式引入了进程、时间和情境概念。

为了进行编码,我们识别了三个时期:未成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未成年期关注家庭的社会经济事业。最初的成年期(即青年期)主要聚焦于向成年期转型的一些标志(某些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等等),以及建立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那几年。成年期始于35—40岁之后,该时期的工作和家庭模式已经基本结构化。这一编码中最重要的概念影响来自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 1961)在底特律进行的劳动与休闲研究。威伦斯基的项目探讨了三条生命线的交互作用,即劳动、休闲和家庭。他的编码本激发了我们思考生命转变(life transition)、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和轨迹(trajectories)这些概念。

为大萧条时期儿童研究所做的三年准备工作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突破,因为我们无法求助于"经过试错而得到好的"(tried-and-true)这一方法。档案处理是一种生命史研究设计框架下的实践,尤其是在生命历程问题和数据之间的匹配过程中。当我们决定利用伯克利指南研究(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的纵贯数据来发展一个用于比较的同期群研究时,如何处理此类档案的方法论已经非常清晰了。

伯克利指南研究档案要比奥克兰研究档案大,因为前者包含了好多代人。图2.1中的方框1指代奥克兰研究,它仅包括了两代人,大部分数据都是关于1920—1921年间出生的研究对象的。方框2中的项目表示奥克兰和伯克利

同期群大萧条经历的一个比较研究(Elder, 1979)。伯克利研究也搜集了被研究儿童的父母(年龄段包括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祖父母的数据。方框 3 中的项目关注联系不同代之间的代际动态过程(Elder, Caspi & Downey, 1986),因为父辈的行为风格会传到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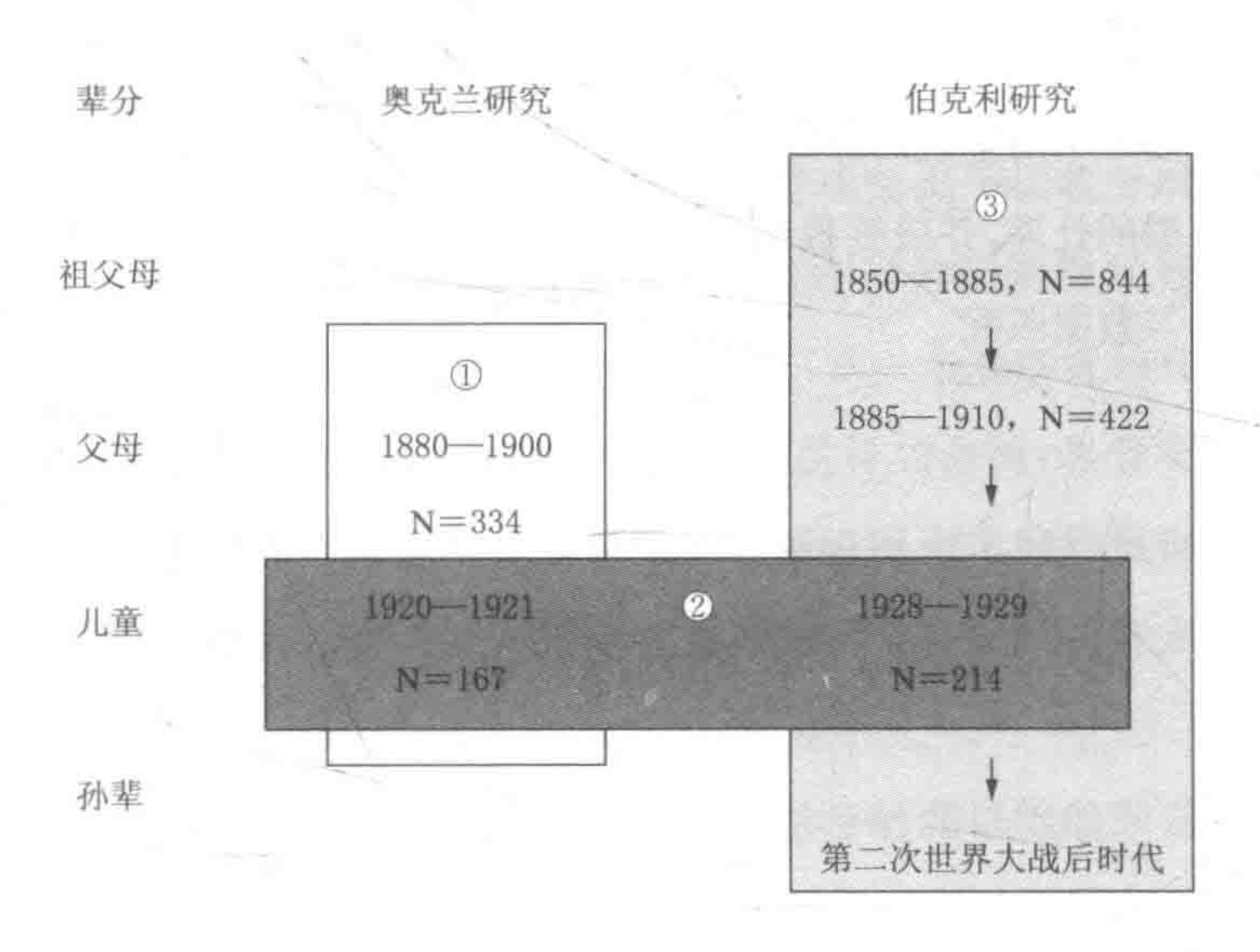


图 2.1　两个代际研究

从指南研究的最初样本成员中,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其中 214 名进行了追踪研究;其中 182 名在他们 40 岁时被追踪到,也即 1970 年。有关他们 1930 年以前出生和早年生命历程的数据于 1929—1930 年间从他们父母处搜集得到。1929—1945 年间每年都有关于父母、孩子和

家庭的数据，这些都来自研究机构的田野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观测，也来自自我报告（访谈和问卷）。父母的战后数据搜集于1969年和1973年，而他们孩子（即伯克利研究对象）的数据搜集于1960年、1970—1972年和20世纪80年代。

了解了档案处理的基本特性之后，我们设法在1972—1973年间完成伯克利研究的所有生命历程编码工作。正如本书所呈现的那样，这一路径预期了我们对特曼档案数据的处理，并最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背景，使研究问题能与数据匹配。

第 5 节 | 从生命记录到编码：伯克利指南档案

我们对伯克利指南研究档案的处理是出于比较分析之目的，即比较萧条时期艰难生活对不同的同期群的影响，无论是家庭还是各色男女的生活。从一个观察者的有利角度来说，这些档案似乎很适用于这样的分析，尽管契合的程度和对编码的要求只能通过对编码和未编码数据的实地编目才能了解。访谈、家庭观察和信件提供了许多没有进行编码的数据。

编目（inventory）建立了档案数据与研究目的的关系图，因此使得资源的利用更为高效。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材料还未被编码，哪些数据被编码了但无法用于分析，哪些编码数据可用于我们的目的。在完成这一编目的过程中，研究问题和伯克利数据（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成的数据）之间的契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例如，我们认识到可以测量萧条期间收入的损失，因此这一指标就能紧密地匹配奥克兰对 1929—1933 年间的收入变化测量，

从而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家庭总收入变化比例的指标。

在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之后，不管有没有新的编码，我们都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数据查询的方法。正如在奥克兰档案数据中看到的那样，编目并没有带来什么以生命记录形式编码和结构化的社会数据。我们已经能够知道个体和家庭在某个时间点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历程在时序上串起来，因此无法获得社会生命史。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在任何编码和重构档案数据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时序性的社会数据汇集起来，用以建构随后将成为用于编码的基本数据的生命记录。

生命记录是主要生命事件和经历的年表。传统上来说，至少存在三种方法来建立一项生命记录。生命记录可以由被访者从个人角度来建立，就像口述史那样(Hareven，1982)。其次，某人的生命记录也可以通过知情人或知识渊博的他人的视角来产生，比如配偶、知己或最好的朋友。最后，生命记录有时候是由第三方建立的，譬如临床医生或者研究者利用大量的资料，从研究对象提供的书面或口头的报告到信件、人口记录、观察资料和社会机构提供的公共文件。

通过把多样化的资料综合到一张年表中，第三种方式试图获得与手头事实相关的最为完整的资料。为了获得最为精确的信息，还需要解决不同的报告结果这一问题。

基于不同的理由，第三种方式被认为非常适合于指南研究档案的生命记录建立。田野调查人员每年都和被研究的家庭和儿童接触很多次，这些田野笔记成为档案数据的一部分。其他的数据来源包括母亲和儿童的报告、教师的评分和报告，以及来自其他各种机构的信件。

经过严格训练的项目助理首先阅读每个家庭汇合起来的资料，然后在八个专门的领域系统地建立生命记录：1929—1945年间，父亲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职业生涯；男性家庭成员的工作经历；妻子和母亲的工作经历；1929—1945年间的家庭组成；1929—1945年间，父母的婚姻关系；1929—1945年间以及1969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母对1929—1945年间生命历程的主观解读；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被研究者的成人生命历程。

开发生命记录用来提供可进行编码的、纵贯性的家庭单位、父母和被研究者的信息。汇集起来的传记信息也可以为定性的个案研究提供经验基础。这些传记信息显然是在编码过程中为了得到生命记录数据的副产品，但这些传记信息给分析者提供了很多帮助，因为分析者需要在定量数据和编年记录之间多次往返。因此传记信息本身就应当成为一个研究目标。能对生命史数据进行编码的电脑程序包括TAP、Qualpro和Ethnographer（Tesch，1990）。

生命历程分析者遭遇了很多档案上的挑战，但最为重

要的是重构数据集或研究档案以使研究问题和数据更好地契合。当我们回到历史时期,这一任务就变得更为常见。貌似颇为合适的数据集在测量和文件设计上的投入往往比预计的要多很多。至于其他的情况,在调查一个特定生命史问题时,在诸多通常并不合意的选择中,纵贯数据档案或许是最后一线希望。

奥克兰成长和伯克利指南档案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第一次拿到这两个数据时,两者都不具有完整的生命历程框架。更糟的是,两者都没有关于历史变化和经历的测量。但无论如何,这两个研究都具有潜力来发展出生命记录和关于生命与变化时间的定量数据。可以理解,现在看到这一潜力比刚开始时容易多了,但缺乏这种前瞻性或许是合适的。如果研究者一开始就知道整个故事,他或她还会开始这么一项需要如此大投入的研究吗?很可能就不会了。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的视野对于需要长时间完成的工作具有好处,因为档案处理可能需要好几年。

第 6 节 | 契合研究问题与数据

生命历程革命的一个特色是产生了大量的纵贯研究以及去追踪多年以前的研究对象。一些追踪研究使用了生命日历（life calendar）或年龄事件矩阵（age-event matrices）（Freedman, Thornton, Camburn, Alwin & Young-DeMarco, 1988），它们记录了每一个活动领域中所发生事件或转折点的具体年月。此类日历可以进行交叉检验，从而最小化了回忆所产生的误差。这些预期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项目都在为当前的研究者和需要生命史数据的未来研究者提供档案数据。

研究者试图最大化研究问题和手头最佳的可用数据之间的契合度，但研究问题和长时段的数据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如前文所述，档案数据处理一般都会涉及问题和数据之间的调整适应。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我们根据手头的数据改造研究问题，也经常为了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而重构数据。

这一匹配过程的部分工作可以在选取合适的数据集

过程中完成。我们选取某些数据集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某些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是由问题驱动的:先有问题,然后问题形塑研究进程。当能获得档案数据时,研究者需要围绕一个核心难题来规划研究大纲。那些执行自己的纵贯研究的研究者经常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设计能够被档案数据所回答的研究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数据通过决定何者可能、何者不可能来形塑研究计划。

在回顾特曼、奥克兰和伯克利档案数据时,我们已经提及了档案数据处理和寻求研究问题和数据之间最佳契合度过程中的一系列步骤(见图 2.2)。特曼研究很好地阐明了这些步骤。我们从问题设置开始,并假定在开始搜寻合适的数据集或档案之前,对于问题有深入认识是很有价值的。特曼研究符合我们的需求,因为其中一半的男性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并且服役年龄相对较晚。奥克兰和伯克利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相对较晚的动员入伍对服役人员的剥夺效应(depriving)更强。因此,特曼档案数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探索男性和开始服役时间较差的匹配关系,而服役这一转折时间点会增加离婚和职业中断的风险。在搜寻合适数据过程中,我们找不到更好的符合要求的资源。

考察过各种选择之后,准备研究计划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该计划能使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拟合得最好。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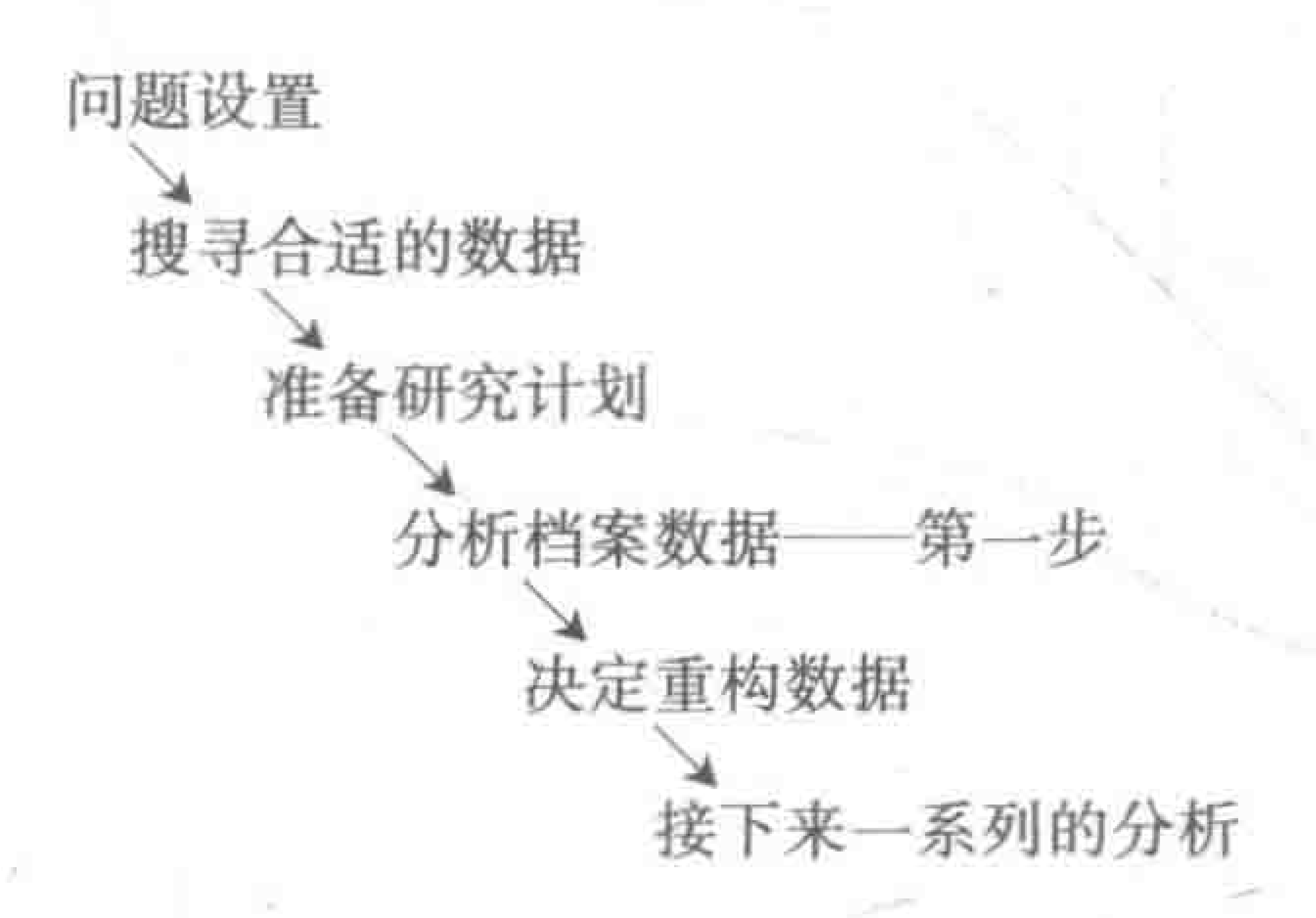


图 2.2　研究进程步骤

所述，最有效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数据的优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当前的数据和测量相比，另一个时代的档案数据会有很多局限。然而当前的数据无法研究那些追溯到历史时期的问题。

或许在准备研究计划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最初的数据分析，同时对编码数据进行彻底的编目。这一总体分析可以提供证据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构工作，它或许能提示我们去搜寻其他的数据。在认识到如果想要进行一项令人满意的研究，只有当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才决定要从特曼数据中发展一套新编码。

正如接下来的几章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尽可能地拖延数据重构工作，因为知道它涉及大量的工作。只有当进入数据分析阶段时，我们才深深地认识到迫切需要大量的重新编码工作。相比而言，奥克兰和伯克利研究中对新编码和重构的需求一开始就很清晰，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没遇到什么惊喜。

第 7 节 | 结论

本章的中心主题是把我们带回到科学社会学的早期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和墨顿(Robert K. Merton, 1959, 1968)发表的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经验研究对理论的贡献,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现难题这一任务。这些文章都完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也就是生命历程革命之前。但没有别的著作比这些文章更有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 60 年代思维和研究上的变迁,特别是它的系统性本质。理论、方法、数据和研究问题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并且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相互交织的。纵贯数据的迅猛发展挑战了理论和统计模型,而“定量方法的新发展又产生新的概念化”(Campell & O'Rand, 1988:66)。

这一变迁系统中被忽略的一个环节是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即本章的核心议题。这一关系是前面几章的核心,也是我们接下来几章将会读到的核心。档案处理要求经验研究有一个最大化数据和研究问题之间契合

度的过程。这一进程包含两个相互作用的步骤：改造问题和模型来更好地拟合既有数据；重构数据，从而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和分析模型。典型的情况是这两种调整适应是同时发生的。就理想情况而言，这一处理过程会产生更清晰的问题意识，对于分析模型有更细致的表述和更恰当的生命记录编码。虽然重构档案数据部分是通过编码完成的，但任何研究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概念性的。

第3章

重构档案

如果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无法通过现存数据得到很好的回答，那么他/她有如下几种选择。其一，彻底放弃该项目，转而研究其他问题，但这一方法实际上很少是可行的。其二，可以对问题进行改造以获得更好的契合，或者重构数据以更好地回答问题。当然也可能同时进行这两种调整。本书作为重构数据的指南，我们聚焦于重构过程并为每个步骤的实际操作提供必要细节。

重构数据的决定不应当轻率，因为这会涉及长时段的智力和物质资源投资。重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重新编码。重构或许包含一些重新编码，但最重要的操作是包含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并对数据进行形塑以满足更好的经验性检验。

本例中的数据不是被重新编码，而是被重构从而产生对概念的全新测量（参见图3.1）。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各个步骤分成两部分：评估和重构。第一部分（灰色方框）表示档案数据的评估阶段；第二部分（白色方框）表示重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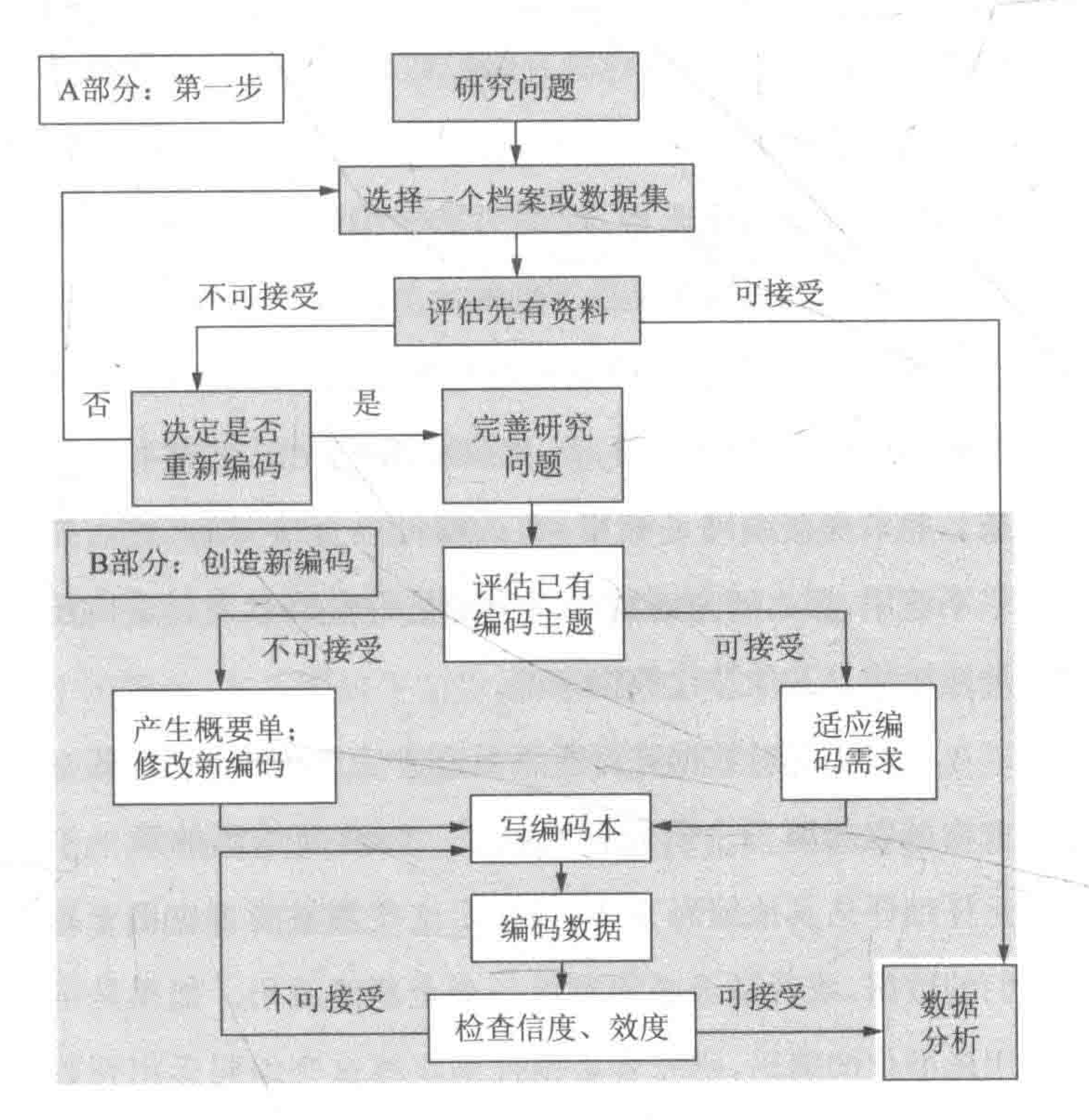


图 3.1　重构档案：决策过程

第一部分意味着选择和评估某个档案数据。近些年来，研究者很少对二手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因为无论是横截面还是纵贯研究，其研究设计都日趋复杂、兼收并蓄，并且适用于很多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方法。而且目前研究中的数据搜集工具也往往高度结构化，以至于很难对测量进行彻底重构。但是一些研究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关社会和历史变迁的问题，只能通过更旧的档案材料来进行回答。这些档案材料不是为了回答今天的研究者所感兴趣的问

题而搜集的,因此当前的研究路径往往需要对档案重新进行处理。幸运的是,在更旧的档案中,我们往往能得到原始问卷和其他数据来源,这就为重新编码提供了可能,而这在当前的数据集中是做不到的。

基于这些原因,任何想使用档案数据的研究者必须仔细评估现存编码的质量,以及重新编码的潜在成本与收益。如果现存编码足够用,那么就可以直接开始分析;如果不够用,那么研究者就必须决定是否对档案进行重构还是继续搜寻其他替代数据来源。

一旦决定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并完善研究问题,那么重构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创造新编码的第一步是仔细评估其他编码方案,以决定这些测量能否应用于我们的数据,或者是否必须发展一套全新的编码。如果是运用标准化的编码,研究者必须仔细审核这套编码运用到数据的整个过程。

然而,如果研究问题或数据形式使其他的编码方案都不适用,那么我们推荐开发一张概要单(summary sheet)来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目,以帮助开发新的编码。关于创造和使用概要单的更多细节会在下文步骤4之后进行讨论。完成这些预备性的步骤之后,用编码本记录新变量和新编码。然后,对案例进行编码,最后对新编码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估计。如果数据是可接受的,就可以开始为数据分析做准备工作了。如果信度或效度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研究

者必须回到编码本，完善编码，然后重新进行整个编码操作过程。

在本章中，我们以对特曼档案中1945年至1986年间搜集的男性数据建构新的健康编码为例，来阐明编码的整个流程。为特曼男性创造健康编码是一个说明如何利用某个档案潜力的很好的例子。特曼研究从未被设计要研究健康，但即使每一轮调查只搜集很少量自我报告的健康和疾病信息，就能够对健康进行重新概念化，把它当作一个短暂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展开的过程。我们对健康的临时概念化是为这些数据专门设计的，但评估、改造、操作化和再评估这些步骤并不是专门化的，它们是任何档案数据重构的基本步骤。

第1节 | 第一步

步骤1:评估现有资源

任何档案数据的使用都必须由一个可研究的问题来引导,这一问题能够让研究者决定数据是否适合,如果不适合,那么重构数据是否必要和可行。我们对健康的兴趣源于一个更大的研究方案,该方案关注服役经历和成人阶段的发展。我们尤其关注服役经历如何影响他们退伍之后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对他们长期的健康和老龄化模式的影响。特曼档案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包含一份1945年的附加问卷,并且在每一轮调查中都重复问了几个相同的健康问题。

特曼档案的另一个优点是所有的调查数据都被编码、输入、记录下来,并且可以从位于安娜堡的政治社会研究校际联合会(ICPSR)的电脑磁带中获取这些信息。在接触特曼档案时,我们认为可以使用这些已经编码好的数据。

和所有的二手数据分析一样，我们先把1945—1986年所有已经进行过编码的健康信息汇集在一起(参见表3.1)。

表3.1　特曼文件中的健康信息(1945—1986年)

调查年份	年龄	变　　量
1945	35	1940年以来总体生理状况；近年来的疾病、手术、事故；情绪压抑的倾向
1950	40	1945年以来总体生理状况；近年来的疾病、手术、事故；情绪压抑的倾向；酗酒——如果存在酗酒，如何处理的
1955	45	1950年以来总体生理状况；近年来的疾病、手术、事故；情绪压抑的倾向
1960	50	1955年以来总体生理状况；近年来的疾病、手术、事故；情绪压抑的倾向；酗酒——如果存在酗酒，如何处理的
1972	62	1970—1972年的总体健康状况；生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主要变化；精力和活力
1977	67	1977年的总体健康状况；生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主要变化；与同辈相比健康状况如何；精力和活力；幸福感
1982	72	1976年以来的总体健康状况；生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主要变化；引起担忧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的倾向；需要人照顾和护理的程度；精力和活力；最近两个月以来的情绪状况；幸福感
1986	76	1981年以来的总体健康状况；生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主要变化；引起担忧的健康问题；需要人照顾和护理的程度；最近两个月以来的情绪状况；酗酒——如果存在酗酒，采取了什么措施；精力和活力；幸福感；令人伤神的健康问题
总体		去世时间和大概的原因

在查看健康数据之后，我们从三个重复测量的自我报告项目中受到很大鼓舞。它们分别是：(1)自上一次调查以来的总体健康状况；(2)近些年所遭受的疾病、事故或手术；(3)情绪上的不安或焦虑倾向，包括发生时间、困难的

本质和如何处理的（治疗还是住院）。在1945—1986年的八轮调查数据中，这些问题每次都被问到了。此外，虽然数据是以横截面的形式编码的，对上次调查以来健康状况的回顾性问题能够填补两轮调查之间的间隙，从而产生每位被访者的健康史。

我们知道必须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才能使档案符合我们的要求。但电脑磁带上已经编码的数据似乎足以回答当前的研究问题了。直到不久以后，我们才认识到最初的编码是不充分的，而且是无法补救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些资料，并最终决定完全重构这些档案。我们仔细讲述这一挫折是为了说明利用已有编码的可能性及其局限。

为了利用已有编码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从最有希望的生理健康指标开始。在所有的1945—1986年间的八次调查中，被访男性都列出了他们的疾病、手术或者精神和生理健康方面的主要变化。结果得到了一组包含98项医学情况的编码（参见表3.2）。一些是我们熟知的情况，比如糖尿病和帕金森症，另一些是常见的手术，比如胆囊或前列腺手术；然而其他一些编码的含义则更为模糊，比如“行动迟缓”、“疲劳”或“孤独”。

我们的研究兴趣不在于症状或情况，而在于它们对日常功能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方法把生理情况转化为损伤测量，来比较不同调查之间的损伤水平。我们采用

表 3.2　七轮特曼男性调查中的健康状况实例表(1945—1986 年)

记忆缺失	孤独、不开心
精力衰退、疲劳	脓肿、蜂窝组织炎
肝炎	恶性贫血
糖尿病	髋骨折
高血压	髋关节置换
心肌梗塞	充血性心力衰竭
动脉硬化	中风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心绞痛
心率不齐	焦虑、神经过敏
抑郁	痛风
多发性硬化症	偏头痛
酗酒	帕金森症
脑炎	肺癌
肠癌	腹部肿瘤
皮肤癌	白血病
视网膜剥离	前列腺癌
前列腺手术	肾结石
脑震荡	胆囊手术
憩室病	痔疮
消化性溃疡	痔疮切除手术
阑尾炎	肝硬化
肺结核	哮喘
肺气肿	肺炎
肺栓塞	失聪

了累积疾病评定量表(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Linn, Linn & Gurel, 1968)来评定每种症状或情况的损伤严重程度,具体如下:

0=没有:没有损伤。

1=轻微:损伤没有影响正常的功能;治疗可有可无;预后非常好。

2＝中度:损伤影响到正常活动;需要进行治疗;预后较好。

3＝严重:损伤导致能力丧失;亟须治疗;预后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4＝非常严重:损伤危及生命;需要急诊或者治疗已经没什么用了;预后是黯淡的。

我们请四位医学专家根据这个量表对98项医学情况做出各自独立的临床判断。譬如,这些专家要考虑判断中风或腿骨折对个人的家庭和职业生涯的危害程度。为了决定被访者所经受的大概损伤程度,当这些情况是第一次被提及时,我们要求打分的专家“与你所观察过的所有其他病例的平均情况相比,对最能表明个人在出现这些症状时相关功能的损伤程度进行打分”。

四位打分专家中的两人是内科医生,拥有内科医学执照。其他两人是拥有高级学位的护士,其中一个是公共医学博士候选人,另一人是心理学博士。每位专家都至少拥有五年的临床经验。当四位专家对不同情况所给分数的一致程度超过80%,这一医学专家意见就通过了。我们非常开心得到了这一与预期相符的高质量损伤数据。于是接着进入分析阶段,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主要的难题。

首先,通过考察连续的几轮数据间健康和年龄与教育等其他变量的基本相关情况,我们检查了所制定的测量的

效度。根据研究文献，教育应当与健康存在适度但却显著的相关，而随时间推移，年龄对健康的预测程度也会增加。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些基本的想法没有得到支持，这令我们很困惑。年龄和教育的作用在不同测量之间变化起伏很大，完全没有逻辑一致的模式可言。在某轮调查中，年龄和教育是健康的显著预测变量。但在下一轮调查中，这种关系却消失了，而在接下来的一轮调查中，这种关系又显著了。基于这些不均匀的发现，我们认为之前所制定的损伤测量是无效的，除了一些随机结果之外，它使我们一无所获。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回到了“对上次调查以来的疾病和手术情况”的原始应答上。在比对了实际的调查应答之后，我们对数据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损伤编码虽然基于打分专家的高度共识，但却不能反映真实的损伤模式。举个例子，从两名存在所谓的肌肉骨骼问题的男性的原始应答中，我们发现了非常不同的医学情况。其中一人报告“手扭伤了”，而另一人则是“瘫痪”。在另一对案例中，一名男性报告轻微的溃疡促使他限制了饮食；而另一人则需要做溃疡手术。虽然在疾病严重程度上差别很大，但这两个人都被编码为“溃疡”。这些例子表明，我们所处理数据中的损伤指标不够，对现有编码的任何操作也无法纠正这一基本问题。

步骤 2:决定重新编码

接下来,我们重新评估资料,包括原始调查应答,以决定创造新的健康编码是否会卓有成效。重构健康数据这一最终决定涉及三个基本问题:

1. 原始调查应答是否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创造比现有的编码更好的编码,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获取这些数据?

2. 这些健康数据是否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局限?

3. 就理解健康而言,这一档案的长处是什么,是否存在某些方法使这一数据的潜力最大化?

基于先前的观察,我们认为原始调查应答比现有的健康编码更有优势。有关疾病和手术的问题是开放式的,有足够空间让被访者进行详细说明。类似地,有关情绪难题倾向的问题也提供了数行空间让被访者提供详情。情绪健康问题特别询问了这些难题发生的时间和性质,如何处理这些难题,以及被访者目前的情况。对个案资料的考察告诉我们被访者知道的都很多,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很坦率,他们经常提供很多关于重要健康问题的详细信息。这些定性资料提供了详尽生动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史信息,而

已有的编码却无法涵盖这些信息。这些资料还表明这些男性疾病经历的多样性。

特曼研究的主任慷慨地准许我们在斯坦福使用原始数据。但主要问题是重新编码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州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幸运的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员工已经从斯坦福大学拿到了被访者工作和服役经历资料的复印件。这样我们手头就有了每个被访者的信息,包括部分调查资料、被访者的来往信件、报告、报纸和访谈录音。这些资料包括了 1945 年、1960 年、1972 年、1977 年和 1986 年有关健康问题的原始应答。当把电脑磁带中的这些二手数据信息(比如死亡日期和总体生理健康状况)汇集起来之后,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已经足够用来发展一套健康编码,而不用再去斯坦福大学了。

其次是关于健康数据局限的问题。原始数据是否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即使我们细致地发展了新编码?譬如,自我报告是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这极大地依赖于被访者阐明自己日常生理心理状况的能力和愿望。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表明,自我报告的总体健康状况是生理健康和死亡率的可信预测变量,尤其是在同一性别和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进行比较时(Idler & Kasl, 1991; Maddox & Douglass, 1973)。特曼样本的同质性以及较高水平的教育,使我们对自我报告和特定健康问题汇集后信

息的信度更有信心。很快,我们就了解到大部分特曼男性对自己的健康问题都很了解,而且他们经常获取关于症候学、临床症状和对于癌症或心脏病等疾病的医学管理的详细知识。

除了担心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信息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不同轮次的调查在提问的措辞上存在一些差别,有些措辞在某些调查中间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只有等了解档案的长处之后,才能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进行评估。档案的长处是否多于其局限,抑或是否其他的数据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特曼档案提供了60多年的纵贯数据,使研究者可用以分析健康问题的前因和长期后果,包括测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经历的后果。丰富详细的个案历史包含了大量可能影响健康的因素的信息,包括个人背景、婚姻和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娱乐和志愿者活动以及生活满意度。进而,这些个案历史再加上足够的样本量就使我们既能进行定量分析,也能进行定性分析。最后,虽然一些调查问题的措辞随时间而有所变化,但多数健康测量和其他指标在不同轮次的调查之间是具有可比性的。

这些长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来对这些男性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和长达40多年生活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进行考察。因此,我们认为在考察

长时期的健康模式方面，特曼档案的长处远远超过了其局限。

步骤3:完善研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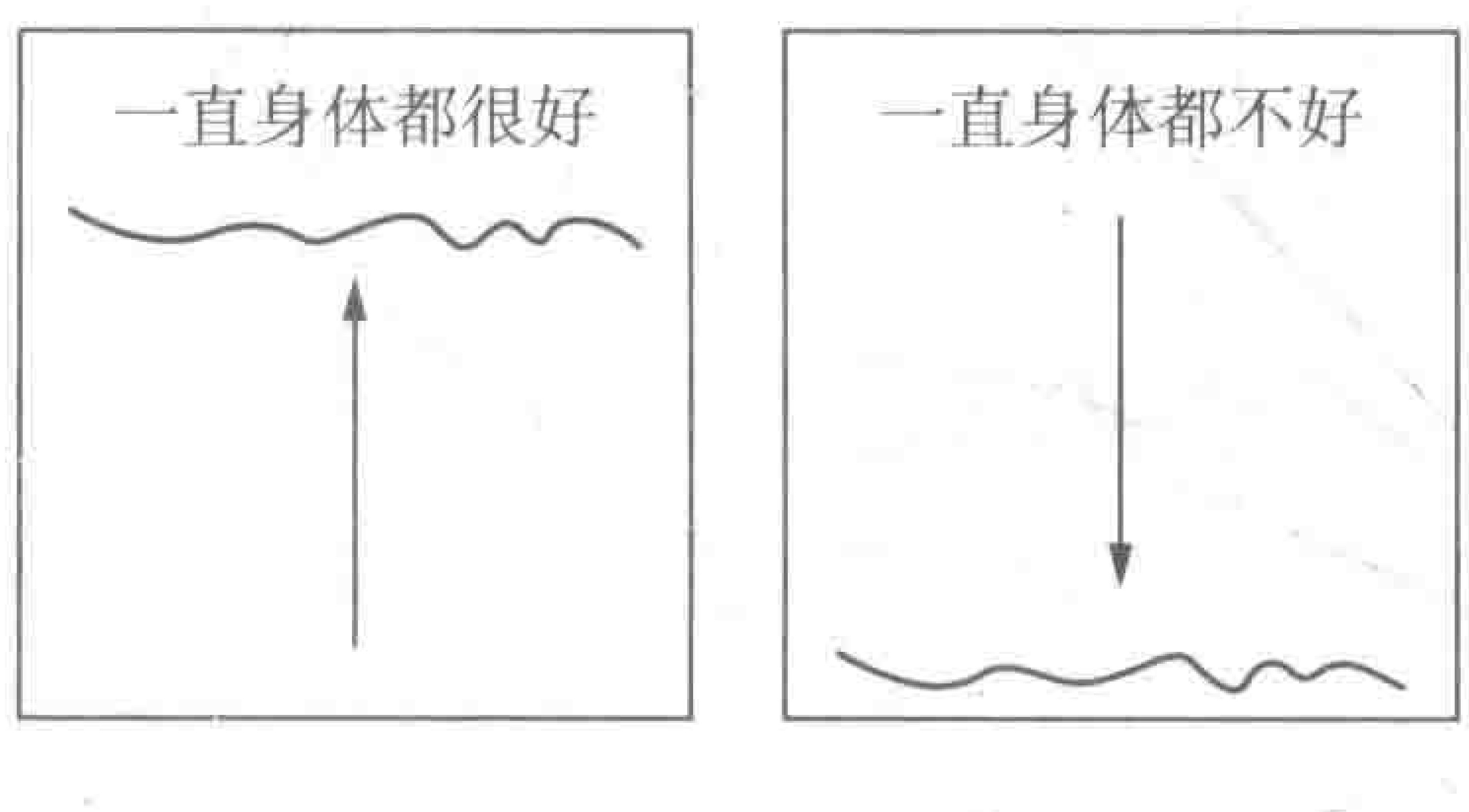
回到概念化研究问题这一阶段，重构健康数据的决定为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潜力。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修改后的问题和新编码必须建立在发挥档案长处的基础上，而非避免其短处。除了健康与服役数据外，特曼档案的另一个主要长处在于被访者成人阶段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信息非常详细。新的研究问题应当通过探索几十年间健康、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把工作和家庭维度囊括进来。因为我们已经决定重构健康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形成新的研究问题，以使我们能够用其他类型的调查数据所无法采用的方式来考察健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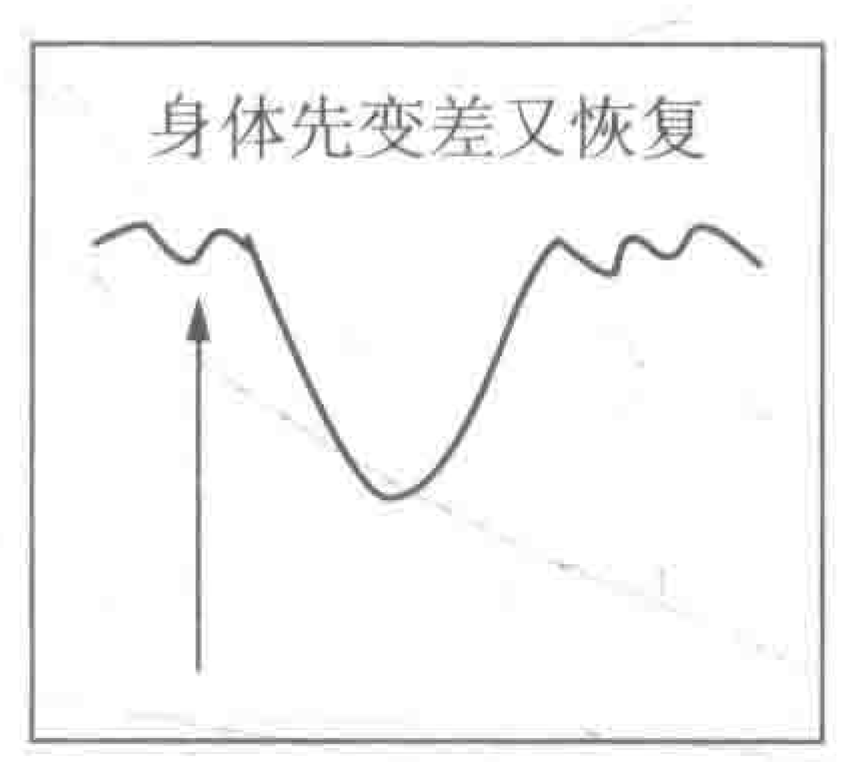
为分析随时间变化的个人健康状况和个人之间的健康差异，我们可以使用同期群、事件史和汇总时间序列方法。但对特曼个案历史的分析表明，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生命历程轨迹(trajectories)不是简单地看一个横截面到另一个横截面的健康变化。虽然关于健康轨迹的科学知识在临床个案研究领域之外还不存在，在特曼数据中我们却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些模式。比如说，大量男性都有相对稳定的健康史。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的生理或心理素质

非常优良,并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都表现出良好的健康状况。相比之下,其中一小部分人则显示出体质虚弱,经常成为疾病或事故的受害者。其他人的健康状况则存在波动,不管是存在轻微的还是严重的问题。

健康变化的方向和速度貌似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恢复的情况以及受损的部位都有关系。对一些人来说,身体变差的情况虽然较少出现,但也的确发生了,比如一个健康人到中年经历心脏病之后虽然已经恢复,但健康状况还是会下降。在其他案例中,更为经常或零星的健康状况下降与急性病症(如肺炎或交通事故)或慢性病(如糖尿病和关节炎)有关。

或许对健康轨迹概念最好的介绍还是来自特曼调查中被访者自己的话。下面所摘录的内容是被访者在其成年和老年阶段的不同时间主动提供的。“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在 1962 年患心脏病之前,我的身体一直非常好……但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了”、“我的身体一直都算不上好,即使是在儿童时期”、“我一直都属于焦虑型,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在我得病(癌症)之后,我就不得不退休了……现在我不得不限制自己”、“我已经被抑郁症反反复复折磨好几年了”。这些表述反映了正在发生的生理和心理过程。每一句话都抓住了跨越不同时段和健康状况的变化,同时也描绘了一条轨迹(参见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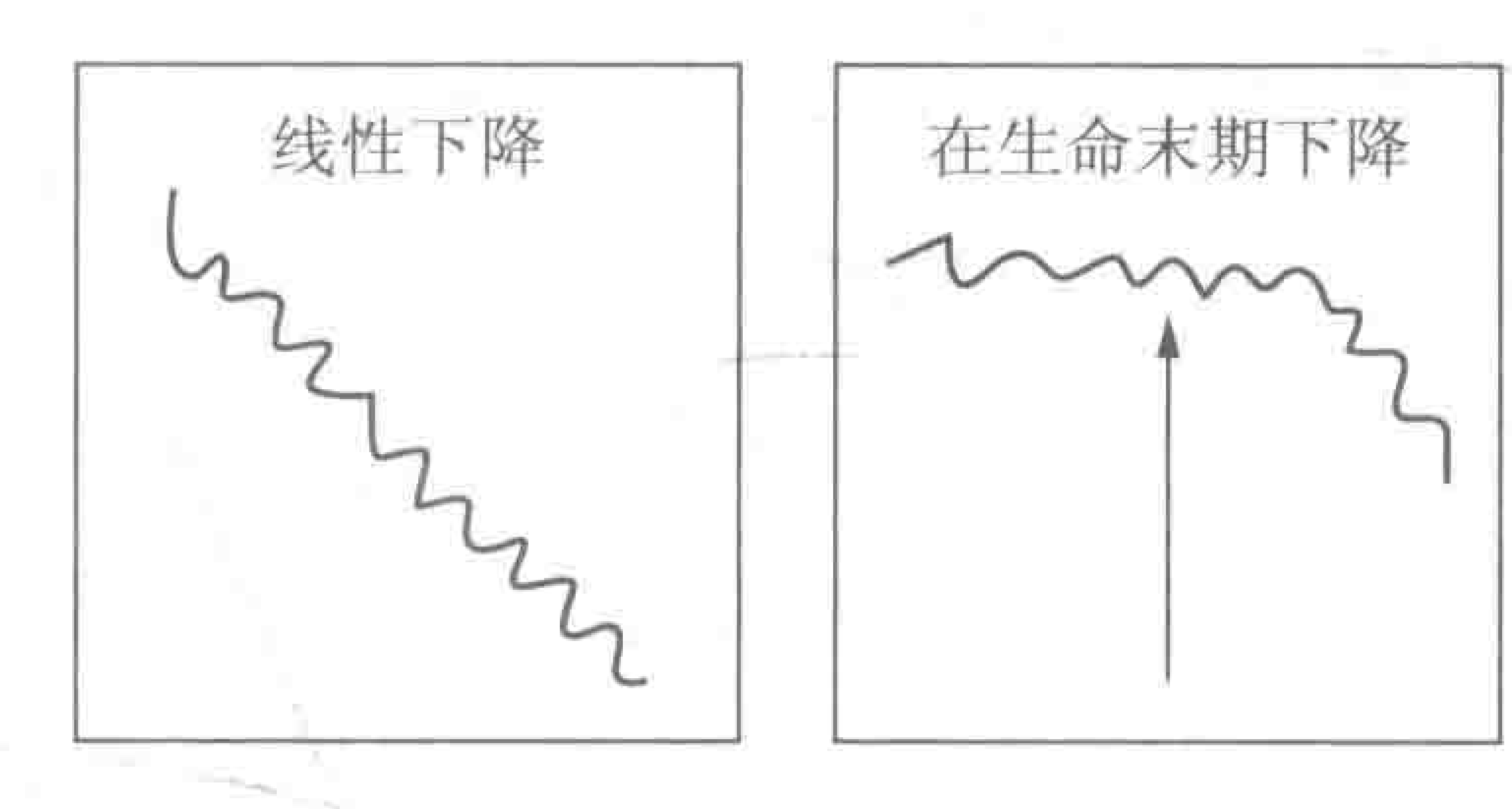


图 3.2 生理健康轨迹

基于这些观察，针对成年期和老年期的健康动态，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大多数个体在长时段内的生理心理健康的主要轨迹是怎么样的？与不同的轨迹相联系的背景因素和医学状况是什么？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轨迹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两者才出现差异？最后，具有不同轨迹的人（比如经历了健康状况下降而后又恢复的人与那些健康状况一直良好的人相比）

相互之间如何产生差异，什么因素与这些差异最密切相关？

第二组研究问题建立在档案的丰富基础上，对健康与男性生命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进行模型化。我们尤其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关因素如何影响健康感兴趣。我们能否找出家庭和/或工作事件（譬如工作晋升或婚姻状况的改变）与生理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这些事件对健康的影响是否会因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职业生涯和家庭成功如何影响长期的健康状况和死亡几率？探索这些问题能够使特曼档案中详尽的健康、家庭和职业历史信息得到完全的利用。

最后一组问题与我们最初对服兵役和健康的兴趣有关，同时也是基于健康新编码所承诺的更大的灵活性之上。除了能够评估服役对总体健康的影响之外，现在我们还能专门考察服役对心理或行为问题的影响，譬如焦虑、抑郁、溃疡和酗酒。服兵役或参加作战任务是否增加男性罹患这些病症的可能性？如果是，那么他们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刻会患病还是要在几年之后？

健康研究的这三个领域（个人轨迹、健康和职业/家庭、健康和兵役）证明了我们重构健康数据这一决定的完全价值所在。新数据似乎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健康测度，并且显著提升了我们回答新的有关健康进程问题的能力。

在接下来一部分，我们概述如何把概念转换成可信测

量的几个必要步骤。继续以健康为例，我们将阐述在某个领域内组织数据的方法，以及为创造编码本和编码表格提供指南。最后我们讨论评分者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及其评估。

第2节 | 创造新编码

步骤4：评估可能的编码方案

重构档案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在搜集数据完成之后很久才定义新的概念和进行操作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可获得的信息来对相关文献中的标准测量进行修改，甚至需要自己制定新的测量。虽然在讨论评估数据的长处和局限时，我们简短提及了这个问题，但这一步骤中，研究者必须决定是对标准化的编码方案进行修改以符合他们的需要，还是发展一套全新的编码。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首先，是否存在一个编码方案使研究问题能够得到回答？在我们的健康项目中，生理和心理健康测量以及更为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情况（焦虑、抑郁、溃疡和酗酒）测量可以依靠标准化测量，但健康轨迹这一概念是全新的，因此必须完全依赖手头的数据。其次，现存的编码是否契合已有的数据？

数年前发展的抽样调查问题很可能和当前发展出来的问题不同，甚至能够很好契合数据的概念也不得不进行修改以考虑问卷的差异。当处理档案数据时，在任一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应当做好准备在概念、测量和数据之间多次回还往复。

在健康例子中，对于把标准化测量不仅仅作为一个基本指导方针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一个较大的障碍。文献中的很多健康测量都是基于近期的数据搜集，这些数据设计都是用来获取专门信息的，包括一个长检查单让被访者回答一系列潜在的健康问题。与之相反，特曼档案中的问题设计都是用来搜集一般健康信息的，而且主要依赖于开放式问题，这就导致得到的答案非常的多样化。因此，我们需要设计相对一般性的生理和心理损伤测量，这样就能很好地利用被访者提供的一般性和专门化信息。

在决定设计新编码之后，研究者接下来要做的是对数据进行彻底的编目。为每位被访者制作一张概要单提供一个标准框架，以便于回顾每个案例的信息、抽取所有感兴趣的一般性和专门化信息（譬如健康），以及把所有信息组织到同一个地方。虽然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概要单使研究者熟悉数据，对于未来的研究而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事实上，我们发现概要单是如此有用，以至于在依靠标准方案时，我们都会把它作为编码操作化的一部分。

在健康例子中,我们最初以为可以依靠标准化编码,因此为每个编码后的案例填写了一张概要单。然而,填写概要单的过程帮助我们彻底修正了原有的概念,从而需要定义新概念并对所有案例进行重新编码。例如,我们遇到了与抑郁、焦虑和酒精消费相关但出乎预料之外的症状模式。只有在对所有案例进行编目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被访者所报告的健康信息和疾病模式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第二次编码补充了第一组编码,并增加了精确度,使我们能更好地定义健康状态和捕捉健康动态。其他的编码操作或许能更多地依赖已有的编码(参见稍后第 4 章的职业生涯例子),从而研究者能够把填写概要单和实际编码这两个步骤合并。

概要单的设计取决于我们要从案例档案中获取什么信息。不管研究领域是什么(譬如健康、创新性、生育率、工作),研究者都需要记录和组织与该领域相关的所有信息。由于我们的理论旨趣在于临时进程(temporal processes)和生命历程,因此我们使用调查年份和三次重复测量的自评健康情况来组织每位被访者的健康史。图 3.3 是一张填写好的概要单。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关键的信息点是如何迅速概括某个时间点上的健康状况和即时的健康模式。概要单的每一行记录了每一轮调查中健康的多个指标,而每一列则记录了跨越四十多年的所有指标。

编号：0515

健康概要单

年份	总体生理情况	心理问题	疾病和处理
1945	非常好	无	感冒 1950—高血压—未治疗
1960	良好 中度饮酒	无	1955—高血压治疗 1957—中风
1972	良好，精力充沛	无	无
1977	良好，精力充沛	无，很幸福	高血压，进行治疗
1982	缺失		
1986	下降情况： 听力：______ 视力：______ 缺失 健康：______ 肌肉强度和控制：______		

1953，离婚

1957，因严重疾病被迫退休

1962，恢复训练

述说“在54—58岁之间从1957年的严重中风中恢复过来，那时昏迷了10天，完全瘫痪了”。

图 3.3 健康概要单的例子

我们在图 3.3 中呈现的案例说明了通过重构而获得的额外信息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这个人对自己总体生理健康状况的评价，他在 1945—1977 年间看起来似乎都保持了良好的健康状况。但他有关疾病和手术的报告却告诉我们一个更为完整的故事。我们看到他曾进行高血压治疗，并在 1957 年中风，但似乎到 1960 年已完全恢复。只有通过其工作历史我们才了解到其中风的严重程度。在 1977 年调查中问及工作时，被访者表示他不得不临

时退休4年。当在同一次调查中问及生命转折点时,他回答说曾昏迷10天。我们不仅了解到这个人疾病的严重程度,而且还了解了他的康复能力,因为他最终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到1977年都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不同于他自我报告的"一直保持良好健康",这个人显然经历了一段严重损伤阶段,之后又康复了。有关去世时间和原因的信息也会在恰当的位置记录下来。

步骤5:编写编码本

完成概要单以及对相应的概念进行清晰定义之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在编码本中记录每一个编码。和以前的步骤一样,为了完善每一个编码的定义,编码本的编写过程也需要在研究问题、测量和数据之间回还往复。完整的编码本应当包括如下部分:

1. 对档案及其内容的完整描述,包括记录背后有关研究目标的背景信息;
2. 概念定义和每一个编码的具体实例;
3. 对每个变量进行编码的法则。

在健康编码项目中,我们发现清晰的记录数据尤其重要,因为之后的决策是基于部分而非完整的案例档案,将

来的研究者可能需要考虑这一点。

编码本的核心包括变量定义、对应的编码以及每个编码的实例。表 3.3 显示了我们对每次调查中生理健康的测量。在表的最上面，我们列出了变量名和概念定义。这一测量主要基于对总体生理情况和提及的任何疾病、事故和手术的自我报告内容。与生理健康有关的额外信息（如酗酒）被包含在我们的评价中。新的生理健康编码与已有的自我评估一样，都是一个四分量表，但增加了来自被访者报告的更为详尽的疾病信息。譬如，如果某人的报告特别说明发生过轻微可恢复的症状（手腕扭伤）或轻微的慢性病（哮喘），我们就把他编码为生理健康“良好”。

即使是最直接和清晰定义的测量都无法完全契合每一个案例。因此，编码本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提出系统处理模糊案例的编码法则。案例 515（参见图 3.3）是一个需要运用此种法则的很好例子。总体生理状况的报告和疾病与手术情况不相一致。在 1960 年，被访者因为中风还不能参加工作，但是他宣称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决定这些不一致情况的编码法则列在表 3.3 的底部：我们将按照报告的最低健康水平进行编码。在这一例子中，最低健康水平是被访者因为 1957 年的中风，在 1960 年仍无法工作。到 1960 年，他已经有所康复，但从角色功能的角度而言仍然处于损伤之中，因此，基于我们新的编码方案，我们把他 1960 年的健康状况编码为一般。

表 3.3 定义编码:健康编码本中的实例页

PHLT45S2—PHLT82S2＝调查年份的生理健康自我报告(基于所有健康信息)	
变量名	编码/实例
PHLT45S2 PHLT60S2 PHLT72S2 PHLT77S2 PHLT82S2	2＝非常好:报告没有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问题,除了一些感冒、轻微过敏症状等所有人经常会经历的症状。 3＝良好:急性的可恢复的症状或轻微慢性病,但没有生理健康损伤。实例:胳膊骨折、痔疮切除、其他孤立的受伤;肺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疝气修补、需要治疗但无其他并发症的高血压、需要治疗但无并发症的前列腺问题、不需要治疗的“胃病”或溃疡、良性肿瘤切除、轻度皮肤癌治疗、轻度头痛、关节炎、轻度知觉障碍。 4＝一般:确定出现生理健康损伤状况、慢性或严重急性病症。实例:轻度心脏病、中度事故或受伤、糖尿病、溃疡手术、孤立的癌症手术(如息肉)、胆囊手术、轻度中风、酗酒、狼疮、对生活产生限制的严重高血压、非梗阻性肺气肿、对生活产生限制的严重关节炎、引起损伤的带状疱疹、严重头痛、引发不可修复损伤的严重知觉障碍(如无法开车、失明)。 5＝差:生理健康受到严重损伤,预后可能是死亡。实例:肺癌、白血病、严重中风或心脏病,转移性肿瘤、肝硬化、老年痴呆症、肠胃出血、肺气肿或其他导致立刻或不久死亡的情况。 9＝缺失(包括死亡)。
法则: 如果报告的总体生理状况和疾病或心理问题不一致,以报告的最低健康水平来进行编码。实例:R 总体状况报告“一般”,没有疾病或心理问题,把健康状况编码为“一般”;R 报告总体状况“非常好”,但报告他患有高血压,且正在治疗中,那就编码为“良好”。 如果 R 在调查年死亡,判断当年的发病率,而非死亡率。因此,如果死亡是因为一场突发事件,比如事故、心脏病或者没有事先症状预兆的中风,那就不要把这一事件纳入到发病率评估中。	

步骤 6:对案例进行编码

一旦某个领域的数据已经从案例文件转成了概要单,

并确定了编码和法则，编码就可以开始了。这一进程还包含预编码或实际编码之后的测试阶段。预编码阶段可以识别出未来有关变量定义和编码法则的问题，并且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审视编码的最终形式。例如，直到对健康变量进行预编码并审阅了概要单之后，我们才能把被访者经常提及的一些情况整合到编码本中。我们发现大约有 10%—20%的案例可能需要在实际编码之前进行预编码。

对每个案例的编码完成之后，其取值被记录在一张表格里，该表格列出所有变量名，后面留有一定空白用于填写适当的编码。这张表格应当根据项目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并且很容易填写和阅读，因为最终数据的精确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码表格的清晰程度。编码表也是评估新编码方案的一个重要的最终节点，因为它决定了输入电脑之后的数据样式。出现在表格上的这些编码是否充分捕捉了概要单的丰富性呢？它们的形式是否符合数据分析的需要，并且该形式是否足够灵活以符合其他类型的分析呢？如果不是，该编码方案就需要重新进行评估，或者重新设计，以符合这些研究目标。

图 3.4 是健康项目中的一张编码表，表格上方是标题和案例编号。每一个变量后面都留有足够的空格，便于填写适当的编码。我们按照主题领域，对变量进行分组。对变量进行分组能使变量单的创建更为轻松。在健康项目

例子中,表格的上半部分囊括了所有的每个时期的总体生理和心理健康变量;而下半部分则是更为细致的变量,包括焦虑、抑郁、溃疡、饮酒、战时经历、心理弹性、生理和心理健康轨迹,以及参加过多少次专业的生理心理问题咨询。这一表格应当和编码本中变量的顺序相一致。

编号#:_ _ _ _

健康编码,特曼男性,1945—1986 年

	PHLT45S2_______	EHLT45S2_______
(1940—1952)	PHLT45I2_______	EHLT45I2_______
	PHLT60S2_______	EHLT60S2_______
(1953—1966)	PHLT60I2_______	EHLT60I2_______
	PHLT72S2_______	EHLT72S2_______
(1967—1974)	PHLT72I2_______	EHLT72I2_______
	PHLT77S2_______	EHLT77S2_______
(1975—1977)	PHLT77I2_______	EHLT77I2_______
	PHLT82S2_______	EHLT82S2_______
(1978—1982)	PHLT82I2_______	EHLT82I2_______

ANX402_______	DEP402_______	ULCER402_______
ANX532_______	DEP532_______	ULCER532_______
ANX672_______	DEP672_______	ULCER672_______
ANX752_______	DEP752_______	ULCER752_______
ANX782_______	DEP782_______	ULCER782_______
ALCSEV2_______	WARPHYS2_______	ERESPR2_______
ALCAGE2_______	WAREMOT2_______	ERESPR2_______
PHLTHIS2_______	EHLTHIS2_______	
PTX2___ ___	PTX2___ ___	

图 3.4 健康项目编码表

案例编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把所有编码从编码表中导入到计算机文件中。数据输入的最重要目标是精确和效率,因此,所有数据都必须输入两次,以便检查输入的精

确度。在编码时，我们发现 SPSS/PC DE 是最为灵活方便的程序。它包含了很多特性，比如复核输入值，能够对屏幕进行设置以契合编码表，还能定义“跳答”规则，当数据包含跳答时增加了输入效率。

步骤7：评估效度和信度

评分者间信度。新数据的质量取决于给定编码的信度如何。其信度可以通过比较两个或更多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来进行评估。一个经验法则是计算不同编码者在所有案例的10%随机样本上的一致性。选择哪一个计算一致性的统计量主要取决于被编码变量的矩阵。

当被重新编码的变量是分类的（两个或多个类别），适合的统计量是 kappa 系数（Cohen，1968；Fleiss，1973）。kappa 系数比卡方值（chi-square）和比例一致性（percentage agreement）更好，因为它严格测量了一致性，而其他统计量包含了所有种类的相关性测量。同时，因为 kappa 系数纠正了偶然一致性（chance agreement），尤其当表格的边缘分布高度偏斜时，因此它是更合适的统计量。对于两个编码者，kappa 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kappa=\frac{(\text{总体一致性}-\text{偶然一致性})}{(1-\text{偶然一致性})}$$

基于表 3.4 的 A 部分，

$$总体一致性=\frac{(a+f+k+p)}{T}$$

$$偶然一致性=\frac{\frac{(行1\times列1)}{T}+\frac{(行2\times列2)}{T}+\frac{(行3\times列3)}{T}+\frac{(行4\times列4)}{T}}{T}$$

kappa 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 到+1。如果 $\kappa=0$，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并不比偶然一致性高。如果 $\kappa<0$，一致性低于偶然一致性。如果 $\kappa>0$，一致性高于偶然一致性。kappa 系数的统计显著度可以通过计算其标准误从而决定其 z 值（参见 Fleiss，1973），但一般的经验法则是认为 kappa 值在 0.2 到 0.4 之间表明一致性一般，0.4 到 0.6 之间表明中度一致性，0.6 到 0.8 之间表明一致性较高，0.8 到 1.0 之间表明几乎完全一致性（Landis & Koch，1977）。

在健康研究一例中，在编码操作中的不同阶段，我们进行了九次信度检查，涉及比例超过了 856 个案例中的 10%。我们的两名编码者在信度检查中分别独立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码，对每个变量的编码进行交叉表分析。如表 3.4 所示，B 部分显示了 1945 年生理健康的最终交叉表。其中 12 个案例存在缺失数据，使总数 T 从 90 减少到 78。这一变量缺失的案例被删除，因为确定数据缺失非常直观。对于其他变量来说，要确定存在数据“缺失”需要编码者做出判断，而在这些案例中，最终的交叉表中包含了缺失数据（在这里，缺失数据被编码为 9）。

表 3.4 计算 kappa 统计量

A. 两个编码者，四分类变量的基本 kappa 系数表格

		编码者 A 1	2	3	4	
编码者 B	1	a	b	c	d	行 1
	2	e	f	g	h	行 2
	3	i	j	k	l	行 3
	4	m	n	o	p	行 4
		列 1	列 2	列 3	列 4	
						T

B. 两个编码者，1945 年生理健康的 kappa 系数表格

		编码者 A 1	2	3	4	
编码者 B	1	0	0	0	0	0
	2	0	3	1	0	4
	3	0	4	27	2	33
	4	0	0	3	38	41
		0	7	31	40	
						78

运用上述的公式，

$$总体一致性=\frac{(0+3+27+38)}{78}=0.87$$

$$偶然一致性=\frac{\frac{(0\times 0)}{78}+\frac{(4\times 7)}{78}+\frac{(33\times 31)}{78}+\frac{(41\times 40)}{78}}{78}=0.44$$

因此，

$$\kappa=\frac{0.87-0.44}{1-0.44}=0.77$$

根据兰迪斯和科克(Landis & Koch, 1977)的标准,我们的一致性“较高”。这一结论也为标准误和 z 值的计算所确证(Fleiss, 1973)。总的来说,健康测量的 kappa 处于 1.0 到 0.69 之间,均值是 0.87。

kappa 系数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研究设计。对定序变量而言,如果不同的打分之间呈现很大不一致性(某些不一致显然比另一些更差),其信度核查可以用加权 kappa 系数进行计算(Cohen, 1968; Spitzer, Cohen, Fleiss & Endicott, 1967)。加权 kappa 系数要求给每一个格子制定权重,然后整合到基本的 kappa 系数计算公式中。使用加权 kappa 系数的一个局限是没有确定权重的预设标准。事实上,加权 kappa 系数适用于上述生理健康变量,但没有理论依据用来设置权重。对某些类别进行加权带来的潜在好处相比额外的复杂性而言,可谓得不偿失。kappa 系数也可以推广到两个以上编码者的设计(Fleiss, 1971; Light, 1971)。

当被编码的变量是连续型变量时,相对于较大分歧而言,编码者之间意见上的较小差异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因此,对于连续型变量的信度评估,同类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简称 ICC)比 kappa 系数更为合适(Fleiss, 1973; Robinson, 1957)。就其最基本形式而言,ICC 来自单因素方差分析设计。它比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更合适,因为 ICC 只评估一致

性，而皮尔逊相关系数则描述编码者之间的任何线性关系(Robinson，1957)。

要计算ICC，必须先计算 k 个编码者对拥有 n 个案例样本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详细说明可参见Bartko，1966；Burdock，Fleiss & Hardesty，1963)。得到的ANOVA表把方差组成转化成组间均方($MS_{between}$，在这里是编码者间均方)和误差均方(MS_{error})。由此，ICC的估计值就可以用如下式子计算得到：

$$ICC=\frac{(MS_{between}-MS_{error})}{[MS_{between}+(k-1)MS_{error}]}$$

用 F 统计量对ICC进行显著性检验

$$F=\frac{MS_{between}}{MS_{error}}$$

其中，自由度为 $n-1$ 和 $n(k-1)$(Bartko，1996)。

在表3.5中，我们以埃贝尔(Ebel，1951)和巴尔特科(Bartko，1966)中的例子说明如何计算ICC。在这个例子中，有两名编码者和四名被访者。表3.5的第二部分是标准的方差分析，从中我们可以计算出

$$ICC=\frac{(4.167-3.250)}{[4.167+(1)3.250]}=0.123\,6$$

基于前面的公式可计算得到 $F=1.28$，因此ICC，即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在0.05水平上不显著。如果ICC较

高,就说明影响编码决策的残差变异较小(Burdock et al., 1963)。

表 3.5 用 ICC 进行编码者间一致性分析

A. 四名被访者、两名编码者数据的编码者间一致性

被访者	编码者 1	编码者 2	Σ
1	3	3	6
2	1	5	6
3	5	6	11
4	4	7	11
E	13	21	34

B. 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df*	*SS*	*MS*	*F*
组间	3	12.5	4.167	1.28
误差	4	13.0	3.250	
总计	7	25.5		

资料来源:数据和例子来自 Bartko(1966), Ebel(1951)。

ICC 的这一基本公式评估了测量工具的总体信度,但它假定编码者是固定的,而且编码者和案例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Burdock et al., 1963)。对方差分析设计进行修改,并对 ICC 的公式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获得有关编码者之间变异或编码者与案例之间交互作用的进一步信息(Bartko, 1966; Burdock et al., 1963)。

*效标效度和建构效度。*编码的最后一步是检查新编码的效度。首先,我们要确定效标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即新测量和该概念的其他较为成熟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

程度(Bailey, 1978)。在健康项目例子中,我们把生理健康轨迹和生理健康的其他指标进行比较,比如影响被访者生活的主要疾病,以及晚年的精神和活力状况。进行这些比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决定健康信息在不同的测量之间是否保持稳定,即使每一个测量都只抓住了健康的一个不同侧面。

就疾病与健康、稳定与变迁两个独特组合而言,五种轨迹的每一个(参见图3.2)都代表了健康。身体“一直都很好”和“一直都不好”是两种比较稳定的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身体一直都很好是最常见的,有36%的男性属于这一类别。相比之下,只有3%的男性在成人阶段身体一直不好。在那些经历了显著的健康状况转折的男性中,大部分人要么是大部分时间身体健康,仅在去世之前身体状况下降(25%);要么是经历了几次身体状况下降,尔后康复了(22%)。在变化模式中,线性下降代表了最拖延的不良健康状况,仅有14%的男性属于这一类别。

每种健康轨迹可能都与某些生理健康问题出现或不出现相关,其中一些更可能出现某些疾病。譬如,患有心脏病的男性更可能健康状况下降后康复或持续下降,而患有癌症的男性则不太可能康复,因此在其生命晚期下降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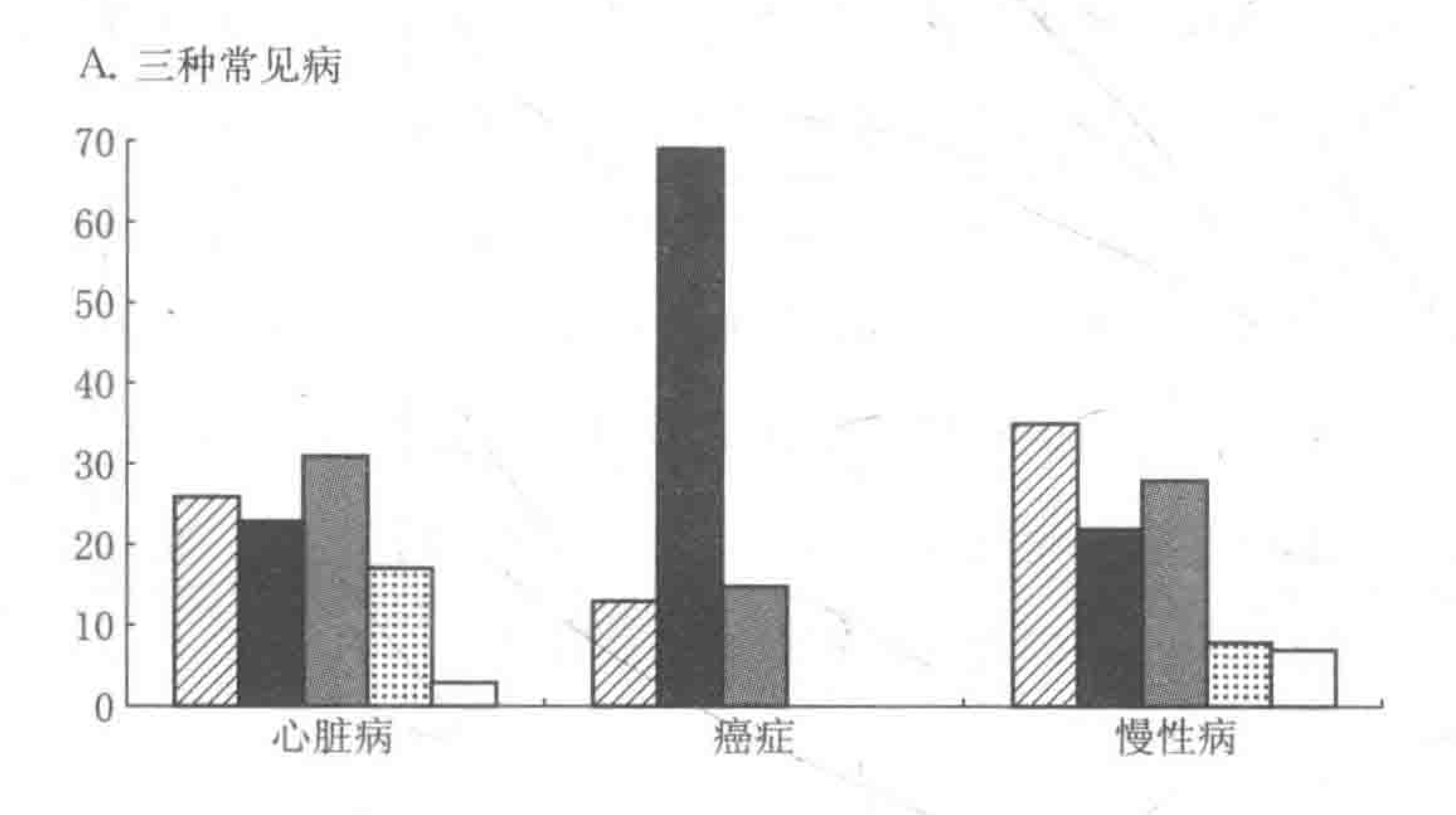
图3.5的A部分证实了我们的预测,即很多健康轨迹都与疾病类别高度相关。对于那些主要问题是心脏病的男性来说,31%的人在患病之后康复了,26%的人健康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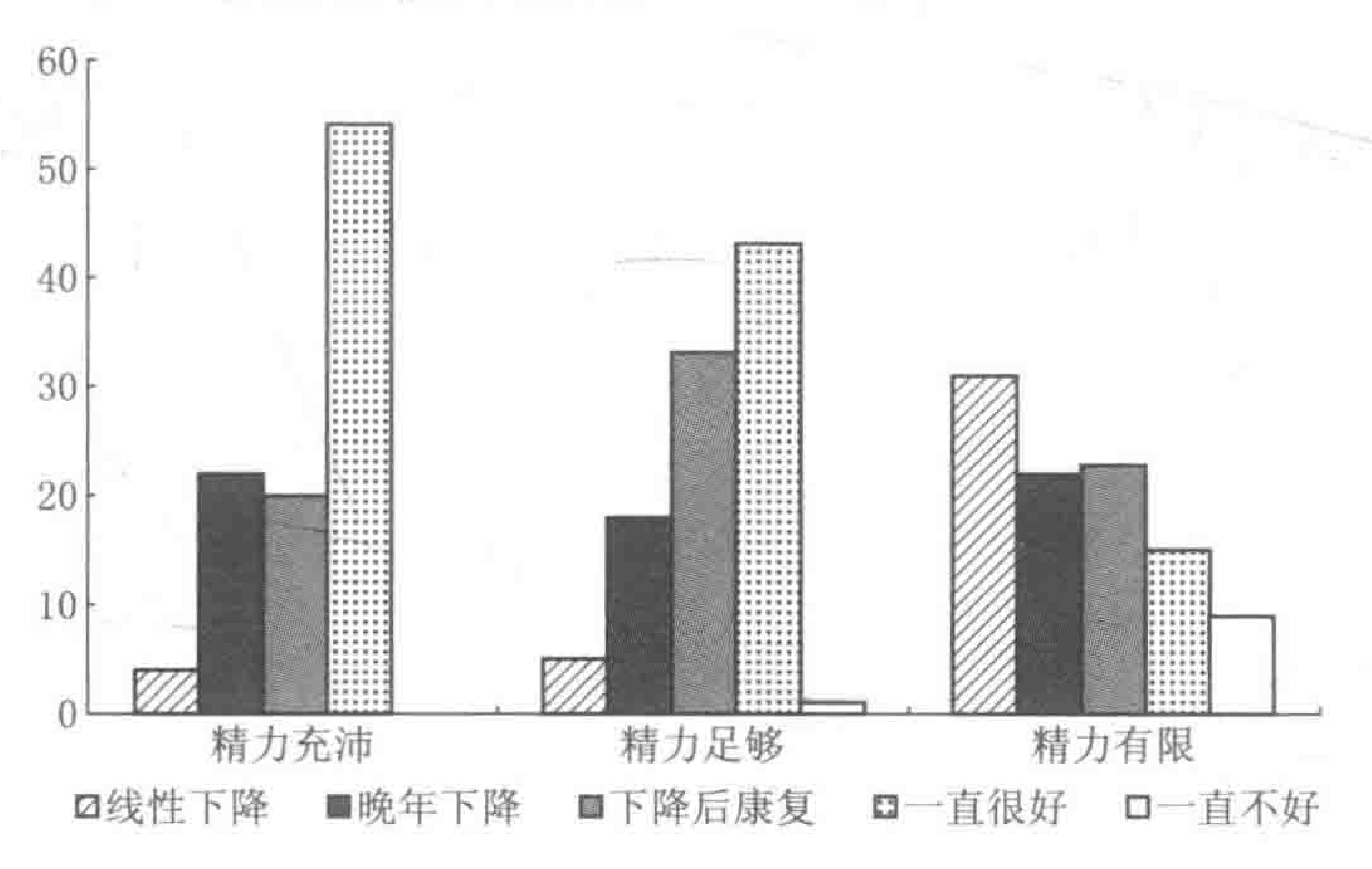
慢下降一直没有康复,而23%的人在其晚年健康状况下降很快。相比之下,患癌症的男性仅有15%康复了,而69%的人在晚年健康下降了。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男性最有可能经历缓慢的线性下降(35%)或者下降之后康复(28%)。

晚年的精神和活力测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健康比较。疾病类别测量可以捕捉慢性病。相比而言,精神和活力测量揭示了生命历程中某个时间点上的健康状况的一个方面。我们预计一些模式,比如一直身体很好、一直身体不好或线性下降模式和精力水平具有清晰的相关。而下降后康复和晚年下降这两种模式与精力水平的相关并不那么清楚,因为下降并不一定和精力被测量的那个生命阶段相对应。

在图3.5的B部分,我们发现精神和活力与一些健康轨迹模式高度相关,尤其是那些更稳定的健康模式。那些一直身体很好的男性更可能报告说精力充沛或足够,而那些身体一直不好的男性中仅有1%报告说精力足够。在量表的另一端,报告精力有限的男性中有31%属于线性下降模式,而其他9%则属于身体一直不好之列。精神和活力与晚年下降模式相关性较差,因为这一模式中的男性报告精力有限或精力充沛的可能性相同。我们怀疑相关性取决于下降是发生在63—70岁之间还是更晚。经历了下降后康复的男性更可能报告精力不足,表明在他们康复之

后，他们的健康退步已经对其精力水平带来了损伤。





注：癌症和精力充沛的缺失类别 = 0。

图 3.5　按照疾病与健康状态分类的生理健康轨迹

总的来说，这些比较非常符合直觉判断。这说明健康轨迹是有效的测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健康视角，而且与其他健康测量相一致。对健康轨迹和其他变量（比如教育

和婚姻史)之间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建构效度的有关证据。拥有高等学位的男性更可能身体一直很好,而那些只接受了高中教育的男性则更可能健康线性下降或身体一直不好。类似地,生命中多数时期婚姻完满的男性更可能身体一直很好,而那些身体一直不好的人更可能单身。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较强的相关和以往有关健康和社会因素之间关联的研究相一致,因此肯定了我们的新编码测量的内在效度。

第3节 | 小结

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重构档案过程中的步骤。图3.1描述了决策过程，显示了适合于所有二手数据重构的分析步骤，尤其是针对档案数据。通过创造特曼男性样本中新的健康编码，我们阐释了重构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接下来我们将要说明如何把这一过程运用到特曼档案的其他部分，即晚年的工作模式和服役经历。

第4章

从退休到晚年工作经历

在每一次再编码中，研究者所面临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而在再编码过程中要有所变化。我们对男性晚年工作情况的再编码和健康项目非常接近，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工业和职业编码。在这一章中，我们说明第3章所勾勒的再编码步骤如何应用到其他项目中，这些项目来自不同的概念主题，并建立在标准编码之上。

第1节 | 第一步

步骤1:评估已有资料

我们对于晚年工作的最初兴趣来自两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职业生涯长期影响的问题。因服役而未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时间是否会直接推迟退休,以弥补没有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时间?服役对收入或职业成功是否存在长期的间接影响,从而改变他们退休的时间?

在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必须要对职业编码进行彻底修改。就像特曼档案中的其他数据一样,每一轮调查中的职业也是独立编码的,从而产生一系列横截面数据。带来的问题就是编码方案随时间而变化,导致无法获得个人职业生涯史和进行长时段的职业比较。一个以前的项目已经用1980年的普查职业编码创建了从第一份工作到1960年的早期工作记录,但我们需要对这一工作进行扩展,使其包括1960年以后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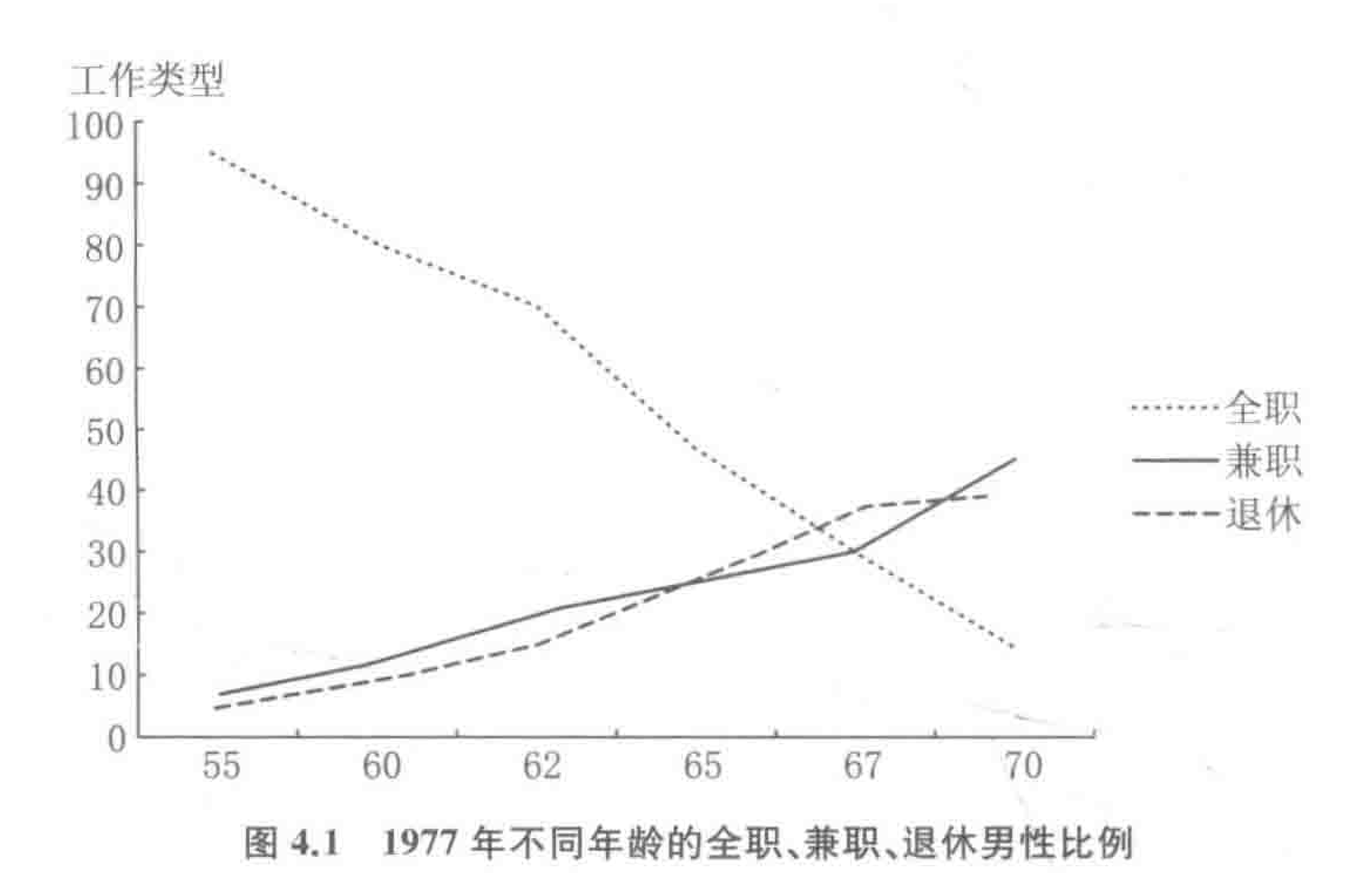


图 4.1　1977 年不同年龄的全职、兼职、退休男性比例

当我们考虑退休问题时，特曼男性的职业史显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很多男性并没有在某个时间点退出劳动大军，或者即使退休了，他们常常在正式“退休”之后继续工作赚外快。图 4.1 显示了这一复杂性。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到 55 岁，绝大多数男性都在全职工作，但在此之后，全职工作男性的比例稳步下降。最出人意料的是，对于任何年龄而言，兼职工作男性的比例几乎和完全退休的比例一样。因此，在这个样本中，不仅有很多男性完全退休，而且有很多人也从事兼职工作。

考虑兼职工作提出了更进一步有关晚年工作模式的问题。这些人在做什么工作？他们是从一个工作退休，然后在其他地方做兼职，还是说兼职呈现了他们在退休之前逐渐从正式工作退出的过程？兼职工作是否占用了他们大多数时间，以及他们在这种状况下工作了多久？图 4.1

的总体比例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考察个体工作史来了解他们晚年的工作和退休情况。特曼档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进行这一考察，因为它提供了被访者整个成年阶段的工作史。

通过阅读个案材料，我们得出的看法与传统观点差别很大，后者认为晚年工作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而其主要转折点是退休，这是退出劳动大军的单一途径。我们样本中的男性在 50 岁之后往往经历各式各样的工作变化，一些人在近似的工作之间转换，而另一些人则在非常不同的工作之间转换。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增加都很普遍。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些变化与从某个工作“退休”相关，但往往并非如此。总体而言，这些男性晚年工作状况之间差异很大。

图 4.2 呈现了这一变异性的一部分。图 A 表示大部分成年时光都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工作的某男性的工作和退休的刻板模式。50 岁时他被提升为公司的部门经理，全职工作直到 62 岁完全退休。图 B 和图 C 表示退休后兼职工作的两种模式。在图 B 中，一位工程师全职工作直到 56 岁退休，之后他继续在同一家公司兼职从事咨询工作。在之后的十年间，他缓慢地减少工作时间，直到 66 岁才退出劳动大军。图 C 显示某男性 59 岁以前一直都在社会保障局全职工作。退休之后，他立刻当了两年的代课教师，这份工作他只需付出一半的时间。61 岁时，他成了一名油漆销售员，在第一年，他每周工作 1—2 天，第二年下降到每周不足 1 天。64 岁时他不再为赚钱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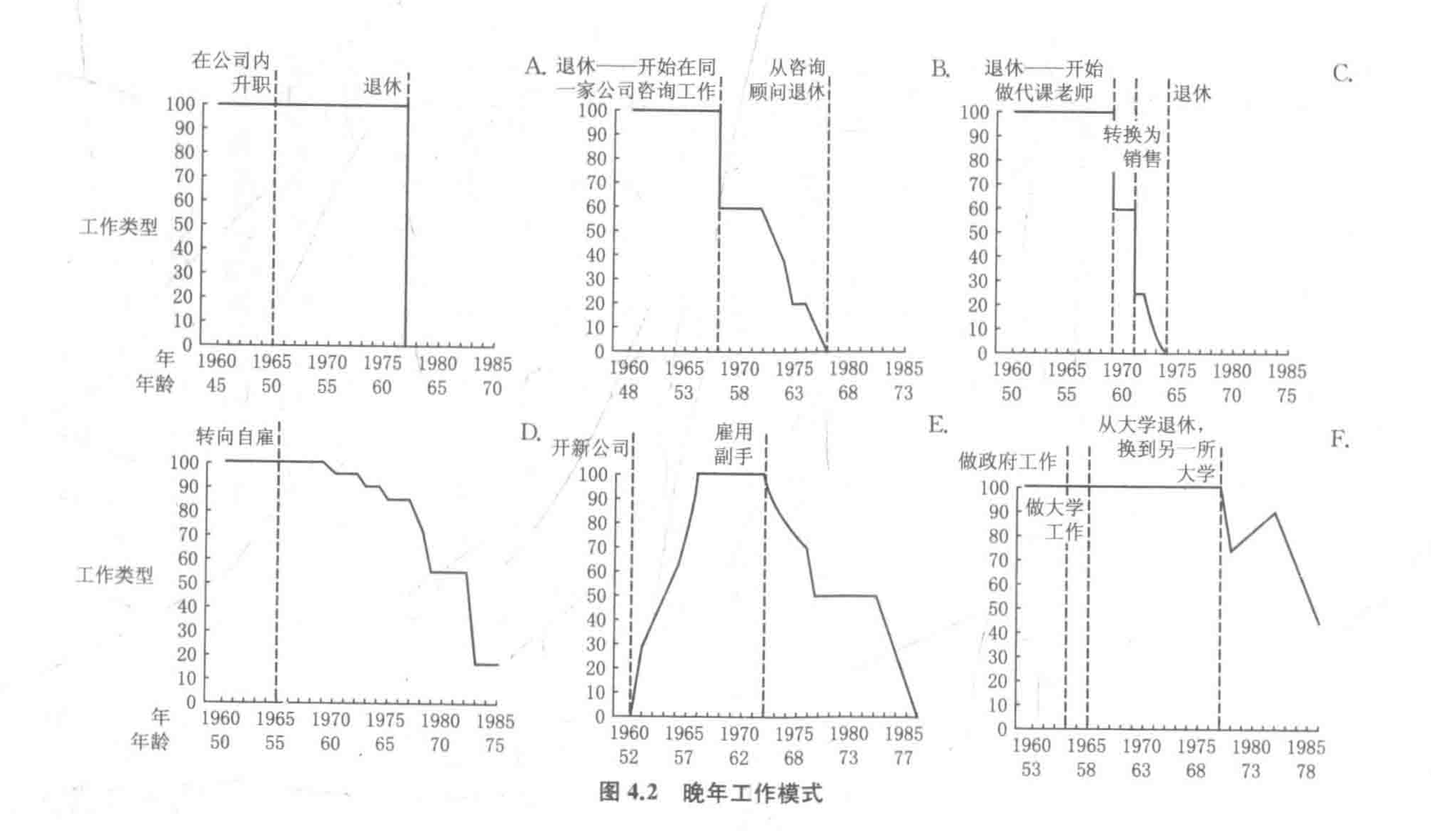

在公司内升职
退休
工作类型
年
年龄
A. 退休——开始在同一家公司咨询工作
从咨询顾问退休
B. 退休——开始做代课老师
转换为销售
退休
C.
转向自雇
工作类型
年
年龄
D. 开新公司
雇用副手
E. 做政府工作
做大学工作
从大学退休，换到另一所大学
F.

图 4.2 晚年工作模式

图D至图F的工作史显示了更为复杂的退休情况，因为对每一个案例而言，都很难把退休描绘成单独的转折点。图D描述了一个律师在55岁时离开了一家全科(general-practice)公司，开始自己单干。他并未表示这一变化是退休，也没有列出任何养老金信息以表明他从那家公司"退休"了。他进行全职工作直到59岁，之后缓慢减少工作时间。在75岁时，他依然每周进行6小时的法律工作。

图E代表了一个自雇商人的工作模式。在生意场上有所成就之后，他就把生意卖掉了，在50岁之前就退休了。1960年，他开了一家承包和零售公司，之后逐渐增加工作量，直到57岁时他重新开始全职工作。64岁时，他雇用了一名副手，并逐渐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但直到75岁时才完全停止工作。图F显示的是一名大学教授的工作生命，他在国际咨询上投入了不少精力。在接近60岁时，他经历了两次重要转折，之后，他主要隶属于一所重点大学直到70岁的"退休"年龄。但此后他又开始变动，他转到了另一所大学，并在70多岁时继续从事国际咨询工作。直到79岁时，这位教授还差不多有一半时间用于工作。

这些晚年工作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退休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首先，基于该样本中的兼职工作范围，我们如何定义和测量退休？退休是一个减少了工作时间的工作转折点吗，还是用其他标准来定义，比如获取养老金？显然，任何单一标准更为适用于某些工作模式，而非其他

模式。譬如，把退休定义为工作转折不能很好适用于那些在同一个工作中缓慢削减工作时间的人。然而，以工作时间为指标，比如工作时间少于一半就定义为“退休”，就无法识别某人从一个工作退休并直接转到另一个工作上这一类重要的工作转折。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测量能够完全囊括该样本中的职业生涯经历。

除了定义和测量问题外，样本中的变异性也提出了一个更为概念性的问题。“退休”分析秉持一个暗含的假设，即某个单一事件能够最好地概括晚年的工作情况。因此，晚年的工作被假设为相对稳定和有序，其主要变化就是退出劳动大军。但我们对个案资料的阅读表明这些稳定性假设仅适用于一小部分被访者。对其他大部分而言，晚年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是大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可能包括开拓新的工作，也包括削减工作时间。为了深入理解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转折点，还必须研究这些转折点嵌入其中的整个工作史的背景环境。

步骤 2：决定重新编码

在我们决定应当聚焦于更为广阔的整个晚年工作模式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评估数据。我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后来的调查是否向被访者询问了足够多有关晚

年工作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可以重建工作历史。可喜的是，我们发现，在1972年和1977年的调查中，研究者明确要求被访者列出当前的职业和工作性质，以及自上次调查以来的任何工作变迁的时间和性质。此外，一些调查还包括了一条时间线，罗列了50岁之后每一年工作时间所占的比例。很多问题关注的信息都与以前的调查有所重合，这有利于核对被访者应答的可靠性。这些基本信息往往得到简历、新闻剪报甚至讣告等描述工作史材料的补充。因此，即使这些数据尚未被编码成工作史，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数据对这些男性的工作史进行可靠的重建。

就像所有二手数据一样，这些数据也存在局限。这些局限促使我们仔细考虑该数据能回答和不能回答什么问题。一个主要的担忧是1982年和1986年调查明确询问了被访者工作时间的长短，但却没有询问职业信息。在1982年时，很多被访者都还在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虽然很多人提供了有关工作性质的信息，但我们不能假定接下来几年的工作信息是完整的。另一个问题是仅在1977年询问了可能影响工作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养老金和强制退休。所以在分析1977年以后的工作转折时，我们无法纳入这些因素的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该档案依然具有分析从第一份工作到晚年工作史的潜力，并允许我们考察丰富的工作和个人转折模式。有关服役、健康、教育和家庭的丰富数据允

许我们对影响男性生活的诸多不同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说明该档案缺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长处,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最初的研究问题,即战争对工作和退休的长期实质性影响。

步骤3:完善研究问题

由重新编码而导致的主要概念性变化是重心由原来的退休转向晚年职业生涯。虽然很多研究都已考察过逐步或部分退休的不同方面(如 Fillenbaum & Maddox, 1974; Fuchs, 1982; Gustman & Steinmeier, 1984; Honig & Hanoch, 1985; Myers, 1991),但很少有研究考察个人的职业生涯模式。由于缺乏这些信息,我们的首要研究任务是当这些男性步入晚年之后,对他们的轨迹和转折点进行描述。我们样本中的主要工作模式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男性拥有什么样的模式?他们在一个单一转折点上"退休"的比例是多少?有多大比例的人是慢慢地减少工作时间,又有多少人是离开劳动力大军后又重新返回?最后,在每一种模式中,个人转折是什么样子?其中有多少转折点,以及有多大比例的人把其中一个或多个转折点定义为退休?

在对这些模式进行描述之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什么因素形塑了职业生涯的方向。职业和自我雇佣明显使某些

人显得更为灵活，而收入、养老金和强制退休政策为晚年工作提供了机遇或限制。除此之外，配偶工作、健康和早年工作情况（如服兵役）等其他因素又是如何影响职业生涯的？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是探讨工作轨迹的时间安排和形状对其他老龄化模式的影响。工作模式是否和活跃程度、幸福感或寿命存在任何关联？这些新的研究问题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特曼档案的长处，因为这些问题关注工作和男性生活其他诸多方面的关系。

第 2 节 | 创造新编码

步骤 4:评估可能的编码方案

在第 3 章的健康研究一例中,我们确定现存的方案不适合我们的数据和研究需要。在对晚年职业进行编码中,考虑到一些因素,我们倾向于使用美国普查局职业和行业编码(U.S. Census Bureau occupation and industry codes)作为新编码方案的基础。首先,1960 年以前调查的职业都使用了该编码,如果使用另一套方案就需要修改早期编码。其次,特曼档案中的职业信息一直都包含了有关职业和工作性质的问题,而这是使用普查编码所需要的核心信息。最后,可以从普查局获得正确的职业和行业细致分类的手册。使用标准编码方案这一决定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可以省却了制作概要单这一步骤,该步骤需要在实际编码前针对每个案例进行大量的阅读和记录。而且,使用更为常见的编码方案也有利于和其他研究进行比较。

为了改编某个标准方案以适用于研究问题和数据，我们需要在研究问题、编码方案和数据三者之间来回，直到完成最终方案。第一步是建立特定的重新编码目标，以确保研究问题和最终编码之间最大程度的契合。在对晚年职业进行重新编码中，一个首要的目标是创造出来的新编码要足够灵活，能适用于将来的研究工作。这意味着要考虑到职业生涯数据的所有可能性，然后尝试创造新编码以满足这些潜在的需求。因此，虽然我们当前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生命史数据，但我们还是决定把每一次调查中的职业数据都转化为1980年的普查编码。就长远来看，把横截面数据转化为普查编码延续了我们以前的工作，即运用某个单一标准化的职业编码方案对档案中的所有职业数据进行编码。一旦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档案的使用者就能很便利地比较不同调查中的职业，而以前他们则不得不依赖于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同编码方案。

为了满足我们当前的研究需要，我们也要为工作转折和轨迹创造编码。从1960年调查开始(此前的调查已经进行过重新编码)，我们对雇主、职业、行业、或工作时间等可看作转折点的任何转变都感兴趣。在每一个转折点中，我们尤其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想了解转折的特征，比如发生时间、被访者是否把它定义为退休、它是否与健康变化直接相关。第二，我们需要新工作的相关信息(这里把完全退休看作一种有效的工作状态)，包括雇主、行业、

职业和工作时间。通过比较晚年工作转折点的总数或者职业的分布范围,如此详细的信息允许我们分析关键转折点,比如被那些受访者定义为退休或者转折点的整个模式。

因为总体工作轨迹是我们的理论兴趣所在,我们还想发展一些一般性的测量。这些测量或许无法从转折点数据中轻易获得。我们尤其对工作时间的总体模式感兴趣,这样我们就能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比较,比如是单一退休、缓慢减少工作时间,还是在劳动力大军中来回进出。额外的信息还包括被访者是否从事过咨询工作(这对其晚年工作种类有显著影响),还是离开劳动力大军之后继续从事工作相关的事情但不拿报酬,这些都可以被囊括在这里。

步骤5:写编码本

发展出符合研究目的的基本框架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把初始编码运用到实际案例上、并对定义和规则进行修改,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像在健康研究例子中那样,已经完成概要单这一预备步骤,这一过程就会有所缩短。因为完成概要单之后,研究者对数据的某些方面已经相当熟悉。相比之下,当运用现存的方案作为新编码的基础时,这一完善过程就成为使概念和数据之间达到

契合的关键步骤。

在核查初始编码这一环节的一开始，我们随机选取了 20 个案例。任何问题都被完全记录下来，待所有案例的编码都完成之后，我们再对编码本进行改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直到二三十个案例能被毫无问题地进行充分编码。接下来，我们找三个不熟悉这一项目的人来对一批案例进行编码。他们被告知要记录遇到的任何问题和疑问，待完成之后，对他们的反馈进行比较，用于评估编码的原始信度。完成进一步的修改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实际编码工作，虽然评估和纠正问题贯穿于整个编码操作中。

步骤 6：对案例进行编码

编码某个案例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编排和组织。如果作为预备步骤已经进行了概要单的制作，它们可被用于这一目的。我们没有完成概要单，但在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码时，编码者了解关键的工作时间和其他相关信息。这使得他们能够把散落于文件中的相关信息组织起来，记录编码决定，并为以后的使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图 4.3 是一张完成的编码表格的例子。编码本对每个编码的含义进行了定义，但即使没有它，我们也能重建被访者工作史的基本轮廓。编码方案包含四个部分。第一、

编码：0 0 6 8

是否编码：________
是否录入：________
是否核查：________
问　　题：________

晚年职业生涯——特曼男性 1960—1986

状态/死亡日期：活着，出生于1910年

一、主要职业：时间点

	雇主	行业	职业	工作时间	
1959	0 1	7 1 1	0 0 7	7	会计师，人寿保险公司
1972	0 1	7 1 1	0 1 9	7	副总经理，主管财务，同一家公司
1977	0 8	7 1 2	2 5 4	3	自雇，房地产中介，3590时间

二、1976 年收入数据

	EARNINC	SSINC	PENSINC	INVINC	JINVINC	OTHINC
1976	0 3 0 0	0 0 0 0	0 2 4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0

图 4.3　晚年职业生涯的编码表格案例

三、1959 年及以后主要职业的转折点

	转折点				新工作				
	年份	年龄	退休	健康	雇主	行业	职业	工作时间	
转折点 1	7 0	6 0	0	0	0 1	7 1 1	0 1 4	7	副总，同一家公司
转折点 2	7 2	6 2	1	0	0 8	7 1 0	2 5 5	7	自雇，投资
转折点 3	7 2	6 2	0	0	0 8	7 1 2	2 5 4	5	同上，房地产中介，50%时间
转折点 4	7 3	6 3	0	0	0 8	7 1 2	2 5 4	4	同上－40%时间
转折点 5	7 5	6 5	0	0	0 8	7 1 2	2 5 4	3	同上－35%时间
转折点 6	8 4	7 4	0	0	0 8	7 1 2	2 5 4	1	同上－15%时间
转折点 7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转折点 8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转折点 9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转折点 10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CONFTRAN：2

四、概要测量

CONSULT	FCH	WORKTRAJ	CONT	ESTDATE	QUOTE	DIFFIC	CODER
1	1	1	1	1	0	2	5
	从管理到零售						

图 4.3 续

第二部分列出了每个调查年的职业和收入数据(仅 1976 年调查询问了收入)。这张表告诉我们这名出生于 1910 年的男性,在 1986 年时还活着。1959 年他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会计师,到 1972 年他已升任副总经理。在 1977 年,他是一名自雇的房地产中介,每周只工作不到两天时间。

编码表的第三、第四部分包括了转折点、轨迹和一些核查数据质量的编码。这名男性被访者在 1970 年至 1984 年间共有 6 次转折点,包括晋升为公司副总经理、从该公司退休、成为全职的投资中介、转向兼职房地产工作,然后缓慢地减少工作时间,这样到 74 岁时他每周工作的时间少于一天。在转折点部分的底端,CONFTRAN 的取值为 2 表明我们基本确定该被访者有 6 次转折,误差为加减 1 次。

编码表的最后一部分列出了几个概要指标,包括用于测量工作时间总体模式的指标(WORKTRAJ)。该指标取值为 1 表明这名男性缓慢地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其他编码值显示这名男性在退休前或退休后曾经从事有薪酬的咨询工作(CONSULT);当他从管理转向销售时,他的职业产生了功能性的转变(FCH);他在减少自己挣钱的那份工作之后,他还在某种程度地从事不收取报酬的工作(CONT)。其他编码提供其他关于数据质量、可获得性和该案例编码者的进一步信息。如同健康研究例子那样,我们使用了全屏显示的数据输入程序,这样电脑屏幕看起来就和编码表一样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精确性和效率。

步骤 7:评估信度和效度

评分者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在完成编码之后,我们要对编码工作的信度进行评估。在整个编码方案形成过程中,我们等间隔地进行了 9 次检查,总共覆盖了样本的 10%。在每一次检查中,两名编码者独立评估每个案例,然后比较他们得出的编码。在编码过程结束时,把所有信度检查的结果综合起来,对每个变量计算 kappa 统计量。

信度估计值结果表明我们评分者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横截面数据的职业、行业和工作时间测量的 kappa 平均值为 0.84。在这一组中,1959 年工作时间的 kappa 值出奇地低,只有 0.35。对数据进一步的考察发现,编码者在这一变量的一致性程度非常高(93%),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男性在 1959 年都是全职工作,分布上的变异非常小,这就使得偶然一致性也非常高。因此,这里的低 kappa 值不是表明编码可信度低,而是显示分布的偏斜度很大。

收入和事件测量的信度估计值位于 1.0 和 0.72 之间,表明信度很高。在概要测量中,被访者是否有过职业功能转变是最难进行编码的,kappa 值为 0.67 就表明了其难度。虽然这一数值并不是很低,但与编码者所提出的担忧结合起来考虑,它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一测量时要保持谨慎。职

业生涯轨迹(0.79)、咨询(0.84)和从有薪工作到无薪酬工作的连续性(0.81)三个变量的一致性都很不错。

效度。为了检查新编码的效度，我们对晚年工作总体模式之间的雇佣特征进行了比较，比如自雇和职业。在进行这些比较之前，我们先对晚年工作的一些基本方面进行描述。这一基本描述只有在完成编码工作后才有可能进行。

总体而言，就雇主、职业、行业或1959年到1986年间的工作时间而言，特曼男性平均有3次转折。迄今为止，有1次转折的比例最大(28%)，没有转折的比例仅为8%，有5次或更多转折的比例是22%。如果把我们的关注点缩小到被受访者定义为退休的转折点上，我们发现样本中的大多数男性(62%)只把其中1次转折定义为退休，而31%的人不存在退休，7%的人有2次或更多次退休。

在那些确实退休了的人当中，我们也发现许多人在退休之后继续以某种形式从事工作。在我们的样本中，55%在自己所定义的退休之后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大军。余下45%的人则继续从事工作，在这些人当中，25%的人继续从事全职工作，14%的人处于全职和半职工作之间，29%的人花1/4到1/3的时间用于工作，15%的人仅花很少时间用于工作。在这些退休后继续工作的人当中，44%的人是自雇佣，26%为私人雇主工作，余下的30%为政府、基金会或教育相关机构雇主工作。因此，即使在那些已经从工

作岗位上"退休"的男性中，就那种退休后有报酬的雇佣而言，也存在很大的连续性。

虽然聚焦于某个单一的转折点能提供不少信息，但却不能窥见我们所感兴趣的男性晚年工作情况的全貌。一些人缓慢减少其工作时间直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大军，但从未把任何一个单一转折点定义为退休。其他人"退休了"，但继续在类似的岗位上从事全职工作。为了对晚年工作情况有更广泛的了解，我们定义了5种潜在的工作和退出劳动力大军的模式。

对特曼男性而言，最常见的模式（占35%）是缓慢减少工作时间，这适用于那些从未离开劳动力大军但至少一次以上地显著减少其工作时间，或者那些完全退休前两次或以上减少工作时间的人。第二种常见的模式是从劳动力大军中一次性退出，这适用于28%的样本。其他模式包括零散地不断进出劳动力大军（15%），在最后一次调查时还未有显著地减少工作时间（14%），有一次工作时间减少然后就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大军（7%）。

测量这些模式效度的一个指标是比较自定义的退休和总体模式。虽然这两种测量提供的职业生涯信息非常不同，但在自我报告的退休和某种模式之间应该存在一些关联。例如，把一次转折定义为退休的男性中的44%符合一次性退出劳动力大军模式，而没有自定义退休的人中仅有2%符合这一模式。但在定义一次转折为退休的人中，

其他模式也是可能存在的：29%的人符合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模式，17%的人在退休或减少工作时间后又再次增加了工作时间。

我们期望工作的其他方面，譬如自雇佣和职业，也会和晚年总体工作模式有所关联。自雇的男性在选择何时及如何减少工作时间方面更具有灵活性。但在很多案例中，这种灵活性都被巨大的经济压力所限制，由于缺乏雇主养老金计划，他们只能持续工作。这两种因素都使得自雇佣者更可能缓慢减少其工作时间(Fuchs, 1982)。

在图 4.4 的 A 部分，我们确证了这些猜想。在 1959 年，相比于非自雇佣男性，自雇佣者更可能采取缓慢减少工作时间模式(52% vs. 29%)，而拿薪水的工作者更可能采取一次性退休(32% vs. 15%)。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这两个雇佣群体中采取持续全职工作模式的可能性是相同的，但在 1959 年时拿薪水工作的男性更可能退休之后又返回劳动力大军(18% vs. 8%)。很可能许多在 1959 年拿薪水度日的人没有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缓慢减少工作时间并在此后某个时点转向了自雇佣。将来的分析能够综合职业生涯模式和转折的时序信息，从而深入探讨这些差异。

图 4.4 的 B 部分比较了 1959 年四种职业的职业生涯模式。律师中最常见的是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模式，这其中 80%的人是自雇佣，而这一模式在销售人员中占的比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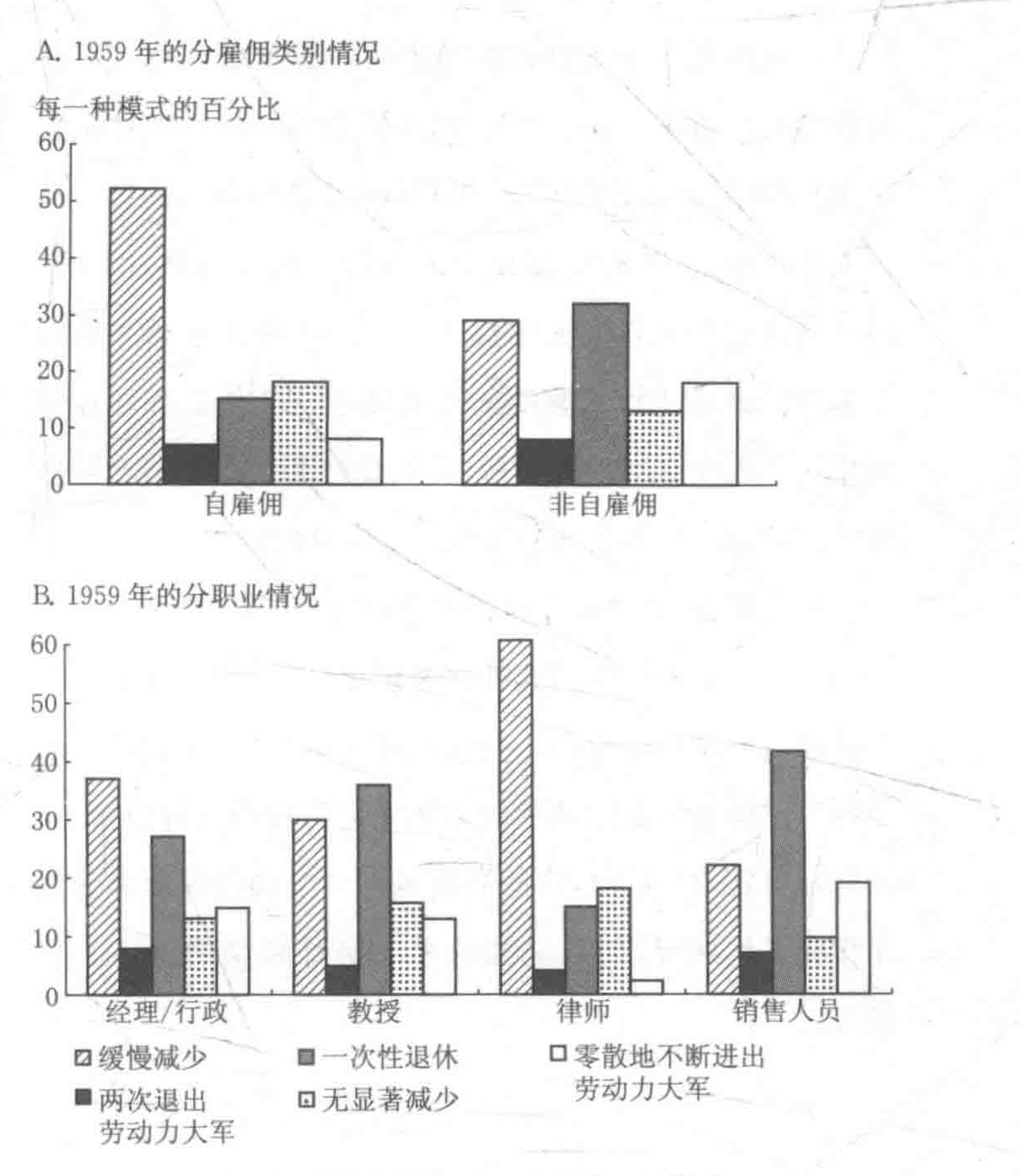


图 4.4 分雇佣情况和职业的晚年工作模式

少。有意思的是,经理/行政人员(37%)和教授(30%)在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模式上所占比例差不多。进一步分析显示,1959 年的经理/行政人员中有 1/4 后来变换了职业,差不多还有 1/4 的人晚年做起了咨询工作。相对于管理职位而言,这两种变化都允许采取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模式。

一次性退出劳动力大军的比例在职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在销售人员中,42%的人符合传统的一次性退休模式;而在另一头,只有15%的律师以这种方式退休。最出人意料的是,相对较高比例的教授一次性退休(36%),但后续研究发现其中大多数人(61%)在减少或停止有薪工作之后继续从事无薪酬的专业活动。其他三种职业生涯模式在职业之间基本类似,而如律师和销售人员之间所显示的差别则反映了他们在自雇程度上的差异。

总体而言,就像第3章的健康轨迹一样,上述比较分析表明我们为职业生涯模式的测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但与其他测量不矛盾的视角。与前人研究相一致,我们的发现表明工作模式与雇佣情形的灵活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新测量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测量也以一个动态视角来分析工作和退休状况,使我们能够处理男性复杂的晚年工作经历。

第5章

测量历史影响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对档案数据重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进行了描述,这些步骤使数据与研究问题更为契合。在这一总结性章节中,我们关注生命历程研究中颇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如何从档案数据中获取对历史影响的合适测量。问题的形成对这一任务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研究项目对这一影响感兴趣,就需要把历史影响整合到研究问题中。相对于概念化而言,前面章节所探讨的详尽细节在本章中不是最重要的。

对人类生活中历史力量日益增加的关注虽然和生命历程革命存在区别,但是都强调数据搜集的重要性。大体而言,纵贯性研究并没有使人们把对历史力量的关注转化为实际分析这一过程变得更容易。如在第 2 章指出的那样,特曼研究忽视了历史影响。研究对象在受教育、建立家庭和职业生涯初期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 1936—1950 年的追踪调查没有包含一个与这些深刻历史变迁时期直接相关的问题。忽视历史影响的一个较近

的例子是收入动态追踪研究，从1968年开始每年搜集一次与贫困相关的数据，却没有关注到越南服役而被动员起来的弱势男性青年。

记住这些局限之后，路易斯·特曼档案似乎是最有可能对历史影响进行了调查的数据。如果原来的研究设计者并未询问与历史时期相关的问题，后来研究者如何来探究这种历史影响？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利用关于个人生活的自愿性观察或报告。特曼数据的大多数个案都包含了大量此类信息，从封闭性问题边上的便条，到与开放型问题的答案关系不大的扩展内容，以及受访者对特曼研究人员信件的回复。另一个选择是利用已搜集的数据来进行测量历史进程或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即使仅仅是间接测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特曼职业史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很多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老人都能述说这段历史，并告诉我们一些他们在艰难时期开始职业生涯所遭遇的一些困难。但是，大多数这些历史故事只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因此就缺少了大萧条核心阶段的信息。相比之下，特曼研究人员搜集了战争年代每一年的职业信息，并且所有被访者都有关于服兵役或民用雇佣(civilian employment)的信息。1940年、1945年和1950年的追踪调查在提供这些信息方面最为重要。

1945年的一些被调查者在填答问卷时，还处于前线的

交火之中。在一条信息栏附录下,特曼研究人员收到了来自南太平洋的如下记录:“今天我试图杀死一些人,他们也试着干掉我。在这些空档,我填完你的信息栏。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服役的人来说,在问卷的雇佣部分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军阶和地点变化进行描述。

对于特曼研究团队所关心的内容来说,职业史的用处并不大,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对它们”进行编码(Robert Sears,私人交流,1987)。但是,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却是核心材料,我们从中找到了研究男性生活中历史影响的一条经验路径。研究对象和他们妻子的信件,加上督导员和田野工作者的报告、访谈记录和新闻剪报也都极具价值。希尔斯最初从1945年调查中抽取了所有关于服兵役和战争的材料,这使我们受益良多。而且,他的编码工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始的平台。

本章将会显示,在我们最初评估战争经历对特曼男性生活影响的工作中,所依赖的测量后来被证明在概念和操作化上都存在不足。这一发现最终导致了对战时经历的各方面进行重新编码的决定,并得到了关于国内—前线雇佣(home-front employment)的一个意外发现,这带来了更宽泛的战争动员概念。研究问题和档案数据之间的互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描绘。

第1节 | 联结历史影响与个人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曼男性从军时处于一个相对较晚的年龄段，那时他们已经在工作和家庭方面开始成人生活了。在这一转折和接下来的服役经历中，我们确认了两个感兴趣的问题及相关的研究问题。首先，进入战争的时间是男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问题。生命历程理论和经验研究(Elder，1987)都告诉我们，对于那些30岁之后进入战争的男性，他们要为服役经历付出更多的中断性和社会经济代价。第二个研究问题关注服役带来的压力及其对生命历程和健康的影响。参加过激烈战斗会增加发生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的风险及其持续时间(Elder & Clipp，1988)。

历史分析中有用的第一步是划分出生同期群及其与特定时间和经历的关系。通过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之中，出生年使我们能把生命与特定的条件和变迁联系起来，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所有人都真正受到这些条件和变迁的影响，我们需要更

多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联是不准确的,社会史和个人生命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往往就留给了想象。但无论如何,把研究对象按照出生时间分组提供了一个开端和平台。

如果最初的问题考虑了历史影响,那么对于历史影响研究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是同期群研究并不必然从这一考虑出发(Schaie, 1965)。的确,比较连续的儿童或成人出生同期群的动机或许来自发展不变性(developmental invariance)这一假定。至少在原则上,环境变化没什么关系。记住这一点之后,同期群就可以被看作能对这一不变性或推论界限进行检验的样本(Baltes, Cornelius & Nesselroade, 1979)。同期群的时序设计典型地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相比之下,历史影响的研究问题是由一个非常不同的假设所激发的,即不同文化、社会结构和历史时期之间都存在发展差异。然而,即使历史影响非常重要,它或许被操作化为一段时期或同期群效应,从而无法提供有关这一影响本质的精确信息。我们知道某个特定同期群的成员并非受到历史记录的同一影响,因而同一同期群内的这一变异性是非常大的。

连续的出生同期群在不同生命时期遭受相同的历史际遇,因此对历史事件的经历也不同(参见表 5.1)。但即使是同一同期群的成员也未必拥有相同的历史经历。并非所有

老一代和年轻一代成员都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我们假设)的艰难,而且不到一半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服役,其中包括年轻一代中的50%和老一代中的35%。

表5.1 按历史事件分类的特曼男性出生同期群年龄

时间	事件	出生同期群的年龄	
		1900—1909	1910—1920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5—18	0—8
1921—1922	20世纪20年代的萧条	12—22	1—12
1923—1929	一般性经济繁荣	14—29	3—19
1929—1933	大萧条开始	20—33	9—23
1933—1936	部分恢复	24—36	13—26
1937—1938	经济衰退	28—38	17—28
1939—1940	战争动员开始	30—40	19—30
1941—1943	军队和战争工业的主要增长	32—43	21—33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36—45	25—35
1950—1953	朝鲜战争	41—53	30—43
1957	婴儿潮达到顶点	48—57	37—47
1963—1973	越南战争	54—73	43—63
1973	战后繁荣结束	64—73	53—63

属于某个出生同期群一般表明了其在变迁时期所处的生命阶段,譬如美国参战时,老一代特曼同期群正是30岁出头。但由于同期群所包括的年龄段较广,因此并不总是能很准确地定位人们。美国征兵局进行的年龄排序使我们能利用入伍年龄更好地研究战争动员。就特曼男性而言,36%的人是30岁之前入伍,42%的人是30岁到32岁之间入伍,其余的人是32岁之后入伍。这些较晚入伍者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服役人员的年龄中位数大了4

岁。大多数特曼老兵都是在1942年夏天和1944年夏天之间应征入伍的，大约4年后退伍。

从特曼男性数据的电子文件中，我们试图回答一些有关动员和未被动员的一般性描述问题。虽然战争中期由于人力紧缺，兵役缓征政策有所改变，但在整个战争期间，相比于已婚未生育男性和单身男性，有孩子的男性被征召的可能性都更低。我们发现特曼男性中存在相当的差异性，以及晚从军者受过更好的教育。这一教育上的适度差异并非因为智商存在差异，因为所有这三个年龄段的入伍群体的智商都是一样的(Elder & Clipp, 1991)。相比于早入伍者，那些30岁之后从军的男性有更多的时间完成研究生教育。

这些入伍者在军队的各个兵种中服役，但大多数都在陆军或海军，分别占62%和34%。正式服役时，其中一半人是军官，这反映了他们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智商。到退伍时，军官比例增加到3/4。接近1/4的人在欧洲战场作战，1/3的人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其余人的服役地点历史较为复杂，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四个人中有一个从未在国外服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仅仅是战争动员的一部分，而且也并未包含绝大多数的特曼男性。以服兵役和国内—前线雇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历史界限要素，我们把1940年9月16日实施的《征兵法案》作为全国动员的

开端，并延伸到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即直到大规模退伍结束。特曼男性的工作史使我们能获得动员前(premobilization)，即1940年1月和6月间的雇佣情况，以及1948年冬天动员后(postmobilization)的雇佣情况。第二组界限标识的是美国正式宣战和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参见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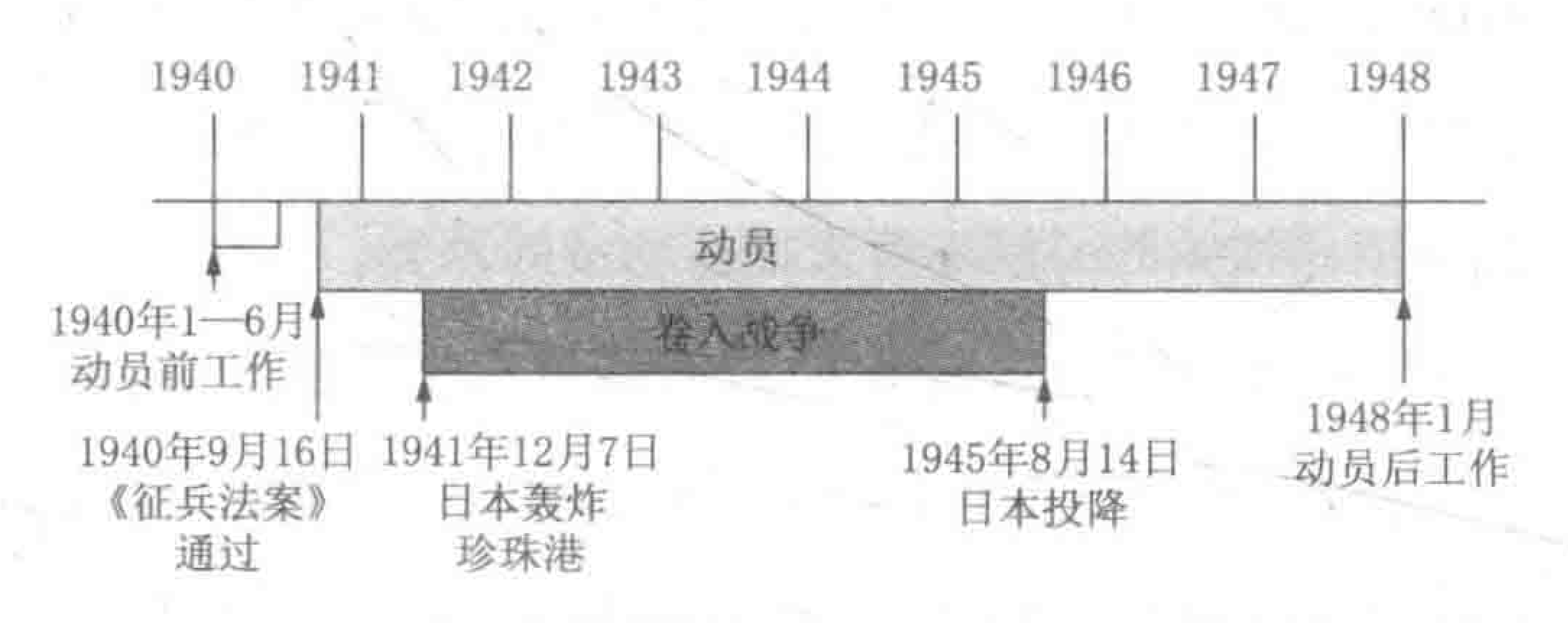


图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争动员和参战

在服兵役研究项目的档案处理工作中，我们开始考虑研究战争动员对平民男性和那些最终从军的男性的影响新的可能。我们想象了从仅依靠平民雇佣材料转向和战争相关的国内—前线雇佣材料的多种方法。特曼生命记录显示，一些在国内—前线工作的男性经受了比和平时更大的压力以及更多的机会。毕竟人力需求并非均匀地落在每个人头上。对一些人而言，战争意味着长工作时间，频繁地换工作，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调动，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战争带来的变化很小。

但我们想要问的是：什么是战争动员的决定性因素？

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的安德鲁·沃克曼(Andrew Workman)合作,我们把动员概念化为:为了应对战争而对社会进行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权衡两方面进程,一方面要保证国家的一大部分生产部门满足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继续满足平民需求(Fairchild & Grossman, 1959)。除此之外,国家还必须决定应当控制哪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进程。为了达到战争期间的目标,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对于什么构成动员做出了明确决策说明。我们选择依靠相关的国家决策来描述动员的种类。

对战争期间行政管理史的大量检索把我们引向战争人力委员会(War Manpower Commission)和征兵管理局(Selective Service Administration)一系列有关阐述个人活动对战争胜败重要性的政策。我们把发给地方人力委员会的一般性指南和征兵管理部门的更明确的重要活动名单两者进行合并,产生战争动员的类别,经过训练的编码员可以把这些类别运用到生命记录数据上。这两个层次如下所述:

1. 战争生产所必需的民用活动:被调查者在(1)制造船只、飞机、坦克、枪炮和其他机器,以及文件、文章和直接用于战争的材料,或(2)由战争部门雇用的政府官员或被军队雇用的平民雇员。实例是参与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和战争生产委员会的律师。

2. 支持战争事业的民用活动：那些被认为对国民健康、安全或利益密切相关(除战争生产之外)、支持战争事业的活动，包括生产军用和民用产品的职业，比如矿产和农业。实例是纺织工人和警察。

这一区分让我们更好地对个人案例进行梳理，并且把男性的战时雇佣经历置入战争动员框架中。探讨国内—前线和军事动员带来了比初始研究更为宽泛的概念，并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男性生活中这些竞争性过程的绝佳机会。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不得不对1945—1946年追踪调查中的军队经验测量进行修改，因为这一数据并没有对战时经历进行完整的处理。举例来说，没有直接询问男性是否参加过战斗，虽然他们在回答其他问题时经常报告此类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的特曼研究主任罗伯特·希尔斯组织对1945—1946年调查进行了编码，并对战时服役情况的报告给予了关注。希尔斯的其中一个编码聚焦于是否参加过一般意义上的战斗，我们决定看一下能否用该测量作为战争期间的压力指标。

除了这一信息来源之外，希尔斯允许我们在1986年追踪调查中搜集回顾性的战时经历信息。我们非常了解回忆在此类问题上的局限，但我们对1945—1946年调查中战时测量的怀疑促使我们进行这一回顾性调查。利用1985年针对奥克兰成长调查被访者的回顾性调查问卷，我们在

1986年调查中增加一些题目,比如参加战斗、战斗服役的时间段、《退伍军人法》(G.I.Bill)的使用情况,以及对个人战时服役情况的评价。大约850名特曼男性和女性于1986年寄回了问卷,其中包括200多名老兵。

我们不能立刻在磁带上获得这些1986年数据来测量战斗经历,因此只能比较问卷复印件和1945—1946年追踪调查中的战斗信息。我们希望在这两个时点之间的战斗报告间存在显著的对应,这种一致性就会使我们能够利用那些在其中任一一次调查中报告了战斗经历信息的个案。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在诸多方面都过于理想化了。1945—1946年调查和1986年调查中对战斗经历的测量与我们想要的结果相距甚远,而对回顾性数据精确性的研究并未获得很多经验上的支持。但不管怎样,我们认为这一比较是当时最好的测量策略。那么我对战斗经历测量还有信心吗?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令人沮丧的结果。首先,晚出的1986样本提供的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时间点样本,尤其是当我们以战斗经历来定义两个数据中的样本时。其次,两次调查战斗案例之间的对应性太低,使我们无法对任何一次调查中的测量具有信心。1986年的报告(询问被访者是否曾参加过一周或以上的战斗)与1945年的指标(是否参加过战斗)仅在38%的案例上相一致。我们还发现,在服役和退伍的时间、军阶方面也存在不一致,甚至在服役兵种

上都有不一致的情况。

为了解决战斗和其他战时服役经历的不一致问题，我们对存在问题案例的档案又重新核查了一遍。尤其当我们能够获得信件和其他支持性文件时，一些不一致情况被部分或彻底解决了。但这些文件在其他案例上所引发的问题比提供的答案还要多。基于这些发现，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从1945—1946年和1986年数据中的一个还是合并这两个数据，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战斗经历测量。更棘手的是，这使我们无法消除对于战时经历其他方面测量质量的怀疑。

此时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把战时经历研究计划仅仅局限于1945—1946年数据，对此我们比较有信心；或者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编码并运用到经过加强的调查对象生命史文件上。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文件，我们需获得许可对斯坦福大学特曼档案的所有相关材料进行复印，然后发展一个编码本并运用到这些数据上。由于没有可资参考的时间和成本指南，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因为我们相信能在6个月内完成这一任务。基金资源并不支持差旅花费和编码工程本身，正如我们那时候所预计的。但随着项目的开展，这些基金远远不足以支付整个项目的实际花费，包括到斯坦福的四趟旅行，每次两周左右，以及将近一年的编码。

不管怎么样，我们认识到为了这一研究目的而重构特

曼档案，可以使我们开展提出的研究计划，而且比计划阶段所预期的做得更好。这是因为当把战斗经历扩展到男性战时服役的其他方面后，战斗经历的新编码就更具有意义。从一开始，这一扩展定义就包含了军事和国内—前线动员。被动员入伍的男性来自几种典型的雇佣情况，我们很宽泛地把这一工作经历也看作国内—前线动员的一部分。

我们这种研究需要对战时和退伍阶段的职业进行细致的编码。我们对于特曼数据的工作情况非常熟悉，并且也知道战时生活的中断和无序都会严重减弱战争年代职业史的完整性和整体质量。但不管怎么说，特曼数据中的职业变迁处于个人档案的核心位置，并通过调查对象与特曼研究人员的通信、特曼研究人员给出的职业建议和新闻剪报得到补充。

对战时职业数据的任何重新处理无疑都会增加服役研究的数据重构工作量，但我们也可以通过联结这两个研究达到规模效益。在战争动员的不同方面，这两个研究是互补的。而且两者都需要准备编码本，并由受过训练的编码员运用到数据上。同一组编码员可以从事这两个数据重构工作。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接下来描述新编码的发展和运用。

第 2 节 | 为研究问题开发的新编码

当我们开始为军事和国内—前线战争动员的影响问题开发新编码后，那就很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本身的独特性。我们对历史影响的研究始于历史进程或历史条件及其多重后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和时间在生命历程中带来差异的这一进程。在战争动员这个例子中，我们想知道它如何改变了赶上这一进程的那些人的生命状态。有关这些影响的知识为可能的生命历程变异和后果提供了线索。

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假设这一视角涉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军队服役和国内—前线动员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人？其他研究问题始于个人的特定后果以及受什么因素影响。并非所有因素都涉及环境，所以这一类设计的研究一般都甚少谈及环境影响或社会变迁。当研究从大背景下正在发展的个人角度来看待社会环境，我们就很难对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体系对个人的全部影响开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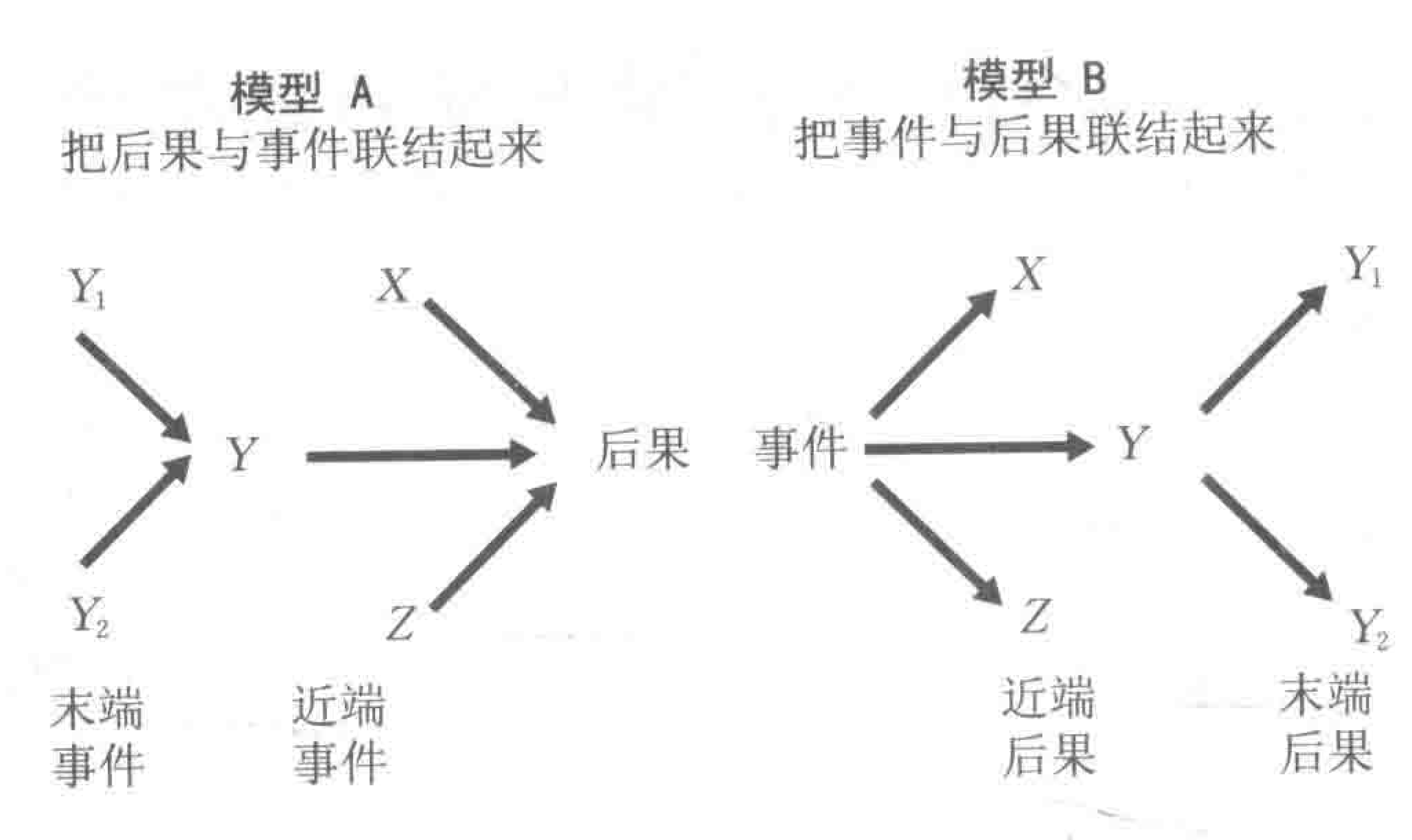


图 5.2 研究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变迁:两种模型

图 5.2 提供了对这两种问题的图示。模型 A 从个体和工作出发,回到环境;而模型 B 则始于环境变迁,并在生命历程中追溯其多重效应。我们在军队服役和国内—前线动员的档案研究中采用的就是模型 B 这一视角。为了就此发展合适的编码,在军队服役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战斗经历,同时兼顾服役经历的其他方面。在国内—前线研究中,战时的工作经历就成为我们开发更适合编码的主要目标。我们首先对战斗经历进行概念化并分析其与特曼档案数据的对应性,然后探索测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作经历的方法。

对战时经历进行编码

从社会和发展视角出发,服役经历至少存在三个独特

之处：

1. 服役经历切断了被征召者过去经历和当前选择之间的关系，把其从家庭和社区中隔离出来，因此削弱了过去生命史和义务对他的影响。

2. 服役时间代表了一段正式脱离以年龄分等的职业生涯和责任，是一段进行重新评估和思考的时间。

3. 参军会拓展个人的经历，从社会关系到新的地方和机会。

虽然较高社会独立性、丰富的经历和摆脱了职业压力这三点并未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的所有相关特征，但它们定义了服役男性的基本文化。在这一框架中，是否参加战斗是我们所定义的战时经历的三个关键变量之一。其他两个变量是入伍时间（原始数据有很好的测量）以及与服役同袍的社会关系（来自1986年的特曼追踪研究）。

战时经历研究的理论框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单一维度（如参加战斗部队的时间）发展到越南老兵研究的多重维度。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士兵的开拓性研究（Stouffer et al.，1949）主要依赖于是否参加战斗这个问题。相比而言，越南老兵研究则使用了更具差异化的理论和测量模型来捕捉战时

压力的多样性。譬如罗伯特·劳费尔(Laufer，1985)探索了对引发后续症状和行为问题的战时压力的三个维度：(1)是否遭遇过威胁生命的情形；(2)是否受过暴力虐待；(3)是否参与过暴力虐待。

我们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借助了这一脉络的思考，假设战斗经历是通过是否遭遇过垂死、受伤和死亡情形，以及进入和离开战火的情形来定义的。战斗持续时间与交火和死亡体验相关，因为时间延长也增加了后两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在牢记这些区别之后，我们对大约 30 名曾有参军经历的特曼男性的文件进行了核查。这一盘点为 1945—1946 年和 1950 年追踪调查材料、相关信件和报告中的男性战时经历提供了一张经验地图。凯瑟琳·科若斯(Catherine Cross，项目经理)和两名来自卡洛琳娜人口中心(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的技术精湛的编码员在这一调查和服役编码本的撰写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该编码本包括六个部分：

1. 贯穿一生的军事及相关经历：老兵地位和种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服役；入伍和退伍信息；服役的职业生涯、兵种和单位；勋章以及与服役相关的教育(如后备军官训练队和《退伍军人法》)。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美国参战前的海外经历：

政府工作和志愿者机构。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内—前线经历：缓征从军、有原则的反战地位、协助政府工作。

4. 战时压力：战斗持续的时间（以周和月计）；向敌军开火和被开火的经历；目睹他人伤亡（无论我军还是敌军）；受伤经历，做过战俘营的俘虏，以及在行动中失踪（以及确认在行动中死亡的男性，总样本的3%属于这一情况）。

5. 与战争相关的战后经历：从军期间的非军事管理职责，对受伤的同袍进行医疗照顾，对遣返回国还是移居国外做医疗评估。

6. 在国内照顾受伤和垂死的美国人：样本中有医护经历但未上前线的人。

由于编码操作的复杂性，我们招募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编码员，并对他们就基本的军事史、生命历程方法论和特定的编码程序进行了培训。首先，由于在原来的调查表中，信息并不是有序排列的，因此通过细致地审阅被调查者的整个数据文件，我们制作了关于男性从军史的概要单，然后从各式各样的信件和新闻简报中获取一部分重要信息。由于手头有最初的编码本草稿，科若斯和编码员把这些编码运用到了一组案例上。然后对编码单进行核查，就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这样五次尝试之后，使

我们对编码本有了进一步的修改，从而使编码与数据更为契合。

这一程序使我们能对某个案例生命历程相关的所有材料进行彻底检查，尤其关注事件的先后顺序。编码员要从大量的材料中抽取出相关的线索和数据，基于这些线索做出判断，并指出数据中潜在的有问题之处，然后确定编码方案。这一使编码本与数据相契合的繁琐工作很值得，在实际编码过程中它带来了极大的回报。编码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对 20％的案例完成了信度核查，大约包含 85 名男性。这一核查仅限于战争压力测量，因为这一范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最重要的，并且对编码员的判断能力要求很高。这些变量上的平均编码员间信度在编码中途和整个项目上分别达到了 98％和 96％以上。

在表 5.2 中，我们使用了最后的编码来描述特曼样本中的战斗经历。3/5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曾在海外服役，这一比例不随退伍时的军阶而变化。很大比例的海外老兵曾在战场服役，面对炮火和死亡。大多数曾在战斗区域服役的老兵都有证据表明曾参加过惨烈的战斗。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惨烈的战斗定义为面对炮火、死亡或垂死情境。所有那些受过伤或宣称在行动中失踪、做过战俘或在行动中死亡的人都被归入到这一类中。在特曼老兵中，26％参与过惨烈战斗，56％没有证据显示参与过战斗，18％被归入轻微战斗。

表 5.2 特曼男性于二战期间的现役职责和战斗经历(%)

现役职责经历	退伍时军阶		
	军官	士兵	总计
所有老兵			$N=343$
二战现役			96
二战老兵	$N=230$	$N=71$	$N=329$
海外服役	60	58	58
在战场服役	47	39	43
与敌军交火	27	23	25
目睹同袍/敌军受伤或死亡	35	25	31
参加过战斗			
是	53	41	48
否	31	35	30
无法确定	17	24	22
曾在战场服役的二战老兵	$N=108$	$N=28$	$N=142$
与敌军交火	57	57	57
目睹同袍/敌军受伤或死亡	66	61	64
在行动中受伤	14	18	15
战斗失踪人员或战俘	2	7	3
在行动中死亡	1	7	3

参加惨烈战斗的例子(Leinbaugh & Campbell, 1985)包括一位劈木人公司(Railsplitters Company)的上尉,他曾参加过 Bulge 战役;以及一位海军营部行政官,他曾参加过四次两栖突击,包括冲绳和夸贾林环礁(Kwajalein)战斗。在海军中待了四年半之后,他说:"虽然在与日军总共 152 天的战斗中有过无数次'接近死亡的体验',但我从未受过伤。"另一名军官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在前线服务了 190 天,包括 Bulge 战役。特曼 1954 年的记录显示,在上尉的作战单位中,只有 12 人幸存下来了,上尉"认为自己很幸运"。

如文献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参加过惨烈战斗的老兵

更多地来自那些年龄较轻的入伍者。惨烈战斗增加了战后发生不可修复的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并且主要发生在那些战前的自信度和自尊度都较低的人当中。这又显著增加了战争记忆对这些男性晚年的影响程度(Elder & Clipp, 1991)。虽然对于特曼样本中入伍较晚的那些人而言,有战斗经历的更为少见,而且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早入伍者也并无二致,但我们发现后期动员却大大增加了战后身体素质下降的风险。所有这些初期效应都会对晚年的健康和退休产生影响,因此开始体现出我们对健康、晚年职业和战时经历进行重构这一工作的价值。

最初要发展战时经历新编码的决定大大增加了可供分析变量的数目,使我们的分析能够拓展到战斗经历之外。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关于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性的生命经历信息,并能够表明从军经历在战争结束之后给一些人带来了影响。新编码使我们能更有信心地处理最初的测量问题。但是服役仅仅是战时动员的一部分,大多数特曼男性都在国内—前线工作。接下来我们为这些人发展出一套职业编码。

对国内—前线动员进行编码

对特曼男性服役经历的测量工作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也能调查国内—前线动员和相关的职业经历。在整个战

争期间，大约有将近 500 名特曼男性一直都是平民，其中很多人都在民用生产部门工作。战争动员期间的职业史（参见图 5.1）能被充分细化，使我们能画出这段时间内的职业图式，并按照职业在动员地位和其他特征上的排序对每份工作进行归类。

最初通过对工作史审视，我们发现应当把那些直接参与到战争相关工作中的人区别于对他们的工作和雇主的描述。这样就能根据职业生涯变化来估计因动员而导致的生活变化，这种职业变化包括转换工作、职业和雇佣部门，以及工作特征的变化，如每天工作的小时数、监管责任的强弱和地域上的流动。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生命历程变迁和工作史信息在概念上的可能性，我们决定为每份工作发展一套包含 6 项特质的测量程序（参见表 5.3）。

表 5.3　战争年代工作经历编码

1. 工作种类
   A. 雇佣分类：经济部门（私有、政府）
   B. 行业部门：制造业、金融业、通讯产业等
   C. 工人的职业
   D. 督导（个人是否管理他人？）
   E. 时间：白天工作时间比例，工作的季节性等。
   F. 动员：是否被动员？
2. 生活变化
   A. 工作变化
   B. 雇主变化
3. 时间
   包括动员期间每份工作的开始年月和结束年月。

在战争动员期间区别私人雇佣和政府雇佣部门至为重要。某个地区战争生产委员会的部门经理被编码为"联邦政府";洛克希德公司(Lockhead)的某个经理则被编码为"私人部门"。行业部门类别使我们能够确定职业变迁所带来的行业变化。1980 年美国人口普查程序被作为指南用于行业和职业编码,这是工作种类的第三个特征。因为特曼调查与普查调查表很接近,因此我们发现人口普查局的系统不仅易于管理,也能够被运用到编码工作中。

在劳动力短缺时期,晋升机会和管理职责都进一步增长,因此我们增加了督导编码。战时生产需要雇员延长工作时间,因此又增加了工作时间编码。第六个工作特征是战争动员,这对研究目的而言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我们的编码是根据政府颁布的法规来建构的,区分了三个类别:未被动员、直接动员和间接动员。

在这些工作特征之外,我们决定利用上述工作特征以及其他所有相关数据,编码操作应当确定是否发生过工作和雇主变动。在当前调查中,工作和雇主变动可以定量地被确定下来。但是,来自长时段调查的档案数据在编码和被调查者数量及数据质量方面都是不均衡的。这种数据情况要求编码员具有很强的能力来判断是否发生过工作和雇主变动。但我们只对主要工作进行比较,以确认工作是否发生变动。我们要求编码员如果记录了一条变动,就

要输入该份工作开始和结束的年月。这一信息使我们能对战时动员进程进行事件史分析。

编码表的设计是为了捕捉战时所有的工作变动情况，战争期间被定义为1940年9月至1947年12月之间，而动员前/后的工作变动分别指的是这两个时间点前后的情况。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动员前(premobilization)是指1940年1—6月间的最后一份工作，而动员后(postmobilization)是指1948年1月的工作。我们把1940年的雇佣情况作为评估战时职业生涯变迁的基线。举个例子，某个特曼男性在动员前是西海岸大学的助理教授。编码单显示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全职教授，但没有人归他督导。在动员期间，他在某家国家安全机构为联邦政府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显然从间接动员雇佣转向了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作。到战争结束时，他已晋升到一个高级管理职位，之后他又转到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做高层管理人员，在动员后阶段他依然从事这一工作。

我们雇用了给服役编码的那两个编码员为国内—前线项目编码。他们对特曼数据非常熟悉，而且在档案编码程序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编码员和项目经理(科若斯，沃克曼)运用编码本的第一稿对1940年、1945年和1950年的材料进行了编码，主要包括调查问卷、信件和剪报。然后把编码汇合到一起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在会议上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经过三轮以上的使用和修改之

后,每个编码都显示很高的一致性,然后开始最终编码工作。

先对所有非老兵进行编码,因为他们的战时工作史最完整。在这一部分的结束阶段,除了居住地变迁这一变量,我们的所有编码都获得了很高的一致性。战争动员伴随着大量的居住地变迁,我们希望得到此类变迁的数量和类别。遗憾的是,有关居住地的数据非常含糊,无法从中获得可靠的编码。我们采取了两个程序来确定编码员间的一致性。第一,我们希望了解编码员在某个被调查对象的工作情况上的内容一致性,不管编码员是否对同一份工作进行了调整。第二个评估关注工作特征,譬如督导、时间规划和动员地位。所有工作和工作特征的平均一致性百分比达到了 94%,没有一个编码的平均一致性低于 90%。

根据对特曼男性的追踪,他们在战争年代参军的比例急剧上升,尤其在 1942 年和 1943 年间。同样,参加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民用生产的男性比例也在这一阶段迅速上升,这是直接动员的一个指标(参见图 5.3)。虽然仅有不到 1/5 的特曼男性参加到战时的此类活动中,但这一比例已经是 1941 年的两倍了。处于间接动员的男性继续其雇佣情况的可能性降低,到 1945 年底,其中很多人都参与到了军事生产或与战争事业密切相关的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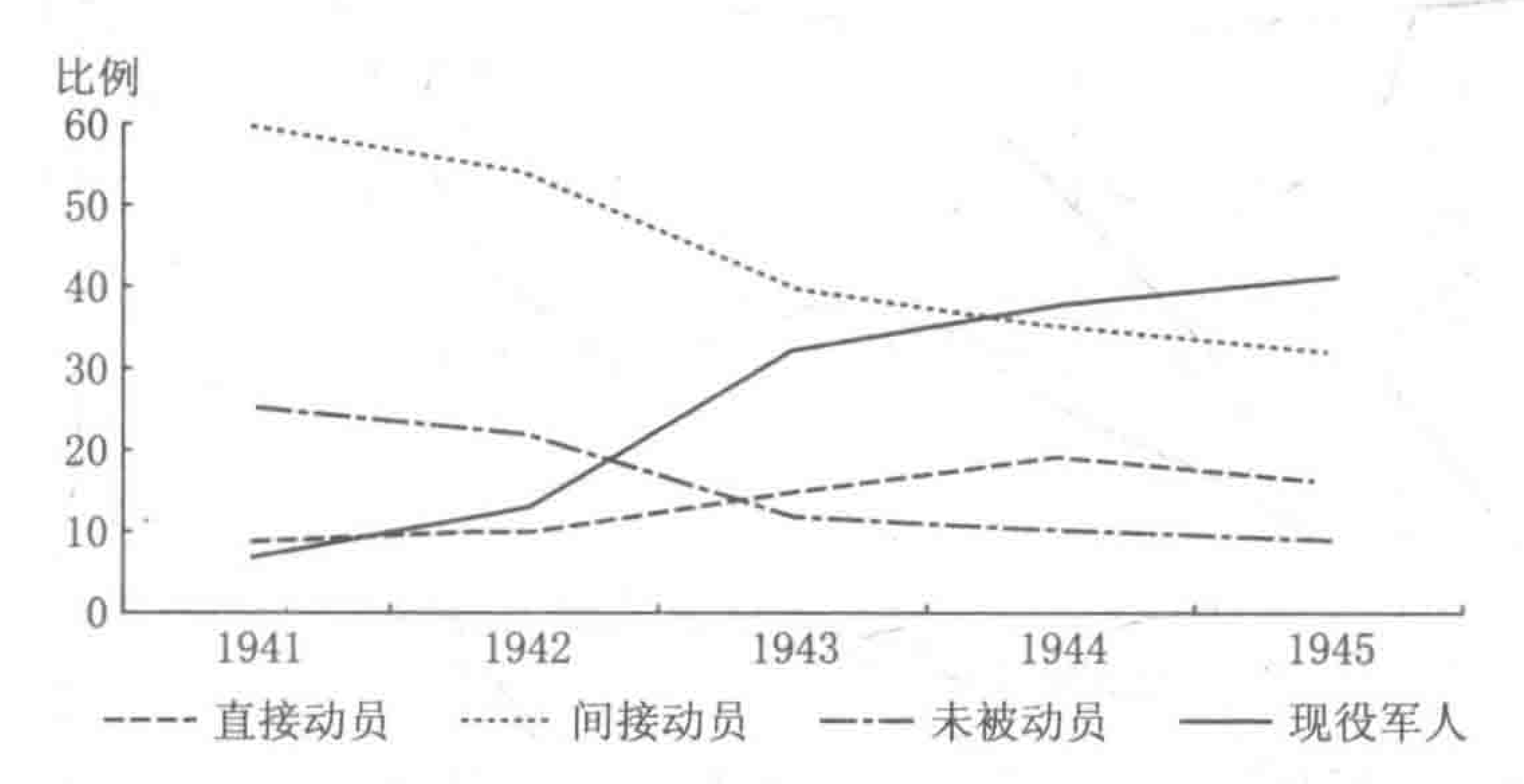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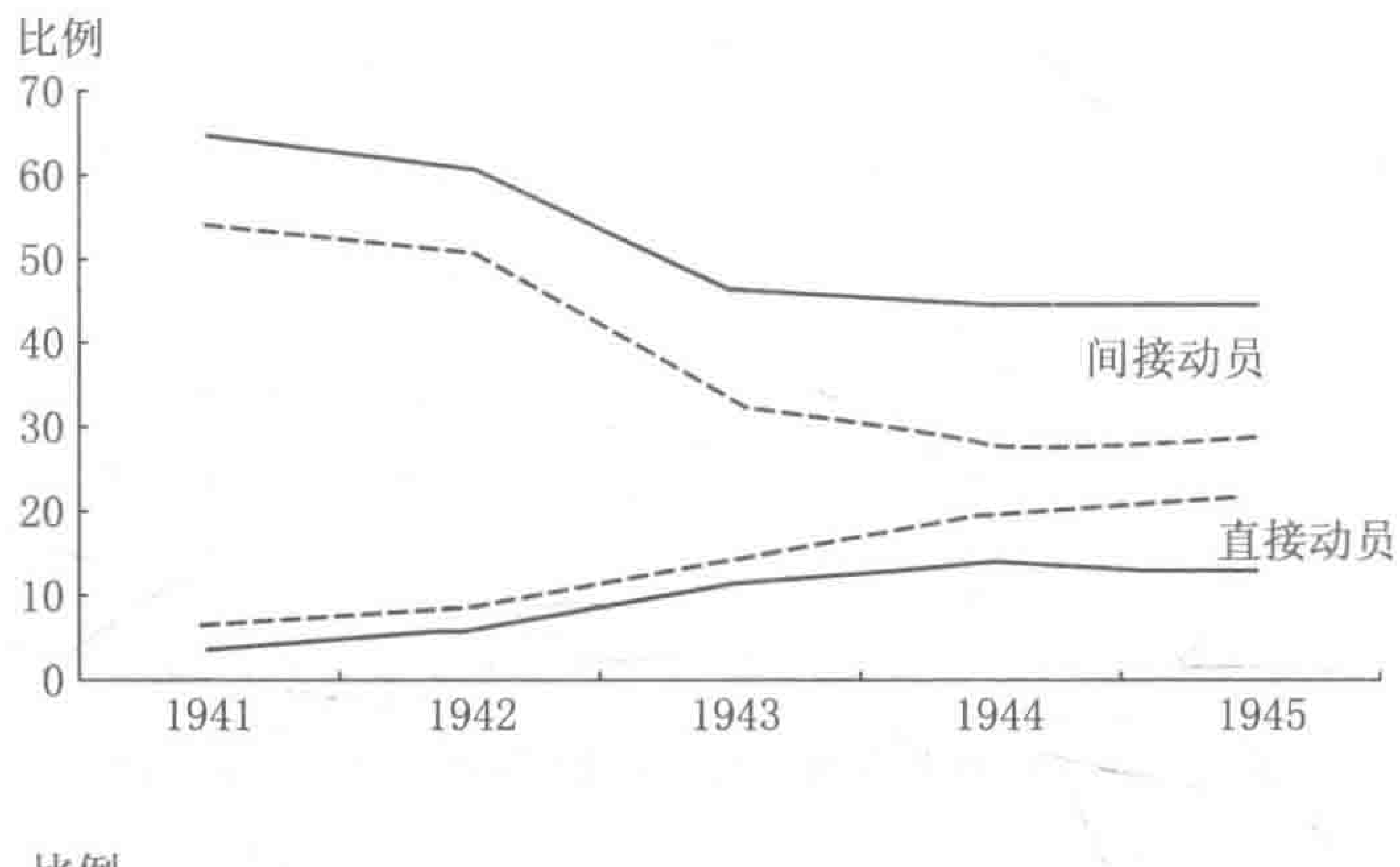


图 5.3　1941—1945 年，特曼男性被军事和国内—前线动员的比例

无论是服役还是国内—前线的战争相关活动中，年轻人都更容易被直接动员（参见图 5.4）。社会把军事职责定义为年轻男性的活动，但战争事业所必需的国内—前线工作似乎也更青睐年轻男性。这一选择可能反映了年轻男性的生命阶段，他们在市场中有更多的机会；或许也反映了年长男性的生命历程变迁受到较多的家庭和职业羁绊。年轻男性对居住地变动的态度更为开放，并且在放弃一份工作寻找另一份更好工作过程中所受损失也更少。自上而下的人力短缺可能也更倾向于选择受过更高教育的年轻人。不管怎样，任何生命历程变迁分析都要考虑战前的雇佣史和职业的这些特定属性。在研究军事和国内—前线动员对男性生命的双重效应时，这些思考使我们更熟悉研究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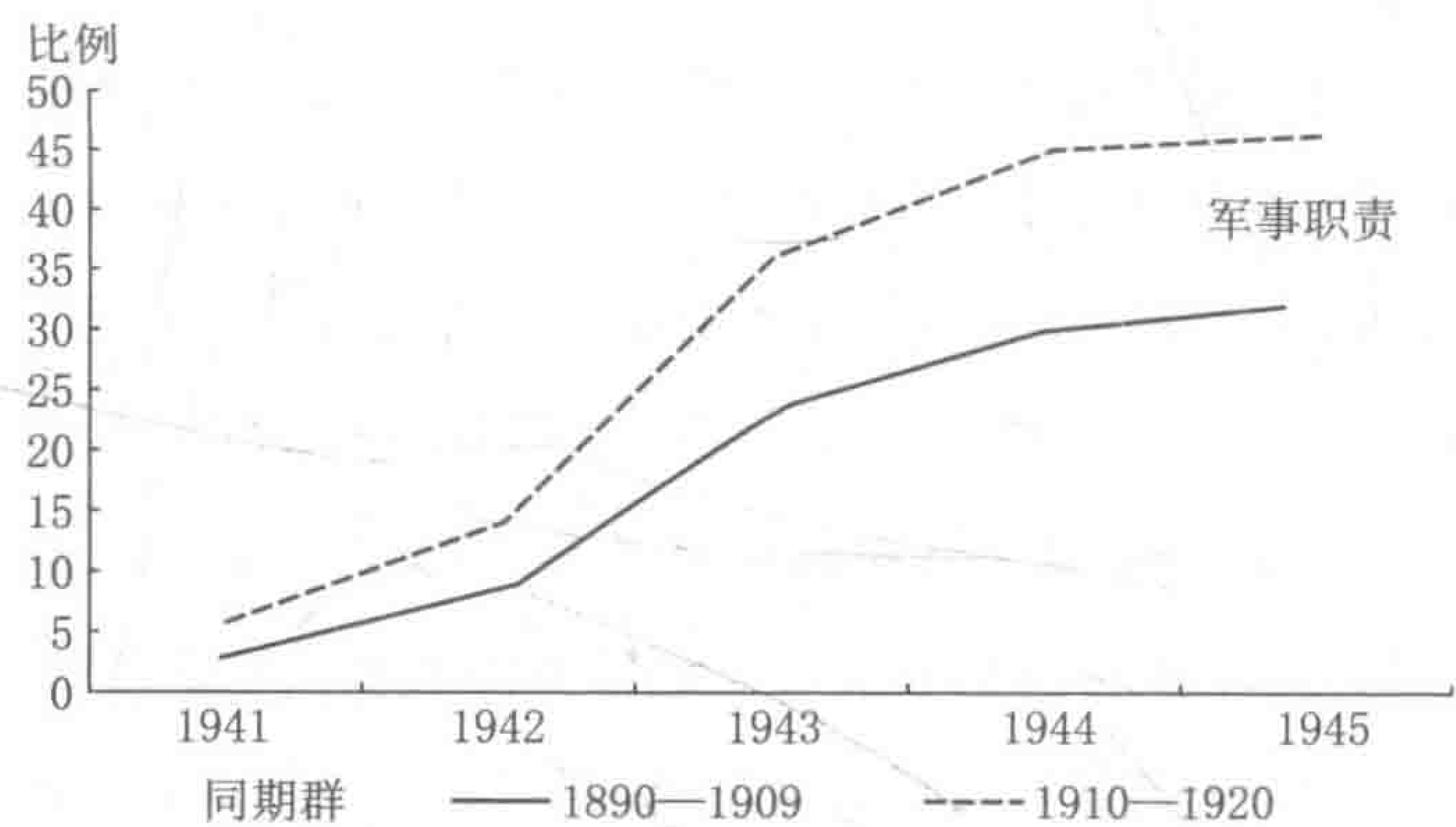


图 5.4　1941—1945 年，分同期群特曼男性被军事和国内—前线动员的比例

第3节 | 结论

虽然社会科学家往往承认历史影响在形塑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他们在把这一看法转化成实际研究方面所得甚少。早期的纵贯性研究并不在意一个变化的世界与生活模式的关联方式，而近期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进展。一些主要的纵贯性研究设计仍然不关注历史记录，部分研究者似乎还认为历史仅仅是他们研究的背景而已。

基于这些考量，对历史影响进行生命历程分析的最为重要的步骤是把它们（历史影响）整合到研究问题的表述中去。历史学问题并不聚焦于历史效应（historical effects）的研究。而且，他们不会去搜集历史效应的数据或选择可适用于历史分析的档案数据。在设计研究时，路易斯·特曼并未考虑历史或环境效应，因此他并未询问任何一个有关生活中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作用的问题。该项目搜集了实施期间的历史相关数据，但主要是个人数据，包括通信和新闻剪报。通过对这些材料和特曼档案中其他

数据进行重构,我们开发了一套有关历史环境和经历的编码,并对特曼男性的服役和国内—前线动员进行了测量。

特曼文件中的定性和定量数据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些新编码。当前的大部分纵贯性研究都以结构化的封闭式问题为主,没有开放式问题,对于这种限制性的调查数据,我们并不能对其进行重构。相反,较老的纵贯研究一般都搜集了丰富的定性材料和定量数据,因此为研究快速变迁社会中的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对特曼数据进行重新处理的方法源自于对奥克兰和伯克利指南研究数据进行的类似分析工作,也希望这一方法能被运用到其他研究中。

附录　雷德克里夫学院的亨利·莫瑞研究中心

恰如在《社会科学纵贯性研究目录》(*Inventory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Young et al., 1991)中所描述的那样,雷德克里夫学院的亨利·莫瑞(Henry A. Murray)研究中心以进行对人生的研究为主。该中心建立于1976年,是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全国性数据储藏室。该中心存储了原始的调查记录以及经过编码的机读数据。原始记录通常包括完整访谈的文本、行为观察、项目测试答案和其他对二手分析有用的信息。利用这些辅助材料使研究者能够重构原始调查记录,并减轻数据搜集时所依赖的理论假设对数据的限定。感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一本《数据资源指南》(*Guide to the Data Resources*),其中提供了关于将近200个数据集的信息,和一本《指南索引》(*Index to the Guide*),这其中列出了每个数据的搜集方法和领域。请联系 Anne Colby, Ph.D., Director, Henry A.Murray Research Center of Radcliffe College, 10 Garden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617)495-8140。

参考文献

ALLPORT, G.W.(1942)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AILEY, K.D.(1978)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BALTES, P.B., CORNELIUS, S.W., and NESSELROADE, J.R.(1979) "Cohort effect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p.61-87 in J.R.Nesselroade and P.B.Baltes(eds.)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BARTKO, J.J.(1966)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a measure of reliabil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3-11.

BOLLEN, K.A.(1989) *Structural Equations With Latent Variables*. New York: John Wiley.

BROOKS-GUNN, J., PHELPS, E., and ELDER, G.H., Jr.(1991) "Studying lives through time: Secondary data analyse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899-910.

BURDOCK, E.I., FLEISS, J.L., and HARDESTY, A.S.(1963) "A new view of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Personnel Psychology* 16: 373-384.

CAMPBELL, R.T., and O'RAND, A.M.(1988) "Settings and sequences: The heuristics of aging research," pp.58-79 in J.E.Birren and V.L. Bengtson(eds.) *Emergent Theories of Aging*. New York: Springer.

COHEN, J.(1968) "Weighted kappa: Nominal scale agreement with provision for scaled disagreement or partial credi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0:213-220.

DUNCAN, G.J., with COE, R.D., CORCORAN, M.E., HILL, M.S., HOFFMAN, S.C., and MORGAN, J.N.(1984) *Years of Poverty, Years of Plenty: The Changing Economic Fortunes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Families*. Ann Arbor, MI: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DUNCAN, G.J., and MORGAN, N.J.(1985)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p.50-71 in G.H.Elder, Jr.(ed.)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 Transitons, 1968—1980*. Ithaca, NY: Cornell U-

niversity Press.

EBEL, R. L. (1951) "Estim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of ratings." *Psychometrika* 16:407-424.

EICHORN, D.H., CLAUSEN, J.A., HAAN, N., HONZIK, M.P., and MUSSEN, P.H. (eds.) (1981)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LDER, G. H.,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DER, G.H., Jr. (1979) "Historical change in life patterns and personality," pp.117-159 in P.B.Baltes and O.G.Brim, Jr.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LDER, G.H., Jr. (1985)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pp.23—49 in G.H.Elder, Jr. (ed.)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 Transitions, 1968-198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DER, G.H., Jr. (1986) "Military times and turning points in men's l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233-245.

ELDER, G. H., Jr. (1987) "War mobiliz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A cohort of World War II veterans." *Sociological Forum* 2:449-472.

ELDER, G.H., Jr. (1992) "Studying women's lives: Research questions, strategies and lessons," in S.Powers (ed.) *Studying Women's Lives: The Use of Archival Dat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DER, G.H., Jr., CASPI, A., and DOWNEY, G. (1986) "Problem behavior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Life course and intergenerational themes," pp. 293-340 in A. B. Sørensen, F. E. Weinert, and L. R. Sherrod (eds.),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ELDER, G.H., Jr., and CLIPP, E.C. (1988) "Wartime losses and social bonding: Influences across 40 years in men's lives." *Psychiatry* 51: 177-198.

ELDER, G.H., Jr., and CLIPP, E.C. (1991) "War's legacy in men's live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San Francisco.

FAIRCHILD, B., and GROSSMAN, J. (1959) *The Army and Industrial Manpowe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FEATHERMAN, D.L., and LERNER, R.M.(1985) "Ontogenesis and sociogenesis: Problematic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about development and socialization across the lifes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659-676.

FILLENBAUM, G.G., and MADDOX, G.L.(1974) "Work after retirement: An investigation into some psychologically relevant variables." *Gerontologist* 14:418-424.

FLEISS, J.L.(1971) "Measuring nominal scale agreement among many rat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378-382.

FLEISS, J.L.(1973)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ates and Propor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FREEDMAN, D., THORNTON, A., CAMBURN, D., ALWIN, D., and YOUNG-DeMARCO, L.(1988) "The life history calendar: A technique for collecting retrospective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8:37-68.

FUCHS, V.R.(1982) "Self-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7:339-357.

GUSTMAN, A.L., and STEINMEIER, T.L.(1984) "Partial retire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retirement behavior."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37:403-415.

HAREVEN, T.K.(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Work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GAN, D.P.(1981) *Transitions and Social Change: The Early Lives of American Me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ONIG, M., and HANOCH, G.(1985) "Partial retirement as a separate mode of retirement behavio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21-46.

HYMAN, H.H.(1972) *Secondary Analysis of Sample Surveys: Principles, Procedure, and Potentiali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IDLER, E., and KASL, S.(1991) "Health perceptions and survival: Do global evaluations of health status really predict mortali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46:55-65.

JONES, M.C., BAYLEY, N., MacFARLANE, J.W., and HONZIK, M.P.(eds.)(1971) *The Course of Human Developmen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Longitudinal Studies, Institute of Human Devel-*

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altham, MA: Xerox College Publishing.

LANDIS, J. R., and KOCH, G. G. (1977) "The measure of observer agreement for categorical data." *Biometrics* 33:159-174.

LAUB, J. H. (1991) "Reconstructing the Gluecks'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data."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Working With Longitudinal Data: New Questions for Old Data*, Cambridge, MA.

LAUFER, R.S. (1985) "War trauma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Viet Nam experience," pp.31-55 in S.M.Sonnenberg, A.S.Blank, Jr., and J.A.Talbot (eds.) *The Trauma of War: Stress and Recovery in Vietnam Vetera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LEINBAUGH, H.P., and CAMPBELL, J.D. (1985) *The Men of Company K: The Autobiography of a World War II Rifle Compan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LIGHT, R. J. (1971) "Measures of response agreement for qualitative data: Some generalizations and alterna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365-377.

LINN, B.S., LINN, M.W., and GUREL, L. (1968) "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16:622-626.

MADDOX, G. L., and DOUGLASS, E. B. (1973)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lderly subjec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4:87-93.

MAYER, K. U., and TUMA, N. B. (eds.). (1990)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cLANAHAN, S.S., and SØRENSEN, A.B. (1985) "Life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ver the life course," pp.217-238 in G.H.Elder, Jr. (ed.)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 Transitions, 1968—198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ERTON, R.K. (1959) "Notes on problem-finding in sociology," pp.ix-xxxiv in R.K.Merton, L.Broom, and L.S.Cottrell, Jr. (eds.) *Sociology Toda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Basic Books.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 ed.). New York: Free Press.

MINTON, H.L. (1988a) "Charting life history: Lewis M.Terman's study

of the gifted," pp.138—162 in J.G.Morawski(ed.)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NTON, H.L.(1988b) *Lewis M. Terman: Pioneer in Psychological Test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YERS, D.A.(1991) "Work after cessation of career job."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6:93-102.

RILEY, M.W., JOHNSON, M.E., and FONER, A.(1972) *Aging and Society, Vol.3: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ROBINSON, W.S.(1957) "The statistical measure of agre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17-25.

RYDER, N.B.(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843-861.

SCHAIE, K.W.(1965) "A gener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proble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4:94-107.

SPITZER, R.L., COHEN, J., FLEISS, J.L., and ENDICOTT, J. (1967) "Quantification of agreement in psychiatric diagnosi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7:83-87.

STOUFFER, S.A., LUMSDAINE, A.A., LUMSDAINE, M.H., WILLIAMS, R.M., Jr., SMITH, M.B., JANIS, I.L., STAR, S.A., and COTTRELL, L.S., Jr.(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ERMAN, L.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others(1925)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1: Mental and Physical Traits of a Thousand Gifted Childr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ERMAN, L.M., and ODEN, M.H.(1959)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5: The Gifted Group at Mid-Life: Thirty-Five Years of Follow-Up of the Superior Chil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ESCH, R.(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Falmer.

THOMAS, W.I., and ZNANIECKI, F.(1918-1920)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Boston: R.G.Badger/Gorham.

TUMA, N.B., and HANNAN, M.T.(1984) *Social Dynamics: Models*

and Method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VOLKART, E.H.(1951)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Contributions of W.I.Thomas to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WILENSKY, H.L.(1961) "Orderly career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work histor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ma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521-539.

YOUNG, C.H., SAVELA, K.L., and PHELPS, E.(1991) *Inventory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译名对照表

chance agreement	偶然一致性
coding	编码
cohort	同期群
criterion validity	效标效度
data archives	数据档案
distal event	末端事件
intentory	编目
interrater reliability	评分者间信度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	同类相关系数
life course	生命历程
life record	生命记录
longitudinal data	纵贯数据
machine-readable	机读
mean squares between groups	组间均方
mean squares error	误差均方
originating question	原初问题
percentage agreement	比例一致性
proximal event	近端事件
recasting	重构
recoding	再编码
reliability	信度
summary sheet	概要单
trajectory	轨迹
validity	效度

Working with Archival Data: Studying Live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13-596

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

1. 社会统计的数学基础
2. 理解回归假设
3. 虚拟变量回归
4. 多元回归中的交互作用
5. 回归诊断简介
6. 现代稳健回归方法
7.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8. 用面板数据做因果分析
9. 多层次模型
10. 分位数回归模型
11. 空间回归模型
12. 删截、选择性样本及截断数据的回归模型
13. 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第二版）
14. logit与probit：次序模型和多类别模型
15. 定序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
16. 对数线性模型
17. 流动表分析
18. 关联模型
19. 中介作用分析
20. 因子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问题
21. 非递归因果模型
22. 评估不平等
23. 分析复杂调查数据（第二版）
24. 分析重复调查数据
25. 世代分析（第二版）
26. 纵贯研究（第二版）
27. 多元时间序列模型
28.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
29. 缺失数据
30. 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
31. 广义线性模型导论
32. 基于行动者的模型
33. 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法导论
34. 微分方程：一种建模方法
35. 模糊集合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36. 图解代数：用系统方法进行数学建模
37. 项目功能差异（第二版）
38. Logistic回归入门
39. 解释概率模型：Logit、Probit以及其他广义线性模型
40. 抽样调查方法简介
41. 计算机辅助访问
42. 协方差结构模型：LISREL导论
43. 非参数回归：平滑散点图
44. 广义线性模型：一种统一的方法
45. Logistic回归中的交互效应
46. 应用回归导论
47. 档案数据处理：生活经历研究
48. 创新扩散模型
49. 数据分析概论
50. 最大似然估计法：逻辑与实践
51. 指数随机图模型导论
52. 对数线性模型的关联图和多重图
53. 非递归模型：内生性、互反关系与反馈环路
54. 潜类别尺度分析
55. 合并时间序列分析
56. 自助法：一种统计推断的非参数估计法
57. 评分加总量表构建导论
58. 分析制图与地理数据库